黑眼睛看世界

杨恒均

目录

政治篇 有病，治病

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

岁末年初的两个月是我休假兼读书的时间，一般都远离喧闹的大陆，远走他乡，两耳不闻中国事，一心只读我想读的书。连每天的上网时间也限制在一个小时之内，当然，电子邮件是不能不打开的，这毕竟是我同外界最常用的联系渠道。

仅仅这两天，就有十几位读者通过邮件发来了“命题作文”：某某地方被强制拆迁、机场滞留而不能回来的同胞、深圳颁布了如此荒唐的访民规则，还有福建三位因言获罪的朋友身陷大牢，当然，更多的是关于广州番禺的垃圾焚烧厂……

出国前到将要受到垃圾焚烧厂影响的丽江花园去看朋友，问一位房产公司的代理如何看垃圾焚烧厂，他无奈地说，政府说没有毒，只不过夏天会有垃圾臭味吹过来，不过，别担心，不只是丽江花园的居民闻得到，估计有三十万人的居民都受到影响。

我大吃一惊，广州闷热的夏天已经够呛了，再加上垃圾的味道？这是二十一世纪正在崛起的中国南方最大城市的体味？为什么要在这个地区建立垃圾焚烧厂？我走过世界上那么多城市，有哪一个现代化城市里的三十万——或者说三万居民，在夏天到来的时候，会和焚烧垃圾的味道共处？做出此项决策的官员们，你们的嗅觉是不是有毛病？

单单嗅觉出毛病还关系不大，但很显然，他们的眼光也出了问题。就我在广州买房后的短短十年经验来判断，不到十年，番禺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区域将会成为另一个人口集中的繁华区域，到时受到垃圾臭味袭击的人口就不是三十万或者四十万了。可为什么官员们做决策时如此的鼠目寸光？

有人说了，人家眼睛盯着钱袋，不用看到更远。再说，现在建，到时可以再搬迁嘛。是啊，正如我对中国城市的观察，马路上施工过的新土还没有干，就又被扒开了，不停地埋管子，换设备，都是垄断企业一声令下，你不更新设备，断你的气！结果，水泥地和柏油马路几乎被翻熟了，当然，据经济学家说，每“翻”一次马路，GDP 也会跟着翻滴。只是可惜了纳税人的血汗钱。

不过，对广州番禺的垃圾焚烧厂，我一直不太介意。原因很简单，在这么近居民区的市区范围内建立垃圾焚烧厂，不可能不触犯众怒，到时民意难违，有好戏看，我就打酱油路过，或者围观一下，最多做两个俯卧撑。果然，昨天广州就出现了大批居民上访的情况。我想这一下领导应该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吧？

据说昨天上访过程中出现一个很牛的现象，一名警察走进举着各种标语牌的静坐的人群中，要求上访的群众推选五位代表进去见领导。结果，群众异口同声地喊道：你们选五位领导出来见我们！

在邮件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简直被彻底雷倒了，几乎是目瞪口呆，多牛逼的主人翁精神啊，多牛逼的二十一世纪的广州啊，多牛逼的公民啊——这种公民，怎么能够咽得下垃圾的臭味？

不过，当晚看到的消息和邮件却令人沮丧，公仆们没有出来见“主人”，口气反而越来越强硬。同时，一封老友的电子邮件证实缺乏政治嗅觉的不是那些领导，而是我杨恒均，“目光短浅”的也不是决策者，而是我老杨头。

朋友在信里告诉我，垃圾焚烧厂涉及到一些大人物的利益，大到能够让广州当局挺起腰板，大到连汪洋都不能挺起腰杆；和厦门 PX 不同的是，厦门民众有开发商的支持，而番禺这里，本来就是广州比较没有地位的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以前都是农民的地方，更不用说背景了。

朋友说，这次估计没有办法扭转他们的决定了，有钱的想办法搬家吧，没有钱的可以买口罩，或者适应几年，鼻子也就习惯了。至于说是否有毒，也只有政府说了算，对于我们这些和屁民一个级别的垃圾民来说，只有等到能够“开胸验肺”，或者毒死几个给他们看看，估计才会有效果，不过到那时，现在的决策者早就赚得满满当当地退休了，新上任的也正好想建新的垃圾场，从而从新分配利益……

朋友的来信话锋一转，大有推不倒政府决策就向我老杨头撒气的架势：你小子，整天鼓捣什么民主自由和法治啊，这么重要的有关民生的事，你躲得远远的，你即便不回来和我们一起上访，也应该写点什么吧？你真让人失望……

各位，朋友说到这个份上，还让我如何静下心来读书？其实，你知道我每个月收到要求我关注的上访，希望我写文章呼与鼓的信件有多少吗？我就是每天去一个地方，每天写一篇博文，都远远不够。而且，说心里话，我那些博文真有什么作用吗？真能够帮助到上访者吗？

我知道看我文章的大多是和我一样的无权无势的人。我写博客，他们留言，通过这个方式，展示我们这些无权者的权力。仅此而已。

再说，经过对全国各地上访的观察，我感觉到上访的作用实在是很微弱的。这么多年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上访，掌握权力的人真正解决了几个问题？而更可悲的是，那少有的几个被解决的问题，上访者最后得到的，远远少于他们付出的。更不用说，能有几个上访的案子真正推进了规则、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可是，上访却是我们这个神奇国度里民众唯一能够使用的办法，也是一种和写博客一样的"无权者的权力"。盼望开明的皇帝，祈求大公无私的包青天，跪求良心发现的"父母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一直在写这个问题，我不是不去上访，而是想找到更加有效的"上访"办法。我甚至不忍心多看中国目前的那些上访案子——它们只让我看到了以眼泪和血汗铺成的上访路，以及掌握了权力者的傲慢和无耻。

在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面前，除了和你一样，跪下来祈求，否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唯有继续写博客，继续看书，继续走我的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看到上访的希望，或者其他的希望——所以，对不起了，各位，今夜，我继续读我的书……

今天晚上我读的书中除了两本世界哲学，一本小说之外，还有一本是长达 1000 页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很吸引人，一直看到深夜两点多钟，仍然不想睡觉，正准备放下书时，被一句熟悉的话吸引了——

在克林顿竞选胜利在握的时候，他的竞选车队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这个小镇子的居民实在太少，团队没有安排在这里停留造势。当车队经过镇子旁的大路时，司机看到路边远远有几十个民众在那里等待，好像要上访的民众。当时克林顿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车队继续前进，不准备停下来。

就在接近那堆人群时，克林顿看到了那队人，他随即命令车队立即停下来，然后，他领着夫人希拉里走下车，后面跟着自己的竞选团队，来到几十个美国市民中和他们讨论自己的经济政策和环保、医疗改革，一一回答民众的提问和质疑……

克林顿为什么要下车？他看到了什么？那些美国民众给他下跪了？写了肉麻的欢迎标语？还是他需要在这里拍下亲民的镜头？都不是，当时那稀稀落落的民众挺胸抬头，趾高气扬，歪歪斜斜地站在路边，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标语——不，他们写了一个牌子，就像昨天广州上街的市民举的那种牌子，只是美国市民举的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

克林顿看到的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触动了掌权者的神经，于是，他谦卑地走下了竞选大巴，像一个仆人走向自己的主人那样。是的，那些人不是来请求和他见面的"访民"，而是要给他下指示，听他解释自己的政策的"选民"；他们不是来恳求他如何制定政策，惠及民生的，他们是来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管你多忙，你都应该停下来，听听他们的意见，说说你的政策，他们满意了，他们将选你当总统，将把权力交给你，将让你未来八年住在白宫里！

这个故事我其实早就听说过，但第一次看到克林顿讲述，并且是在我的朋友们在广州上访了一天无果，在我想为中国的访民们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在我准备用自己的博客"上访"的深夜里……

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面前，傲慢了几千年的权力顷刻间低眉顺眼下来；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背后，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解决腐败的绝对权力的唯一办法是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只要不是你手里的选票把他们推到权力的宝座上，即便你已经把自己当公民，把自己当主人了，喊出了连美国公民都喊不出的“你们选五个领导出来见我们”的无与伦比的名句，又能怎么样？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主人啊？

杨恒均 2009/11/23

伊拉克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伊拉克是美国用枪炮在中东穆斯林国家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国家，有如二战后它建立的日本国一样。如果从制度框架上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了，可连美国人都认为伊拉克的民主还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前段时间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到伊拉克转了一圈，回去后很郁闷，对我说，伊拉克的民主真的有问题，“制度”是建立起来了，但好像伊拉克人不太会用，或者他们不怎么想去用。他们见到美国人就抱怨。他说，同当地精英知识分子见面时，常常要先花半个小时听他们抱怨，一位伊拉克的大学教授一见到他就怒气冲冲地嚷道：家里的水龙头又没水了，你们美国人怎么搞的？这就是民主？至于没有工作、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而抱怨的，比比皆是。这位美国人不解地说，从人均收入的统计数字上看，现在的伊拉克人比十年前富裕了很多，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可抱怨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我问他，那个向你抱怨水龙头没有水的伊拉克教授在萨达姆时代水龙头里都有水吗？他说，萨达姆时代那教授家根本就没有水龙头啊。我说，对啊，别说没有水龙头，就算是没有水了，在那个时代，他们也不会抱怨，也不敢抱怨。民主不就是让人抱怨吗？人家抱怨一下，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可这位美国朋友还是坚持认为，这么多抱怨，总让他感到美国人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至少是有些事没有做对。他的话也触动了我的思绪。本来，在萨达姆时代，恐惧与信仰交织，恐惧变成了信仰，现在，民主在炮声中突然降临，民众正在竭力弄清这个所谓的民主同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在没有恐惧与信仰支撑的时候，当然就会民怨沸腾。可这当然不是伊拉克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伊拉克的民主制度是在一场军事入侵推翻了独裁萨达姆后建立起来的。问题是，美国人能够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一个制度（框架），谁能帮伊拉克人建立其新的信仰，以及民主的价值理念？

据我从一些资料了解，伊拉克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多少人在以前和现在宣扬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这些可都是美国人带过去的那个“民主框架”必不可少的。而美国本身也没有宣传部门，占领伊拉克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除了用话筒高喊“站住、不许动”之外，就没有使用

过“话筒”(宣传与说教)。想到这里，我故意去挑逗这位美国朋友。我使用了“宣传”一词，并假装责怪他们推广普世价值不够力。

果然，他一听就笑了起来，说美国政府和军队从不搞宣传，也不会搞宣传，“宣传”一词在美国是近似邪恶的，他还说我的思维是东方式的，是共产党那一套。我听后也乐了，我说，美国人是现在不搞宣传，并不是以前也不搞，你们现在是忘记怎么搞宣传了，例如对外有宣传功能的《美国之音》，也宣传得不怎样。可美国以前并非如此，美国从《独立宣言》到《宪法》，处处在宣传自由、法治的民主价值理念，上个世纪头半个世纪，美国的学校还非常热衷于爱国主义教育，部分学校的学生每星期上学都要对星条旗敬礼(只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党旗敬礼)，学校教育中一度出现敏感词（例如和苏联有关的东西都不能随便说出来，有些小学教学用的地图上竟然没有苏联的位置，那块地竟然是一块空白)。在占领日本期间，美国国务院与驻军曾经协同日本相关机构做过一系列的“洗脑”工作（民主宣传)。

只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经过 50 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与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公民社会劫后重生，更趋成熟，政府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推崇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民主取得主导地位，注重程序（程序共和国)，对宪法的阐释也越来越偏向价值中立，社会拥抱多元，政府不再扮演引人向善的道德角色。对美国来说，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两百年的公民社会与权利共享的熏陶，自由、人权、法治等已经融入美国普通人的血液里，基于政府会犯错，大多美国人却总能做出正确判断的理念，政府的最大职能成为保障公民的自由与人权，而公民最大的自由与权利就是对善恶做出自己的判断，包括对政府的评判。普世价值说白了，就是被最多的普通人所拥抱的价值。

这种变化，正好反应在美国占领日本与伊拉克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做法上。占领日本后，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肃清军国主义流毒（正如它在国内也正在肃清“马克思主义流毒”一样)，加上日本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性格，所以，日本的民主架构搭建起来的同时，国民的民主素质也迅速提高。类似情况还有战后的西德，那里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大量的民主理念的“洗脑”工作，但还不能让欧美人放心，于是制定了禁止纳粹分子游行聚会的法律条文，而这一法律在美国不但无法通过，还是违宪的，因为美国人用“自由”来限制与抗衡“民主”，政府在自由的内容方面保持了价值中立，宪法的解释者最高法院认为，既然黑人民权运动分子马丁路德金博士可以游行示威，那么，主张种族隔离的新纳粹也同样有游行示威的权力。这种看上去“善恶不分”的制度与法律，为什么没有让美国出现新的纳粹？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众自己“心里有杆秤”，而且，可以用选票显示这杆秤的分量。

据一些学者研究，德国希特勒时代的“民主制度”也挺完善，可这个完善的民主制度选出来的希特勒却成了有史以来最邪恶的魔鬼，为什么？因为当那个民主制度的内核并不是以（尊重个人）自由、人权与法治为价值理念的时候，当民众接受的不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普世价值”的那些价值观的时候，拥有投票权的民众选出一个希特勒、选出一个现代的秦始皇，并不出奇，这也是在“普世价值”出现前，历史上一些大学者并不支持“民主”的主要原因——到这里，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一下现代民主制度的两个含义：以选票、监督机制（例如三权分立）为主的制度设置，以自由（恰恰是限定民主权限的反义词)、人权与法治为核心价值观的“民主理念”。民主只有结合了这两种含义后，才是一个好东西。

同占领日本与西德时不同，到了伊拉克时代，美国已经走出了罗斯福总统用“炉边谈话”来充当美国人导师的时代，总统变成了聆听民意的学生，政府渐趋价值中立，相信有了程序(完

善的制度），民众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可美国人却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更没有想到，美国的“制度”（框架）确实不一定适合伊拉克人，且不说穆斯林宗教中民主理念的成分比较少，仅仅是萨达姆多年的独裁和愚民教育，加上当地知识分子又不给力，一个好的架构如何能够立即发挥应有的作用？

伊拉克的民主制度本身没有出什么问题，问题是伊拉克的公民社会必需从零开始，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伊拉克民众对民主理念的接触甚少，当然，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民众的民主素质才能得到培养与磨练，可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不需要努力的。即便拿美国这个鄙视“宣传与说教”的国家来说，学校的教育仍然是在树立普世价值观，而无处不在的媒体与公众言论平台，更是每时每刻都在鞭策、拷问、彰显美国人拥抱的价值理念。

我反对文化决定论，更不认同素质论，但我驳斥素质论的文章更多是针对统治者的。如果认为国民素质与民主何时到来以及到来后的质量没有关系的话，一切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的言行都失去了意义。大家都坐在那里等有人把制度建立起来就万事大吉了。抱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妨去研究一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的制度框架，即便拿到现在，也并没有多少漏洞，可运作起来呢？

民主大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每一次运动，某一个民主体制的建立，几乎都有其偶然性，无法预测。与其寄托偶然，寻求“民主离我们还有多远”的答案，不如做一些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小事：传播民主理念。民主制度的建设与民主理念的普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每当多一个人接受了民主的价值理念，我们也就离民主的理想又近了一步。

杨恒均 2011－2－23

美国选民只关心经济议题吗？

打开网站，我看到了头版头条新闻：“美国中期选举今日投票。”打开更多新闻网站，我愣住了，因为是一样的：美国中期选举专题。我急忙打开所有能够找到的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我震惊了——因为几乎所有网站的头版头条都是关于美国中期选举的……
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即便在美国，也没有碰上过所有的新闻网站都把中期选举置于头版头条的新闻事件啊，更不用说和美国关系密切到“同生死、共存亡”的澳大利亚与日本等盟国了。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或地区）来说，几乎每两年都有一次上规模的选举，这已经成为常态。选举也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民主国家选民用来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工具与手段。虽然世界各地的选举从形式到方法都有所不同，但其本质几乎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外选民对自己亲身参与的选举很重视，却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举漠不关心。而且，对于某个国家和地区的选举，如果你不是当地人，要想真正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容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发生在外国的选举就不重要。对于政府决策者、智囊、专家学者与国际问题专家，认真研究外国的选举，对决策与研究都大有裨益。可中国大陆出现的各大媒体对海外选举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一下子涵盖了西方国家所有选举的内容，弄得全民都关心另外一个国家（地区）的例行选举，还真是我们所特有的现象。人家世界各国也就那么轻描淡写地报道几次，哪里出现过中国目前这样的疯狂报道？

有人可能会说，关心五都选举是关心两岸关系，关心美国中期选举是关心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关系、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等等。这个没错啊，可两岸关系已经六十多年了，中美关系也一直如此，什么时候值得你如此关心过？什么时候真正影响过你的生活、工作？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关心自己的县委书记是从哪里来的，邻居被拆迁是否合法，所交的税是否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却个个都弄成了外交家与两岸问题专家，实在让人大惑不解。中国一位普通民众对美国两党选举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所在地区的人大选举，却不明白，美国哪一个党上台，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孩子前途的影响，可能远远不及他们所在地区的一位公安分局副局长（不一定叫“李刚”）的作用。

我当然不是反对大家关心其他国家（地区）的选举，只是觉得这种关心的强度和热度几乎已经超过了选举所在国家的民众。而且，离奇的是，中国民众关心选举，按说应该对选举认识比较全面和深刻吧，可恰恰相反，中国部分民众对选举的理解肯定让当地的选民们都哭笑不得。

不知道是资讯不全，还是被有意误导，我接触的相当部分关心海外选举的网民都对选举存在严重的偏见和误解。一些报道把在民主国家已经融合成生活一部分的选举同民主生活方式剥离开来，单纯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来报道、分析，往往给远离选举的中国读者一个印象：选举就是瞎折腾，而且，每次选举都伴随着混乱与你争我斗，以及更严重的是，好像每一次选举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增加了更多的问题，由此得出结论，选举制度是有很大瑕疵的。

举个例子，既然选举，就有输有赢，这对于参加过几次选举的民主国家的国民来说，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谁都不当回事了。可是，那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的人就无法摆脱那个“输”的情结，他们就是闹不明白，西方的每一次选举后，几乎都有将近一半的人在选举中“输掉了”，那种社会能和谐吗？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中国主流的新闻报道中常常出现民意调查——当然，都是海外那些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地区）的民意调查。

这些民意调查在他们自身的国家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自然不用我来啰嗦和解释。可是一旦拿到根本没有真正的民意调查的地方，就全变味了。

我举个今天的例子：中央某台新闻报道，美国一项中期选举前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 47%的美国选民关心经济议题，相比而言，只有不到 17%的美国人关心美国的民主政治质量。

一位朋友看到这则民意调查后对我说，你看，连美国选民都只关心经济问题，没有多少人关心政治，更少人关心民主……看我沉思不语，他趁热打铁地补充了一句，你老人家该清醒了，中国其实也一样啊，民众关心的是经济问题，是贫富悬殊，是如何更好地瓜分改革开放的大饼，有一口饭吃的民众是不会想到你说的那些民主的……你整天喊民主，有多少人理睬你？

我没有回答他。我想起了几天前的一条新闻标题——“温家宝：调整收入分配群众呼声最强烈”。当初看到这条新闻，我久久不语，还特意收藏了这条新闻。有朋友不理解，问我，这条新闻为什么让你那么沉思？我说，我想知道，温家宝总理在说这话的时候，是否也像我一样沉思过？他是什么心情？

毫无疑问，温家宝总理发现了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民生，政府对民生的措施（例如居民收入与 GDP 增长同步，全民医保、降低房价等）也得到超高“民调”的支持……

而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温总理连续七次高呼政治体制改革，要发展民主政治，加强法治建

设，保障和扩大民众的自由权利……得到了多少呼声？民众的呼声不高也许可以理解，可连一些知识分子也说起了风凉话：来点实际的，要减少贪污腐败，要缩小贫富差距，要废除……一时之间，给我们的感觉是高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理不务实、不实际了。
真应了一些朋友的结论：民众最关心经济问题，关心他们是否有饭吃，房价是否降低了，关心是否又要加税，等等。中国民众如此，美国民众也一样。自由、民主太遥远了，大家不关心……但是，果真如此吗？
这些人哪里知道，美国中期选举民众关心经济多过政治议题的民调，本身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恰恰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选举本身就是用政治的方式来决定经济问题啊。美国人之所以只关心经济，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利，他们关心经济，关心奥巴马是否增加税收，是否要搞"社会主义"，他们要用政治的手段来决定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前途……如果他们只能提经济建议，然后等到某一个党来决定"从善如流"，你再去民调一下试试看，保准没有一个美国人再关心"经济问题"，而都会只关心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求用投票的方式决定谁来为我们的经济问题做决策！你说，这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美国民众只关心经济问题，其实和中国民众只关心经济问题完全不是一码事。如果没有政治权利作为后盾，如果关心经济问题，只是表达诉求，希望一些好的领导人"从善如流"，会有什么结果？我不排除历史上有一些好皇帝爱民如子，也确实在极短的时间内做了很多民主政府都做不到的好事。但整个历史就摆在那里，足足有几千年了，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只要民众一天不掌握解决
"经济问题"的政治权利，他们的"经济问题"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这已经是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常识了，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搞不明白？
如果经济问题都可以靠"经济办法"来解决，那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可是，你什么时候看到腐败、贫富差距、不受限制的权力被真正控制住了？这些东西不被真正控制的话，其他的问题又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又能维持多久？如果民生问题是靠民众呼吁，当权者"从善如流"就可以解决的，温总理去"从善如流"就足够了，为何要仰望星空，要大谈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他关注民生的时候，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可当他呼吁那个唯一能够彻底解决民生问题的民主问题时，却鲜有人呼应。他能不郁闷吗？
2010.11.02 香港

CNN 为什么那么爱国

对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的那种片面和偏激，我是早就领教过的。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到美国工作，为了尽快让英语听力过关，每天趴在电视机前看新闻实事或脱口秀节目。起初，由于熟悉新闻背景，完全能够听懂的几乎只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说实话，从美国新闻里看到报道中国的新闻和他们的评论，确实很让人不爽。

即便在我自己把批评中国当作己任，自认通过批评自己的国家从而促使其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的今天，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有时真想找人教训他们一下，可是找谁呢？西方的新闻媒体好像没有主管单位，看看他们如何整天批评甚至攻击总统和政府就知道了。特别是美国的福克斯新闻(FOX)攻击起克林顿夫妇，简直可以用极尽侮辱之能事。

但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美国遭受到 911 袭击，以及美国先后出名阿富汗和伊拉克期间，美国的各大新闻媒体包括 CNN 等都显得非常爱国。这真让我迷糊了。因为那时我也对美国媒体有了一定的了解，确实知道这些媒体是享受充分独立和自由的，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是什么上下级关系。那么他们怎么都那么爱国起来？好像是白宫统一安排了舆论导向似的。

这个问题也就放下了，直到两个月前我到香港参加文学节，正好和前 CNN 驻北京首席记者芮贝卡（Rebecca Mackinnon）同台主持我的作品研讨会。芮贝卡父亲是汉学家，她自己说很流利的中文。她以前长期在 CNN 工作，从 1992 年到 2001 年在 CNN 驻北京站任首席记者。我最早见到她就是从电视屏幕上开始的。她目前在香港大学从事媒体教学工作。以她对 CNN 的了解，我想，我自然会为自己的问题找到最准确或者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在我们一起吃中饭时，我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说，一向对美国政府桀骜不驯的新闻媒体特别是 CNN 怎么一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就忽然爱起国来，弄得我不得不怀疑白宫有幕后黑手在操纵。我想，芮贝卡一向对美国的媒体拥有比较独立和公正的看法，对中国人民也持友好的态度，她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芮贝卡的回答证实了我的观察没有错。那段时间，CNN 等美国大媒体确实“挺爱国的”。但她纠正我说，政府没有给压力，白宫更不敢干涉，也不会是因为 CNN 的老板是美国人这些原因，主要原因是有一双更加有力的无形的大手在操控。芮贝卡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向我解释。

阿富汗战争期间，她曾经带一个（日裔）摄影师前往阿富汗前线，为 CNN 作现场报道。她说，作为一名记者，她自然知道该报道些什么。当时，阿富汗战争刚刚打响，很多阿富汗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当时芮贝卡所在地方（名字我记不起）正是遭受战乱的阿富汗穷人逃乱的必经之地。芮贝卡看不断涌来的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的炮火下不得不逃离家园，扶老携幼，有的妻离子散。于是，具有敏锐新闻头脑和人文关怀心的芮贝卡把这些难民的真实生活都一一拍摄下来，不停地发回美国 CNN 总部。

就在芮贝卡以为找到了最好的新闻素材，干得正起劲时，来自 CNN 的指令下来了。指令要求芮贝卡少报道一些这些（难民）——这些被美国炮火赶离家园的难民潮对于美国那场反恐战争来说毕竟是负面的消息。CNN 总部希望芮贝卡多报道一些来自阿富汗前线的能够激励美国人爱国心的新闻。CNN 总部的理由很简单：观众不爱看那些难民，他们要看反恐的，爱国的。

芮贝卡给我讲这件事后有些无奈，她说，现在你明白了，CNN 为什么爱国了吧。不是政府让他们爱，更不是他们那些老板良心发现突然想爱国，而是因为当时美国观众们在 911 后正在爱国的兴头上，不喜欢看那些“不爱国的”——如美国发动的战争造成的大量的难民。

当时 CNN 的对手福克斯新闻（FOX news）狂热地支持布什政府（福克斯一直为难克林顿政府），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CNN 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迎合美国主流的爱国激情，CNN 不得不放下一些原本够料的新闻，而去报道能够激起美国人爱国热情的东西。

芮贝卡后来离开了 CNN，我想这也许就是原因之一，她对于那些超级的国际大媒体持一定的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往往为了收视率，为了广告，为了迎合主流人群而放弃一定的新闻原则。

现在不妨把话题转到最近 CNN 主播卡弗蒂的辱华事件上，我想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认识谈一些看法，与网友商榷。

1）卡弗蒂的话是不是辱华？

我一早就从网络上看到了卡氏的那段话，今天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核对了英文原文。从我自己的理解来判断，卡氏的讲话确实侮辱了中国人民，他可以说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那个“他们”可以指中国政府也可以指中国人民。然而，从话语的上下文来看，卡氏说他指责的是中国政府这件事有些牵强。所以，可以这样，卡氏的话是严重地辱华，而且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卡氏为什么在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后辩称他是批评中国政府呢？原因很简单，按照西方媒体的标准，任何媒体和新闻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力，至于批评的是否有证据，是否正确，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媒体拥有批评甚至攻击政府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为自己辩解时，卡氏率先抛出了这一点。

卡氏当时说了一长串的话，是关于贸易和“中国产品是垃圾”的。我认为说中国产品是垃圾并不构成辱华，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都是很便宜的，相对于欧洲进口的自然质量不高，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安全问题（据说美国最近要公布中国产品安全问题调查），所以，一个新闻主播带着激动的情绪说“中国产品是垃圾”并不构成什么辱华事件，听说一些公司要起诉，没有这个必要。可是，这位卡氏话锋一转，就说到中国人身上，什么五十年来都是——

这句话，无论按照中国标准，抑或是美国标准，都超越了一个新闻主播的底线，不单单是侮辱中国人，而且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了。卡氏在这句侮辱的话语里虽然使用了一个时间概念（“近五十年”），这也就成为他强调的他在攻击“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的依据。

无论卡氏如何辩解，中国人这一次是有理由要求道歉的。问题在于：我们该使用什么方法对付 CNN？

2）CNN 为什么对中国政府的抗议和愤怒的中国民众漫不经心？

中国外交部连续三次提出严厉交涉，谴责并督促一个私人媒体 CNN 做出真心的道歉，中国大陆网络爱国者也大张旗鼓口诛笔伐，更有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举行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真可谓众志成城。

可是迄今为止，不但西方媒体鲜有报道，而且 CNN 也按兵不动。确实让人费解。然而，结合我上面的故事——CNN 为何忽然爱国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无论西方媒体如何标榜新闻自由，讲究职业道德，他们充其量还是一个赢利的跨国大公司，他们也有上帝——就是他们的观众，也就是暗中操控他们的那只无形的手。从某种意义上说，

抛开自由民主等这些核心价值不表，西方媒体要供奉起来的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广大的西方观众。当然，这和他们崇尚民主自由并不一定矛盾，因为西方的绝大多数观众已经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CNN 的情况，它的上帝——观众在哪里？很显然，现在起来抗议他的中国人，几乎一个都不是他的观众。中国大陆民众根本不允许看 CNN，CNN 的收视率自然从来不把中国的观众统计在内。

CNN 的衣食父母，和控制它的那只巨大的手——观众几乎全部在中国大陆以外，那么，中国外交部目前连续三次提出抗议，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在外面的观众——特别是西方的观众看来，又是什么情况？

问题就出在这里。目前从中国大陆网络到中国外交部以及席卷全球华人圈的谴责和抗议 CNN 的活动，看在 CNN 的观众，特别是西方的观众眼里，对 CNN 不但没有损害，甚至正在直线提高它的收视率。我想，就这一点来说，CNN 的高层也许此时正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直乐。

中国网民、外交部和全球留学生抗议 CNN 事件不但 CNN 本身鲜有报道，其他大的电视台如 FOX 和 BBC 等也很少报道，为什么？这当然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但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举例说，当 FOX 报道 CNN 遭到 13 亿中国人的抗议的时候，那么十有八九的正在观看 FOX 的观众会立即转台去看看 CNN 到底出了啥事。而且，还有一个让我们难堪的现象就是，在目前西方人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记者动辄因言获罪。于是，头脑简单的西方人也就会以此反推：得罪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惹得没有新闻自由的 13 亿人愤怒的 CNN，一定是我们西方为之自豪的新闻自由的榜样。此时不看，更待何时？

我的分析当然不是全面的，只是就某一方面深入浅出。但是，我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那么，这样分析下来，是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被一个电视台的主播侮辱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要忍受？就要不了了之？

那也未必，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3）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在我提一些建议前，我首先表明，外交部目前连续三次严重交涉，以及一些民众自发组织抗议，都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但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又或者说，我们是否还有更见效的方法？这些都应该群策群力。

我提几个看法：

第一，CNN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媒体，它的触角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可想而知，它在中国自然也有办事处，而且业务量也不会小。这就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如果它不配合我们的要求真诚道歉的话，我们把它赶出中国。那样对于一个世界性的大媒体，被赶出了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自然是损失惨重的。可是，这种方法绝对不能用，因为这种方法在世界上造成的对中国政府形象的损害相比于我们赶走了一个私人媒体获得的尊严要大得多，得不偿失的事我们不能做。更何况今年是奥运年。

第二，按照我的分析，CNN 之所以对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和民众的声讨置若罔闻、漫不经心，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但不影响它的收视率和经济收入（主要是广告），而且甚至有可能让它在西方获利。从这里我们看出来，就算如 CNN 这样的超级媒体，剥掉了冠冕堂皇的外衣（新闻自由等），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企业，一个追逐利润的公司，为老板和股东赚钱赢利是它的目标。那么，中国是否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我想还是有的，据我观察，CNN 的大量广告来自中国大陆和华人世界，如果 CNN 不对辱华事件做出更真诚的道歉和处理，如果中国人够团结的话（真像愤青们说的那么团结的话），威胁 CNN，停止所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华人世界的广告，将会对 CNN 造成巨大的打击。
第三，但那绝对不是致命的一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说卡弗蒂是有名的大嘴巴，也是“臭嘴巴”，他不但辱华，也侮辱过无数的人包括美国人，可是，我们即使通过抗争，让 CNN 解雇了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能够改变什么？我们能够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吗？能够保证不会有更多的卡弗蒂出现在西方人的电视台里？我们当然不能，西方媒体不可能因为一个不发达地区的一些侨民和留学生的抗议，就改变他们上百年来形成的新闻模式和理念。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方法倒是有，不过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那就是从操控西方媒体的那只无形的大手入手——也是西方媒体的上帝——西方观众、西方民众入手。增加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把中国开放给西方普通民众。

俗话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按说，西方媒体敢于屡次歪曲对中国的报道是有西方民众撑腰的，或者说有民众的基础。说到这里，有人也许就说了，西方民众不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吗？那不是恶性循环？话是这样说，但却不尽然。因为在西方包括美国毕竟还是有新闻自由的。至少，如果你愿意，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在全美国都可以收看得到，没有人会屏蔽你。这些年中国人在西方媒体投入的钱，明里的暗里的，不可谓不多，就拿中文报纸来说，基本上都能够越来越多地正面报道中国大陆，越来越多华人媒体转向，开始走上正确引导华人的舆论导向这条路。

西方观众如果想看，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节目也是完全可以看到的，但据说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是我们的新闻联播，可在美国除了搞情报的以及那些和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华人外，很少有人会去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这并不是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中国大陆的朋友大多想看海外的新闻节目却看不到，而西方人可以看到中国的新闻节目却根本没有人愿意看。

虽然说我们的新闻媒体具有中国特色，但不要忘记，新闻媒体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我们虽然谴责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新闻，但却不能把自己孤立于西方媒体之外。西方媒体在舆论监督，民意表达，以及报道真相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中国想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想从坐在电视机前的上帝——观众入手，彻底解决问题的话，还应该在自己的新闻媒体的改革上加大力度，学习西方媒体的积极一面。放弃一言堂，放弃只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模式，放弃把新闻当成喉舌，当成说教的工具——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的这些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吗？当然有，也许不能立即解决问题，但却能够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中国一向是可以用大钱集中起来做大事的，可是，迄今为止，13 亿人的大国怎么就无法弄出一两个国际性的媒体？在美国开办电视台和办办报纸都是绝对自由的，我们为什么办不起来？没有人看，为什么没有人看？如果我们拥有能够得到世界观众信任的媒体，就能够把更公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以上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在我们发现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存在偏见和偏激的时候，我们是否反省过，中国大陆的媒体是否对世界也存在严重的偏见和偏激？

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世界的歪曲和偏激也是让人胆颤心惊的。要知道，我这里不是小看 CNN，以我对他们的理解，他们那个辱华节目的收视率并不怎么样，而且，就算西方观众听见了他的辱华，也不会太介意，影响也很有限。而且美国观众有很多选择，甚至有权选择看你的中央电视台。

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媒体就不同了，基本上是一个声音说话，所以，以前出现过关起门来，八亿人民激动兮兮，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解放全世界的奇观。现在当然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

一个在自己的国家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的，言论自由还有待发展的国家，且不要说在面对世界时会显得过于简单、易于愤怒，容易受伤，而且也是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民众真心地尊重的。

还有一个事情不能不提，因为看到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涌上街头抗议西方媒体的对中国的偏见，我很高兴，因为对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但我们大家激动之余都不要忘记，西方民众了解中国不仅仅是通过那些西方媒体，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住居在他们国家的华人华侨以及特别是中国留学生。

说到这里，也该结束了，我只希望最后我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也要问自己一句：除了这一次我站出来抗议西方的媒体歪曲报道中国、表达爱国之外，我平时在西方的一言一行和所作所为，是否能够让西方人看到一个和平、文明和尊重人权与普世价值的中华民族的身影？而且我再问一句：通过这次我们全球总动员来举行针对一个 CNN 的游行示威后，西方媒体也许会有所收敛，但那些媒体的上帝——西方民众到底会如何看待我们？！

杨恒均 2008-4-22

马桶上的政治

上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欧美一些国家搞了一个评比，请各国民众投票选出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结果你一定想不到，既不是原子弹，也不是互联网，连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也名落孙山，排名第一的竟然是——抽水马桶。

一开始我还以为外国人恶搞，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坐到抽水马桶上使劲一想，才“扑通”一下想通了。原来，这抽水马桶带给大家方便时的方便，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我小的时候，每年都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在上厕所时双腿疲软体力不支，或者一不小心，一头栽进大粪池里活活——淹死？我一直认为是臭死的。真的，我不骗你，不相信，你去试一下蹲在一个大化粪池上“方便”的滋味。我向你保证，那比没有互联网和民主自由更让人难以忍受。

我是大学毕业到北京参加工作后才第一次住进了有抽水马桶的房子。对这玩意儿，几乎是一见钟情。从那以后，每天都离不开了，估计如果终老前不是病得卧床不起的话，一定会和它白头偕老的。当然，我情有独钟的还是自家的马桶，那份静谧那份舒坦那份惬意那份浪漫……

你没有从我文章中感觉到特别的味道吗？

不过，由于满世界跑，总不能背着自家的马桶吧，所以，我和世界各地的抽水马桶也结下了一段又一段的奇缘，当然大多是“一夜情”。

下面，本人根据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总结一下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旅行时与天下的抽水马桶们相遇的情形……

啊，忍不住了，请问，厕所在哪里啊？……谢谢，然后你推门进入机场、餐厅、商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厕所，推开一个小门……

第一种情形：一股臭气扑鼻而来，你几乎想落荒而逃，找个荒山野岭就地解决。但情况危急，时不我待，你只好憋气吞声，左手捂住鼻子，右手去摁抽水马桶的冲水钮，“哗啦”……你不敢看，但听到它们都被争先恐后地冲走了，你身体却更觉沉重，可你不敢坐下，你得先忍住。于是，你撕下一大条卫生纸或者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消毒纸巾，用两个手指夹住马桶圈，轻轻放下，然后，你开始有条不紊地工作，你先得一点一点擦洗靠背和马桶圈，那上面一定有很多水滴——谢天谢地，但愿是水滴啊。有时马桶圈上有鞋印，你就得使劲擦，擦洗过后，你再次冲水，然后用卫生纸垫在马桶圈上，然后，你小心地慢慢地坐下——注意，一定要小心一点，你不能确定这个马桶的身体是否依然健康，如果禁不起你压，那就成“大事件”了。然后，你总算松了一口气，随即松了更多的气……方便过后，如果你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很有德行的人，你会顺手再按一次冲水钮，然后拍屁股走人。

第二种情况是我到香港和后来到欧美澳等国家碰上的。刚刚出来时对比特别明显，甚至有些不习惯……推开那扇小门，那白白胖胖丰腴得有如杨贵妃似的马桶亭亭玉立地等在那里，一副哀婉可怜、不见不散的样子，简直让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你“呼哧”一屁股坐下来。坐下后才大吃一惊，竟然忘记先冲水，也没有先清洗一遍啊，不过来不及了，好在朝四周一看，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着习惯性地冲一次水，正因为太干净了，你忘记了当一次义务厕所清洁工……

这种前后鲜明的对比让坐下来后的你开始前思后想，这并不是宾馆的厕所啊，好像也没有清洁工啊，而且，国外的清洁工实在太贵，这些公共厕所哪里请得起那么多清洁工呢？

可是，刚进来时就发现这里这么干净，好像刚刚被清洗过似的，怎么回事？蹲了几次，我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是通过偷听和观察隔壁那个抽水马桶上的老外的动静得来的。看起来一进来就坐上马桶的绝不是我一个，但在他们使用完冲水后，我却发现他们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听到卫生纸擦拭的声音，然后再听到一次冲水。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我推门进来看到这么干净的抽水马桶是上一个使用者擦拭过的。

好吧，肯定有人又要说我借题发挥，要用中外如何使用抽水马桶来对比民众的素质、文明与非文明以及民主国家民众的真正无私了。

我现在讲的可是比互联网、原子弹和民主自由更重要的发明——抽水马桶啊，你就不能暂时忘记一下民主自由？你扯到文明、文化和道德的差异上，我能够理解，但我切身的感受却让我觉得这次真的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智商问题。

第一，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你到公共厕所去方便，一定会清洗抽水马桶的(特别是坐圈)。请注意我上面讲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坐下前一定会清洗掉排泄物，特别是马桶圈和后背的“水滴”；第二种情况下，也得清洗一次，但不是进来的时候，而是起来后离开前。两次清洗的劳动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第一种情况，你为大家清洗粪便；第二种情况，你清洗自己留下的污迹。

第二，清洗他人的粪便，你是在做好人好事，比目前公布的雷锋同志的事迹还感人（雷锋没有帮不认识的那么多人清洗过厕所吧）。但你做好事的态度成问题，因为你得捂住鼻子带着厌恶，甚至在心里还咒骂前一个使用者：妈的，吃什么东西，这么臭啊，你去死啊！而第二种情况下，前一位使用者已经替你清洗好他使用过的抽水马桶，你放心使用，使用后你

清洗自己用过的，这时，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全身轻松了，而且，你也觉得，自己的污迹总是没有别人的那么难闻。
第三，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当你走进中国大陆一个臭气烘烘的马桶旁，或者坐在澳大利亚一个干干净净的马桶上，你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自私自利的中国人比起来，素质高的外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真是惭愧啊。如果你这样想，我就要嘲笑你的无知了。因为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外国人很自私，他们"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们蹲过马桶后之所以要清洗干净，并不完全是不想把臭味留给下一个"伦敦"者，而是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使用后不清洗，你使用后也不会清洗，大家使用后都不会清洗，那么，下一次他再进入厕所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们每次都能跑回家坐马桶吧），他需要弯下胀得难受的肚子清洗他完全不认识的某个人奇臭无比的大便。
从这方面说，中国人要无私得多。你只要蹲过公共厕所，你都能够在单位学习中自我表扬曰：我学习雷锋好榜样，曾经无数次地清洗过同胞们的大便，义务干过厕所清洁工；你还可以到没有机会出国的同胞们面前自豪地高喊："在中国，我为国人冲厕所；在国外，老外为我洗马桶，啊！"所以我说，中国和澳大利亚人对待抽水马桶的不同做法，和文化、文明、人种和宗教都没什么关联，也请不要和个人品德联系起来。因为，你很难解释这样一个现象：难道私德不好的中国人竟然喜欢清理别人留下的大便，为此而不惜把自己的大便留给别人？
不好意思，怎么一和抽水马桶联系起来，人就变得粗俗了？我还是文明一点吧。其实，文明一点的说法也有，而且是约定俗成的，那就是如今的中国人搞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个"互害的社会"。大家都在做一样的工作，但却互相伤害，又并没有获得更大的利益。这里只是举抽水马桶的例子，其实，国人所做的千奇百怪的互相伤害，绝大多数的伤害程度当然要比大便的臭味更强。
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每个人几乎做同样的工作，却形成了一个"互利的社会"。差别如此之巨，原因何在？从抽水马桶的例子，我想你怎么都说不出是文明、人种、道德和宗教的原因吧？在抽水马桶事件中，唯一的区别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如厕之前和之后冲洗厕所，这其实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约定俗成的规则，但会让你感觉到胃部不适的痛楚。
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和发达国家的差别，却没有看到希望。有些人要死要活，感觉到绝望，其实，这问题很容易想通，坐到抽水马桶上就能够想明白的：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也就是规定、游戏规则和制度的不同而已。
好了，如果你一下子没有搞懂我在说什么，去吧，到抽水马桶上去好好想一阵子……

谁有资格代表总理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博文：《和儿子一起上"小学"：寻求中国富强之路》（附后）。读者从博文中不难发现，澳洲的小学生肯定是接受国民教育的，学校还给孩子们灌输了不少爱国主义精神。可问题在于，这些年下来，我始终没有搞清澳洲的小学是如何对孩子们"洗脑"的。他们没有课本，也没有相关的科目，没带回家庭作业。问他们老师在学校如何教育他们爱国的，儿子是一问三不知。

小儿子也于今年升七年级（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初中一年级），看起来，我是没机会弄明白澳洲小学的国情教育了。在香港学生与市民对即将到来的国民教育实行抵制时，我又一次试图向小儿子打探他在小学时如何被爱国主义教育"洗脑"，但还是不得要领。

不过，9 月 8 日，就是香港特首梁振英最终做出让步时，我却意外地同儿子进行了一场对话，让我意识到澳洲小学的国民教育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把老子吓出了一身汗。事情是这样的——

9 月 8 日是星期六，开车带两个儿子出去玩，大儿子提到今天是地方选举投票日（选举地方议员与市长）。由于澳洲实行的是强制投票（过了 18 岁必须投票，否则罚款 50 澳元），过了 18 岁的大儿子对地方事务并不熟悉也不关心，为了公平，他决定放弃这张选票，准备向票箱投空票（作废票）。小儿子听到后马上插进来说应该投票给现任的那位市长。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认识"那位市长。原来市长到过他们的小学，去讲过澳洲战争历史，激励学生们爱国。小儿子特别强调，那个市长当时没有为自己"拉广告"。他之所以要求妈妈和哥哥投票给这位市长，是因为他觉得市长讲得不错，后来他还继续关注了市长，发现他对小学很重视，说了很多"很酷的话"。

我问儿子，如果你收集了哥哥的选票投给他，可他并不兑现自己所说的，怎么办？小儿子竟然脱口而出：下一次我们"搞掉"他吧。

我大吃一惊，发现对话开始有点意思，这话放在我来自的那个国家，很可能是"颠覆"罪啊，可儿子竟然以玩游戏的口气轻飘飘地说出来。我忍不住问他，怎么"搞掉"人家一个市长？儿子哼了一声说：我就再劝你们都不投他的票，他就完蛋了。

儿子显然太看重一两张选票的重量了，不过我发现，对话到这里，还可以更进一步了，于是我问：你根本没有投票权，怎么可以拿哥哥和妈妈的票投给他？儿子反驳道，这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我有更多的票，也许还能干点更大的事，也许能让他多给我们玩游戏时间，也许还能赚点钱。

听到这句，我是差一点把车开到沟里了，我知道他整天想赚钱买网络游戏，但没想到竟然想出了用选票去换钱，我说，儿子，你小小年纪，还没见过选票，就想搞贿选？

儿子漫不经心地说，贿选是什么？（经我解释后）原来是这样，这也没有什么嘛……对话到此结束，儿子在"民主小贩"面前一点也不避谈贿选，却并没有引起我的不安，毕竟他才上初中。令我惊讶的倒是，他小小年纪，竟然知道了选票的厉害，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他喜欢的候选人拉了两张票（后来他亲自监督这两张票被投进了票箱）。沉重而复杂的政治课在儿子小小的脑袋里，可能就浓缩成了一张轻飘飘的选票。而这选票，难道不比所有的政治课更重要？

投票结束后，我故意同儿子继续谈澳洲的选举与民主，我发现，他竟然边玩游戏边听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夫人米歇尔的竞选演讲，尤其是奥巴马夫人的演讲，他听了一大半。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的造势演讲，竟然能够吸引一个初一孩子，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于是，我也仔细听了一遍米歇尔的演讲，发现美国的价值观，对自由和民主的重视，对个人与家庭的珍惜，被奥巴马和夫人这样的政治人物以如此鲜活、生动的形式呈现给世界，无意之中，又是对孩子们的一次"洗脑"啊。但这种"洗脑"，比那种一边强迫孩子们爱党爱官，一边让自己的老婆孩子官商勾结、大发其财，显然有不同的效果。

当我再深一步试图同儿子讲政治时，他反而毫无兴趣。尤其对民主两字，根本不知道我在说啥。我问儿子，长大想从政吗？就是当市长什么的？他立即满脸不屑地说，当然不想，无聊乏味，还被人盯住，又要到处讲话，累死了。我问儿子除见过市长外，还见过谁，他想了想说，还见过澳洲总理吉拉德。我又大吃一惊，心想，你小子什么时候见过那个女人的，老子怎么不知道？

他告诉我两年前学校组织他们去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参观，走进去的时候，澳洲总理吉拉德正在发言，他们坐下来观摩了总理与议会的论战。就在他们在场时，观众席上有人抗议，被警察“请”了出去。老师告诉他们，抗议政府和政治人物是澳洲公民的政治权利。说到这里，他又告诉我，不久前，反对党领袖在议会骂吉拉德“撒谎者”，也被请了出去……

我这次到澳洲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而整天玩游戏的初一学生竟然都知道，这让我不禁陷入思考：我至今没有看到儿子有政治课，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国情教育”了，但好象他对澳洲的了解并不浅，对政治运作也一知半解，甚至都想利用手里的选票去赚钱了。看起来，澳洲的国民教育还是很成功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啊。

国民教育是国际惯例，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但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下，国民教育从方式方法到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别。从 13 岁儿子身上，我看到澳洲小学的国情教育，既告诉他们国家走过的辉煌，也坦诚告知他们政府犯下的错误（见附文）；学校没有充满教条的政治课，但老师和政治人物一边会向孩子们灌输爱国主义，更重要的却是从小培养孩子们权利意识——选票与抗议的权利。国民教育与国情教育是为了个人发展、国家繁荣与民族崛起，不会以一党之利与某届政府的得失为主轴。明白这点，对于大陆处理好香港问题大有裨益。香港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对其中的“一国”，无论是大陆的孩子，还是香港的孩子，都应该有所了解，但如何了解，了解什么，香港应该有适合自己制度与环境的自主选择，这也是符合小平的“一国两制”的。

杨恒均 2012.9.10 教师节 （向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致敬，鄙视那些扭曲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中文好的澳大利亚总理为何读不懂中国

中国很多朋友希望我讲讲当今的国际关系，其实相比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当今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实要简单得多。而且，国际关系又多是国内各种矛盾和关系之延续。一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和它所拥有的价值观，就是指导这个国家外交关系的两个大原则。
由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之间，基本上都拥有了相同或者类似的价值观，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要简单很多，就是一个“争钱夺利”的关系。可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同了。如果以为拿钱去买他们的东西，再把中国制造的东西卖给他们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和平相处”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
如果要找出一位最懂得中国的西方国家首脑的话，那一定非陆克文莫属。迄今为止，我印象中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西方国家首脑能够像陆克文一样说如此流利的中文。而且，对陆克文上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观察显示，对中国他是非常亲善的，他的亲善甚至扩散到对澳大利亚

华人社区的关心。
陆克文刚刚当上总理时，由于经常说中文，又对中国多有褒扬，加上好像有一次在外交场合还同中国来宾说中文，结果遭到了反对党的猛烈攻击，也受到澳大利亚媒体的诟病，指责他亲华亲共，说他媚态十足，话说得很难听。那段时间我在澳大利亚，就我的观察，陆克文对中国友好属于“真情流露”，大概由于学中文的缘故，他确实对中国比较亲近。但受到反对党攻击后，他有所收敛。
可是，时至今日，陆克文的态度为何 180 度大转弯？不停激怒中国政府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弄得中澳关系也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高处直落低谷。难怪有些观察家惊叹看不懂陆克文了，不知道他“意欲何为”，更多的人则认为是陆克文看不懂中国所致。
其实，不是陆克文看不懂中国，而是那些人看不懂澳大利亚的外交。陆克文的对华外交根本不是建立在他对中国有多少了解之上，也不受他个人与中国的感情所影响，而是他对澳大利亚有多少了解，以及澳大利亚人想让他如何处理中澳关系。陆克文是一名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政客。选举他的是澳大利亚人，不是中国人，所以，无论他的内政还是外交肯定是要对他的选民负责的。他努力去读懂的是澳大利亚，而不是中国。
力拓案发生后，被澳大利亚媒体渲染成政治事件，澳大利亚民意有很大的反弹。这件案子由于牵扯到巨大利益，被一些人暗中操控，成功地激起了从去年开始就在澳大利亚人中酝酿的反感中国的情绪。奥运会火炬传递时，澳大利亚的民意中开始有一股暗潮在涌动——就是我们说的“反华”，澳大利亚人认为的“反共”。这股暗潮在力拓案后被澳大利亚媒体煽动起来，一度成为主流。

陆克文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澳大利亚民众和媒体对华态度的转变，作为一名民选的领导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应民心”，以便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所以大家也注意到，当他在说到中澳关系的时候，他不是面对中国，而是好像在对澳大利亚人喊话一样。事实上，他强调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兼顾利益和价值观的观点，得到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认同。至于如何兼顾利益和价值观，就是实行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的政策。
陆克文在澳大利亚人面前对中国强硬，凸显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并没有耽误同中国做生意。例如，就在大家眼看中澳关系陷入低谷时，中澳两国竟然签署了价值 500 亿澳元的天然气协议，中国公司还向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企业投资 70 亿澳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这说明什么？两国政府都非常理智，都不会头脑发热。在网上看到不少中国的网友头脑发热、义愤填膺了。正如当初声称不要买法国空客和美国国债一样，现在也要求政府不要买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好像他们不买澳大利亚的天然气，人家的天然气就得当屁放掉，澳大利亚人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似的。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有钱买第一架飞机前，法国就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了，今天，就算中国把所有的空客都换成波音，法国在世界上的富裕排名也不会下降的，甚至每年的 GDP 也不会少一点。更
何况，当你把所有的空客换成波音的时候，你也许才发现，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要远远大于中法之间，那时又怎么办？难道再把波音一个一个换成空客？
这种游戏玩不得，中国在国际上没有那么牛，多出去走走就知道了。在西方富裕国家，中国因素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创新率几乎等于零）。只有生活在中国大陆两耳不听墙外事的人，才时常感觉到我们在世界上牛哄哄的，其实我们是被自己的宣传以及断章取义节选自西方人写中国的文章弄得“被强大”了。
生意归生意，政治归政治，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是少数几个和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之一。如果我们把生意当成外交的砝码，最终受害的不是他国，而是我们自己。西方人唯利是图毫无疑问，但更加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不会为了利益真

正去损害他们的核心价值观。
中澳关系目前处于低谷，但很快会走出来的，这正如去年中法关系处于谷底，现在基本走了出来一样。但千万别以为我们到家乐福抗议，或者抵制法货起了作用，更别以为不到法国采购就改变了人家的外交政策。相反，目前继续做生意的中国和澳大利亚，很可能会更快地走出关系的低谷。两国交往的原则应该是不能让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受损，同时不能为了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核心价值。
其实不需要陆克文读懂中国，中国只需读懂自己，就能够很好地把握国际关系了。但毕竟，陆克文懂中文，这倒让人有点担心。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不妨到澳大利亚的报纸和网站上去看一下，虽然有一些批评中国的文章和帖子，但对我国领导人口诛笔伐，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的帖子几乎没有。然后，你再看看遍布中国各大网站的新闻跟帖和论坛帖子，看看中国网民是如何批评、嘲讽，甚至攻击和辱骂陆克文的。
你说，如果陆克文真想读懂中国，正好又看到了那些帖子，会怎么想？
2009.08.26 北京

换裤子的时间澳大利亚就可以换一个总理

早上起床，吃早餐的时候顺手打开电视机，看到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正在主持一个党内选举的会议。因为要去唐人街会朋友，我匆匆吃罢早餐后走进房间换了一条裤子，穿戴整齐准备出门，拿起遥控器关电视机时却瞥见屏幕上换上了陆克文的副手茱莉亚•吉拉德讲话，下面打出的字幕竟然是：澳大利亚新总理茱莉亚 •吉拉德。
我大吃一惊，原来在我换一条裤子的时间里，澳大利亚竟然换了一个总理，而且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60 后，没有结过婚，目前和男友同居。
我因换了一条裤子而错过了澳大利亚政坛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刻。澳大利亚实行的内阁制与美国的总统制不同，四年一次的大选，选的是执政党而不是最高领导人。澳大利亚的总理职务是由选举上台的执政党党魁出任的。
像今天这种情况很少见，那就是执政党搞了一次“党内民主”，把党魁给换掉了，按照法律，也换掉了澳大利亚的总理。我出门的时候，在火车上，在街道咖啡厅里，听到很多澳大利亚人在谈论这件事，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好像议论同事身上穿的一条新牛仔裤似的。
工党这样做其实也是冒一定风险的。2007 年的时候，大家选这个党执政，很多选民可能也因为同时看好陆克文这个人。当然，工党大佬们换掉了陆克文的理由也是为了今年十月份的澳大利亚大选。他们声称，如果让陆克文继续当党魁，工党有可能在十月份选举中失去执政党的地位，那时，总理职位就是人家的了。
澳大利亚大多数媒体也是这样议论的。我一直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没什么兴趣，可既然正好碰上了如此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也就多看了几眼新闻，心中免不了生出疑问。这两年陆克文的民调都居高不下，高得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虽然最近跌得厉害，可仍然高于在野党推出的候选人。而且，离大选还有好几个月，作为总理，陆克文争取连任的机会还很大。可他的党说他“独裁”，不和党内大佬商量而做出一些决定，破坏了常规和游戏规则，于是就把他给提前“民主”掉了……
我一直对西方民主产生的政治人物有兴趣，在研究他们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归类。例如，我按年龄、出身和性格、行为方式等把陆克文、奥巴马归成一类领导人。他们出身普通（甚至底层贫困）家庭，野心勃勃，靠奋斗爬到最高位置；他们始终充满激情和战斗精神，内心时常愤怒，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不满，对底层民众生活熟悉，而且常常想打破常规帮助民众做

一些事；他们的激情、能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常常让他们大起大落，民调也像过山车一样……

虽然从来没有深入研究澳大利亚政治，可政治直觉告诉我，陆克文下台和他的这种性格有直接关系。目前最明显的原因是他坚持要征收高达 40%的矿业暴利税。大家想一下，矿产资源可是澳大利亚的大产业，澳大利亚很多大富翁都是矿业巨子。陆克文要征收矿业暴利税，首先得罪的是谁？当然是澳大利亚最富有的那个阶层。这段时间，他们几乎是群起而攻之，估计用来倒陆克文的钱绝对不会少。

澳大利亚是高福利国家，征收的这些税收最终会用在哪里？相当一部分会成为福利，用到穷人和普通人身上。所以，如果等到十月份选举，即便陆克文执意要征矿业暴利税，他仍然可能连任。可是，谁让他得罪了澳大利亚最富有的那批人？他得罪得起，他的党也得罪不起啊。

于是，工党的大佬们联合起来，逼迫陆克文今天临时举行“党内民主”选举会，把他自己给选掉了。

这里只是挑选一个突出的问题，简单议论两句，政治当然不会如此简单。每一个执政者都有失误，但如果陆克文所在的体制和美国是一样的，这些失误绝对不会让他失去最高领导人的宝座。更何况，陆克文在位短短几年，干了很多了不起的好事，例如，他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向原著民说“对不起”的总理，他带领澳大利亚人走出了金融危机，他比较草根，对富人征税，有可能用于相对不富裕的澳大利亚人。

也许有人说，陆克文的下台，难道不正说明西方的民主是富人的钞票操控的？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例如，澳大利亚人当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不是“矿业巨子”，可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对政府加税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有天生的反感。你今天可以对澳大利亚矿业征收暴利税，明天也可以对其他行业征税啊。福利往往帮助的是低收入人群，而在澳大利亚，中产阶级才是最大的群体，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加税。

再以奥巴马作为例子。美国的总统制不可能让奥巴马中途下台（如果他不违反宪法的话），可是，有理由相信，如果从奥巴马去年的表现看，他真有可能只干一届就得搬出白宫，去找新地方住。他和陆克文上台后的民调都像过山车一样，高得吓人，跌得可怕。

奥巴马上台两年折腾最多的是全民医保，现在总算向他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大家可能纳闷，美国有四千多万没有医保的人，奥巴马的医保改革，让三千二百万低收入的美国人受益，为什么他的前任搞了大半个世纪都不能成功，而他在几乎要成功的时候，民调竟然会跌得如此之低呢？

大家看一下，他推行医保都得罪了哪些人：全美的保险公司和美国商会。你知道他们的势力有多大吗？在奥巴马搞医保改革的去年，全美商会仅仅一年就花了一亿四千五百万美金，专门和奥巴马作对；而保险公司每天都花费一百四十万美元反对奥巴马的政改方案——所以啊，各位，你在网络上看到的辱骂奥巴马是希特勒和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很可能是美国“五毛党”写的。

也许又有人要质疑，奥巴马为穷人着想，要搞全民医保，为什么民调（选票在平时的表现形式）如此之低？

简单一点说：你看到了三千二百万低收入的美国人，可你看到了比这个三千二百万低收入人群要多得多的近两个亿的美国人没有？他们靠勤劳致富，靠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购买了医疗保险，结果，你奥巴马一上台，就把那些没有医保的穷人也“医保”了，请问，这些为数更多的将近两个亿的美国“富人”，他们心理能平衡吗？会不会有人从此再也不想出去工作了，等着你奥巴马来“医保”呢？

当然，又有人来质疑了：这样说，资本主义的穷人只有受苦受难的份，比我们富士康的工人还惨？你正好又错了，澳大利亚始终是高福利国家，这个国家的穷人是世界各国穷人中过得最舒服的。而在美国，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毕竟获得了通过。

扯远了，回到正题来。澳大利亚原副总理，现任澳大利亚新总理茱莉亚·吉拉德的同居男友是一位理发师。大家知道，这位理发师即便荣升为“第一家庭”的“第一先生”——错了，应该是“第一男朋友”，在澳大利亚这种民主国家，估计他还得继续给人理发维持家用。本人正在打听他在哪个理发店工作，等你到澳大利亚时，我带你去……
2010.06.25

对华外交怕中国

美国外交有两根支柱：价值观和利益，或者说它的理想（民主、自由宽容等）和它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本性。这两个支柱孰重孰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我想，要争出个结果，分出老大老二，可能不容易，每个普通读者手里都有一大堆美国偏重两者之一的“证据”，更不用说专家学者了。

我反对的是一些人用一个支柱否认另外一个支柱，例如，有人说美国人在国际上唯利是图，完全有违它在国内高举“民主、自由、法治和宽容”的理想形象；又有人转弯抹角来证实美国人哪怕在国际上胡作非为也是最终为了“民主自由”的大理想。这两者都有失偏颇，走了极端。

我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没有在国内事务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大多时候是“唯利是图”的，但美国人也知道从长远利益看，在国际上推销自己的价值理念，让世界各国都接受它认定的价值观，往往会让自己更加“有利可图”，所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并不都是鼠目寸光到唯小利是图。

在分析美国的外交和内政的时候，最好能够用例子来说明，美国是地球上最注重理念，却也是最务实的国家。我先拿冷战时的美国外交来说事，很清楚，那是长达三十多年的意识形态之战，也是理想和理念之战。能说冷战中的美国是唯利是图的？如果真是唯利是图，他应该向苏联东欧靠拢以开发市场发展贸易，而不是来拉拢当时相对穷困的中国。

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中一定要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要把民主和自由推广到苏联控制的铁幕另外一边，可是，让人困惑的是，它却对自己占领的韩国独裁一忍再忍，对蒋介石的威权也睁只眼闭只眼长达三十年之久，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答案，只是一些凌乱的思考。

主要的一个观点是，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喜欢听话和便于控制的“独裁”远甚于无法掌控的民主国家，这个有人提到过。我自己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想法：美国和西方的白人在骨子里也是文化决定论者，甚至有很深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欧洲（包括苏联和东欧）人天更适合民主自由这些需要国民有自决素质的制度，而亚洲（包括中东）、非洲等并不适合西方白人发明的这种最不坏的制度。

于是二战后美国虽然占领了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他们却只在欧洲、日本推行了民主制度，却并不急于在亚洲、非洲其他地方推行。那么，为什么也在亚洲的日本推行？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优等民族，是可以与西方白人世界抗衡的唯一的亚洲民族。至于台湾这些地区，他们就并不抱多大希望。他们要放弃和支持蒋介石，好像都不是因为蒋介石有多少民主宪政思想，而是因为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所以，我看到台湾的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几乎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与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意识形态政策相反，他们对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比苏联的更“社会主义”）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从三十多年前尼克松访问北京到 1979 年建交，总结过去中美建交后这三十年中美建交的历史，

可以说除了中间有短短不到两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底那件事之后）的理念之争之外，美国对华外交基本是基于利益考量。

当然这个利益考量也被冠上了一个大帽子：要实行接触政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要和谐相处，逐步影响中国，最后达到和平演变。其实，美国内部决策人很少有人真正认为能够和平演变中国的，倒是从去年开始，中央情报局有些担心中国已经开始“和平演变”美国了。

可美国人别无选择，毛泽东早就把美国这种纸老虎看穿了，而且，制定了保持社会主义不变色的百年大计。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鼓励中国人多生孩子，“人多好办事”，好办什么事？反正不是怎么好的事。例如，人多了不适合搞民主——好办不民主的事；例如人多了，就需要更少的人把他们好好管住，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再如，人多了，大家财富和智慧加一起一平均起来，素质也低了，人也穷了，于是就只能搞穷的社会主义……别以为我在调侃或者恶搞，实际上，连美国人也陷入了高瞻远瞩的老毛同志生前有意或者无意设计好的这个大圈套。你知道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而是，中国会不会乱——

美国确实有理由担心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因为中国的不稳定不但会摧毁自己经济，给美国主导的世界留下无力负担的大包袱，也会全面波及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以，我对华盛顿一位智库人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华盛顿有些决策者甚至比北京的一些当权者更加担心中国的稳定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中，有相当大一批人心中揣的对华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

本文试图以网络语言谈谈我对中美外交的看法，并无定论，大家不必用一种理念和模式来求全责备。其实，早就有很多人对美国对华外交持有异议，认为他们失去了理想。甚至连每一次的总统候选人也在大做文章，我们记得，克林顿上台的时候就攻击老布什“和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拥抱”，可等到小布什去竞选总统的时候，又着实把克林顿与北京的“战略伙伴关系”讽刺了一通。现在这位奥巴马也不例外，一上去就在美国内部高层紧密锣鼓地制定和平演变中国的新计划，但不到三个回合，你放心，他一定先被北京演变过来。

从客观上说，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但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利，也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而且随着中美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交流的进一步深化，任何试图改变方向的做法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都会遇到无法预测的阻力。

前几天在香港时，有美国官员和智库研究员向我了解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我想他们大概是为了奥巴马访华收集一些信息和情报，我如实告诉他们我这几篇文章中将要写出来的一些看法，之后，他们问我，那你认为美国政府在促进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上能够做些什么？

我对这个问题完全失去了兴趣，摊开手说，他想做什么我不管，但我知道，他可能什么也不会做，或者什么也做不了，又或者他做了也毫无效果。

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这些年对中美关系乐观其成，但却并不寄托什么新的惊喜和希望的一贯立场。已经好些年了，我不再愿意和美国人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等问题，我知道他们能够做的很有限，有限的作为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更加有限。再说，政治民主化、法制、自由和体制改革等等，那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不是吗？你看看和美国人对抗的苏联、东欧，你看看在美国人保护下的南韩和台湾，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真是因为你美国人折腾成功的？

崛起了怎么再谦虚

我曾经说过：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我们周边的一些中小国家，开始对中国说“不”。现在，我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一下这个现象。就从日本人上街抗议中国说起吧。

中日建交的这些年里，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我们一般只看到中国人涌上街头抗议日本，很少看到日本人上街抗议中国的。至于日本一下子涌出这么多人，几乎创造了他们抗议中国的历史记录，还真是闻所未闻。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之前的某一次中国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日本、抵制日货开始说起，那次，我正好在日本旅游。我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感觉，都显示日本很平静，民众的“情绪很稳定”，绝大多数日本人对发生在中国的反日游行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当然，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不令人愉快，因为，它暴露出日本人对我们一种发自内心的蔑视。你游你的行，关我什么事？你能咬我？于是，屡次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反日”游行，不管闹腾得多凶，在日本基本激不起多少浪花。虽然有时也有一些反应，顶多也就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穿上滑稽的皇军军服，象征性地原地转一圈。而且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即便这种右翼举行的游行示威，也并不直接针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是日本右翼不敢得罪中国？还是照顾亚洲人的面子？都不是，是因为被我们蔑称为“小日本”的他们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亚洲邻国放在眼里，他们也从来没有把现在的中国、韩国作为他们的对手。这种逻辑很简单：你会与一位你看不起的人计较？去和他针锋相对地搞游行示威吗？

我们不妨去检视一下日本最近二十年涉及他国的游行示威，你会惊讶地发现，所有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直接或间接的矛头几乎都是针对美国。这说明什么问题？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不错，在绝大多数日本人眼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从来没有打败过他们，是美国用原子弹和民主制度征服了他们。日本人眼中只有美国，也只认美国。日本不会和亚洲国家“计较”，也自然不会真心去“道歉”。可以这样说，只要美国不强迫日本对二战所犯的罪行赔礼道歉、深刻反省、痛改前非，日本永远不会顺应亚洲的民意，更不会真心对亚洲国家说声“对不起”。

我们常常说德意志民族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却忽视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拥有强大势力的犹太人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没有他们从不间断地“督促”与“强迫”，出了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真那么善于“自我反省”？要知道二战后到今天，德国的新纳粹分子一点不比日本极右分子少，有时他们袭击少数民族的行为更加暴力。

经过上面简单的分析，我们现在都会忍不住要问：日本这次为什么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华示威游行？而且参加游行示威的早就不再是平时意义上的“日本右翼”，连我认识的一位日本“白领”也表示想上街了。

放下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崛起了，日本人心理不平衡了，或者说，他们感觉到了危机与威胁。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像美国一样的“大国”，值得他们怒发冲冠，“配得上”他们上街游行示威、表达不满……

几个月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悄悄地超过了日本，这在中国不但没有引起赞叹，反而引发忧思。日本表面上也显得平静与情绪稳定，可从我稍后得到的一些资料显示，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相当关心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一些人甚至担心，日渐崛起的中国，会不会终有一日不再把日本的保护伞美国放在眼里而随时对周边国家动粗？像当初崛起于亚洲的日本一样？如果历史重演，自从二战后就被美国解除了进攻性武装力量的日本，又何去何从？中日之间虽然一直磕磕碰碰，但大多都是日本人欺负和侵略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二战后的三十多年里，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却一直折腾来折腾去，日本人有充足的理由对中国“掉以轻心”。可是，你不知不觉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它，跃居世界第二，直逼它的保护国美利坚合众国，它能不紧张，心理能平衡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撞船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这个事件的肇事者是日本。事件发生

后，中国政府在网民的支持下，一路强硬，连美国都介入，最终日本不得不灰溜溜放人……
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有增无减，日本被迫放人，这一系列事件对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在心理上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有多大？恐怕不是我们一时之间说得清楚的。
也难怪，这次反华大游行中出现了过去一直和日本右翼保持了一定距离的日本人，部分日本人士甚至萌生了“重新武装”日本的念头。以前日本人不“反华”，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你根本不值得他们反，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你。现在他们突然搞起了针锋相对的“反华”游行示威，甚至有不断升级的趋势，一个主要原因是你在他的眼里发生了变化，你强大了、崛起了，成了值得他们“反”的对手。
是喜还是忧？也许恰当的说法是喜忧参半。我相信中日关系能够处理得好，毕竟两国的经贸关系非同小可。然而，从这件事，以及今年发生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摩擦等事件，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崛起的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时候，是否应该有与自己大国地位相应的策略、手段与心态？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近日与中国网友的一系列交流中传达了一些有意思的信息。我认为，这位懂中文的美国大使也是在向中国传授美国的经验。毕竟，中国只是刚刚崛起，而美国，已经立于世界头号强国的位置长达大半个世纪了。那么，美国是如何处理自己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上的不同声音的？
如果我们去粗略统计一下世界各地的游行示威，不难发现，凡是涉及国际关系的那些，几乎80%都是针对美国的。可是，如果你再去看看发生在美国国内的游行示威，几乎没有几个是针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而主要是针对美国人的政府——白宫的。
作为一个小国，一个弱国，或者一个心智不那么成熟的国家，民众动不动就上街抗议外国政府，甚至把自己的国旗挥舞到外国的领土上去享受一把自由的权利，地球上并不鲜见。可如果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动不动就要以牙还牙，要上街抗议他国，宣誓要断绝关系、发动战争……
又会如何呢？这样的国家是否能够真正崛起，显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他们不会接纳一个这样崛起的大国。
中国显然已经崛起了，否则，不会让目中无“华”的日本人也忍不住走上街头。但我们掌握了大国思维，学会了如何与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和平相处没有？我们应该如何在国际上交往？在交往中，我们又推崇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种大国的心态可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就能商量出来，也不是能够装出来的，它是这个国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的真实反映。一个国家所持的价值观念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对自己民众实行专制，听不得一点点不同意见，那么它在国际上也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尊重他国权利与容纳异议。
2010.10.24 斯德哥尔摩

别了，穆巴拉克们！

有些名字像我们的记忆一样久远，听上去比我们自己的名字还更加熟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北朝鲜的金正日、古巴的卡斯特罗以及埃及的穆巴拉克，都是这样一些名字。对学习国际关系的我来说，这些名字像历史的幽灵一样，徘徊在世界的上空，挥之不去，他们成了这个时代抹不去的标签。

今天，又可以从这些名字中划掉一个了。在埃及执政三十多年的穆巴拉克迫于人民的力量而

辞职，“穆巴拉克”时代结束了。虽然这十几天来，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和那些埃及街头的民众在一边，但我的“国际知识”却让我无法对“穆巴拉克”这个名字生出更多的痛恨，我甚至有些惆怅：埃及少得了穆巴拉克？埃及不就是穆巴拉克吗？

埃及、穆巴拉克、木乃伊，至少对于我这个年龄的读书人来说，已经无法分开了。我们被看上去改变不了的现实，以及穆巴拉克自己制造的“事实”告知：“穆巴拉克”这个名字曾经让埃及在动荡的北非与中东之间稳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统治时期的埃及，有一段时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且，穆巴拉克的政府也是这个地区最世俗化的政权之一；是他，解决了埃及人民的温饱，带来了稳定；他和木乃伊都成为埃及必不可少的象征。穆巴拉克哦，这个名字一度承载了埃及人的光荣与梦想，也控制了世人对那个文明古国的想象。

埃及与伊拉克，还有东亚的几个国家，都是人类历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正因为如此，现代民主理念在这些国家碰上了相对比较顽固的“古老文明”的抵触，也使得埃及、中东、东亚等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反而成为地球上最后几个仍待进一步民主化的国家集中地。不过，这本来应该成为穆巴拉克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啊，你应该知道，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顶多推迟几天，绝对无法阻挡，你为什么不在执政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的任何一个时刻改弦易辙、从善如流，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同民众一起，让古老的文明焕发青春？你一味拖延、抵制，对一些原本可以为埃及带来光明、为你自己也带来出路的改革说绝不？最后等来的是被迫的黯然辞职？

穆巴拉克，原本还可以承载埃及人更多的光荣与梦想的，如果他不是以这种方式下台，如果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里，即便在他享受了三十年的绝对权力之后的最后的岁月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他能够顺应民意，抓住机遇从善如流的话，他不但可以风风光光走下政坛，甚至有可能会被知恩图报的埃及民众摆上圣坛供奉起来，像美国人对待华盛顿一样。但这种可能性没有了，他犯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忘记了艾森豪威尔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民只要温饱就能够满足，他们还不如呆在监狱里。

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国际知识，我并不认为今天以后的埃及就会比你统治埃及时经济发展更快，政局更稳定，社会更“和谐”——这些也正是你一直不肯放弃绝对权力还权于民、进行改革的理由与借口，也是美国一直支持你的重要原因——但，如果你有点历史知识的话，你应该清楚，今后的埃及无论经历怎样的阵痛与磨难，都再也不会回到“穆巴拉克”时代了，而且民众会逐渐认识到，今后的这个国家经历民主转型的混乱，不是没有了你穆巴拉克，而是曾经你在那里统治埃及太久的缘故！别了，穆巴拉克！

在我尚在大学的时候，就在研究与背诵你如何治理人民，带领他们打仗，解决他们的温饱，用你的方法与埃及特色构建和谐社会，我儿子至今又在大学里阅读关于你的教科书，现在，埃及人民终于站出来，给你，也给全世界上了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最重要一课：不合法的政权，终究是不合法的，不管你拥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管你如何花言巧语，不管你的军队如何强大。对于你这位老人来说，这显然是最后一课。但对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为数不多的国家与掌握绝对权力的人来说，却不是最后一课。我真希望你能有机会谈谈对这一课的体会，给这个世界最后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

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民众走上街头，局势急剧变化，这期间，你一定犹豫过、彷徨过，可能还考虑过是否下令向人民开枪，最后，你只不过希望民众能够再给你一段时间，哪怕只几个

月——有人说你想利用这个时间安排后路，转移你们家族和你庇护下的利益集团贪污的钱财，让自己交出权力时能够软着陆，但我却有另外一种想法，或者说是幻想：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这十几天你依然挣扎着想保住权力，会不会是因为你心中幡然醒悟，你后悔了？于是，你想抓住最后一点权力，为你的人民做一件小事，把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还给他们？也同时为你自己做一件大事：把梦想留给人民，让自己光荣离开，也让你名垂青史？

但，太晚了！你有足足三十年的时间，可你都没有给埃及人民机会，这次，他们自然也不愿意再给你哪怕一天时间的机会，你不配了。

因为你的下台，今年的情人节仿佛提前到来，让一些仍然生活在散发出木乃伊气味国度的民众突然想起，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和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有一个不见不散的约会。

别了，穆巴拉克们！

杨恒均　2011-2-12 初十

美国将军因言论自由而到白宫作检讨

美国驻阿富汗总司令麦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大概以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讽刺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副总统拜登，并就自己的艰难处境对白宫政策提出批评。杂志出街后，舆论哗然，震怒的奥巴马总统目前正等他回白宫“做检讨”，可能会炒他的鱿鱼。麦克里斯托也在第一时间道了歉，并有可能主动辞职。

麦克里斯托是奥巴马亲自指定的驻阿富汗最高司令官，特种兵出身，在伊拉克就立过大功，指挥作战能力一流，好评如潮。然而，因为这次不恰当的自由言论，可能丢掉驻阿富汗最高司令官的职务。

美国各大媒体岂肯放过这个话题？于是，各大电视频道开始找政要、议员、专家学者上电视发表评论，组织各种辩论，纸媒与互联网上的相关文章更是铺天盖地……

我最喜欢西方国家出这种“乱子”，看他们互相攻击，互相揭短，一片混乱，可最后总能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在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总有一种看不见的手把每一次危机都当成转机，把本来要让他们沉沦的危机，弄成了一次又一次把国家和民族向上提升的机会……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是“言论自由”。

从“水门事件”到“伊朗门事件”再到“拉链门事件”，从黑人抗暴、华人游行再到黑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坐在电视机前，从自由言说的媒体中揣摩西方，学习美国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跟踪每一个带来危机与混乱的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最终结果，我收获的远远超过我所有的学校教育能够带给我的。

有人可能会说，媒体很浅显，学不到真正的东西。其实不然，现在的媒体很大程度上成

为一个载体，一个表达与传播的平台，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各种声音都能够借助媒体第一时间发出来。

就拿《滚石》事件来说，我一早起床就从电视上看到了好几位华盛顿熟悉的专家学者与将军们在侃侃而谈，发表意见。有的批评麦克里斯托违反了军人的职业道德，有的谈到了美国的宪法与传统制度，还有的讲到民选总统对军人的绝对领导权；当然，也有的在为麦克里斯托司令官辩护，认为目前没有比他更适合担任阿富汗总司令一职的候选人，从国家利益出发，希望总统把他训一顿后，别撤他的职……

当然，更有趣的是，媒体说来说去，就开始讨论起奥巴马的阿富汗政策，美军在那里的策略……自然就有人开始攻击奥巴马在阿富汗政策上前后不一，竞选的时候承诺要撤军，上台后却立即增派了三万多美军……真不知道这种讨论还会牵扯出什么，好在对于我来说，这无疑又是一次免费的学习机会。

在大陆以外的地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如果你问我从哪里学到了最多的知识与理念，我的回答是从各类自由的媒体上。不管你是中国的专家学者、普通民众，或者是政府官员，研究一下当今西方人在媒体上争论的那些问题，以及他们如何争论那些问题，往往对解决中国当今的问题大有裨益。

每个国家都有突发事件。发生这类事件后，媒体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封锁消息，粉刷太平，维护执政者形象；另外一种是利用开放的媒体，把现实中的突发事件弄到媒体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民众通过媒体了解真相，听取各种意见，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言论自由"不但不会制造混乱，反而可以"转移矛盾"，甚至可以用集思广益的办法化解矛盾。"言论自由"的本质是对民众智慧与理性的信任。谁能想到，在美国推动官民之间、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幕后推手，竟然是让一些人提心吊胆的"言论自由"？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在这类事件中，各方都多多少少受到了批评，甚至包括那些出来评论的嘉宾们，也忍不住互相指责起来，可唯一没有人批评的反而是"罪魁祸首"——那本刊登了将军讽刺批评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的《滚石》杂志，还有那些"加油添醋"、"唯恐天下不乱"的全美国的电视、报纸和互联网媒体……

如果你此时正好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你一定会想，天啊，闹出这么大的事，"有关部门"为啥还不下令媒体收声？不让总编辑做检讨？还不关闭、整顿那本惹了乱子的《滚石》杂志？再这样"炒作"下去，岂不是要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理论，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抱了言论自由，国民用"言论自由"对付"党和国家的形象"，为了维护政府形象而去损害"言论自由"的恶性事件越来越少。可是，为什么一个将军批评总统就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什么才是言论自由呢？

只要大家还拥有"言论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定义就会一直自由言说下去。而我们也只能在争取言论自由中去认识、拥有言论自由，在言论自由中去体会、提升言论自由……

在这个尚未完全展开的事件中，我们对言论自由有了新的认识：现役将军没有讽刺和批

评总统的言论自由，媒体却有刊登与“炒作”此事件的言论自由，而每个普通的民众则都有借题发挥地去批评和指责美国政府与其政策的言论自由……

这就是言论自由。

杨恒均 2010/6/23

社会篇 现实照进梦想

不给肉吃，老虎还怎么猛

儿子回国旅游，我最担心就是他们在街上过马路。没有红绿灯的地方他们不敢过，几乎所有的机动车辆看到前面有人准备过马路，不是减速而是加速，力求用自己的车把行人挡住。有红绿灯的地方我也不敢让他们自己过——如果你以为绿灯亮时就可以放心过马路，也许你永远无法过到马路那一边。
这次回广州，情况有所不同，我和儿子都发现了。就是在车多人多的交通路口的红绿灯两边，都多了一个个穿黄色马甲的“交通协管员”，他们手持小红黄相间的旗子，口里含着不时尖声响起来用于操练的口哨，和红绿灯一样不停变换动作，指挥着车水马龙……

多次一起在路口等红绿灯，我发现九岁的小儿子都聚精会神地观察这些一般被中国孩子们忽视的交通协管员。我很想知道儿子的小脑袋在想什么，果然，当我们昨天再一次一起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终于提出了自己的疑惑，爸爸，他们和红绿灯指示的一样，为什么……

我知道儿子的问题，每一个红路灯下都配备两个协管员，既然他们指示的和红绿灯一样，为什么还需要他们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指挥？我说，你也看到了，你想一下为什么需要他们。

为了让他思考，我故意在红绿灯旁边停了一会，引导他观察红绿灯的变化与行人车辆的行为，以及那个交通协管员的动作和行人车辆的关系。看了好一会，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看懂了没有。但他却突然说了一句雷到我的话。他说，哦，他太酷了。人家不听红绿灯，都要听他的，他太酷了……

这是小儿子这次回国第一次说一个人“太酷了”，而且以佩服的口吻连续说了两遍。我真被雷到了，儿子显然是顺着我的引导在思考问题。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在有红绿灯的地方还安排两个以解释和执行红绿灯命令为己任的协管员——他们是用手中的小红旗与口中的口哨代替更先进的红绿灯。很有趣的是，由于他们也是看红绿灯来指导，很自然的，就比红绿灯慢了半拍。而无论是行人还是车辆，很多都是按照他们的指示，懒得去看红绿灯了。

还记得 20 多年前我从北京调到新成立的海南省工作，当时我们是怀抱着要建立中国最开放，与世界接轨最快的经济特区大省的雄心壮志而去的，但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海南岛大概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连一个交通红绿灯都没有的陆地。当我们野心勃勃要计划开发海南省、在那里酝酿和推广有可能领导全国的新理念的时候，一位来访的美国专家调侃道，也许你们应该先教会海南岛民众“红灯停，绿灯行”的基本知识……

20 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但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拥有红绿灯绝对数量第一的国度，然而，就在这个国家最发达的城市广州的闹市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交通协管员站到红绿灯下面——

我想，过去二十年里，如果我们的学校少教育点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多教育一些这些“红灯停、绿灯走”的基本规则，同时多花点时间告诉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必须遵守那些法律和规则的话，中国也许会更适合人类居住？

人类在本性上是差不多的，我也从九岁的儿子对交通协管员的“羡慕”感受到他幼小心灵里的那种人类的原始本性。他为什么会认为一个代替红绿灯的协管员很酷？很简单，在儿子的教育中，除非有紧急情况，例如停电，警察执行任务，封路等等（儿子很少碰上，大概也不记得了），那么，不管你是谁，红绿灯的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而所有人类的本性都告诉我们，如果可以不遵守用来约束我们的规则和法律，如果可以凌驾这些法律和规则之上，那就更“酷了”。

谢天谢地，儿子并不生活在中国，否则，他就会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度，如此“太酷了”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法律和规章制度都形同虚设。

表面上看，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的大多是普通民众，也就让很多人倾向于把这种混乱归罪于中国文化、中国人素质低，或者干脆说中国人不配得到自由，中国人是需要管起来的。

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制度，上梁不正下梁歪。问题出在那些负责制定法律和规章的人身上，他们要就是把自己凌驾于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之上，要就从一开始就准备用法律和规章来保护自己和管制他人。久而久之，不但他们不相信自己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不再把他们的法律和制度当回事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可这些事儿子是不懂的，我和他们不但有“代沟”，而且有“国沟”。特别是儿子受了和国内孩子们完全不同的教育。受广州著名网友“激情老道”所托，本人免费做一次人体广告（也因为我支持这种事业），陪同儿子到处游玩时，我穿上了老道网友设计的“脱吧”圆领衫。我指着那个著名的漫画向儿子讲了很久，最后，连大儿子都没有完全闹明白。在他们的教育中，法律应该早就让那些必须赤裸裸为民众服务的人“脱光了”，根本不应该由我们这些势单力孤的小民在那里折腾。

好在我和小儿子有更多的交流（看起来，我的智力更接近于九岁的儿童——这是大儿子有一次对我的评价），九岁儿童的原始思想常常能够引起我的思考。例如，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动物园看驯虎表演。当一男一女手持长鞭像驱赶羊群一样把十五头白色的老虎赶进表演场时，我由衷地叹道，那么凶残的老虎，他们怎么能够让它们如此服服帖帖呢？

九岁的儿子听到了，顺口答道，你没有看到那两个驯兽师右手拿鞭子，左手不停地在口袋里掏出肉块喂那些白老虎？

我看到了，很惊讶儿子的观察力，赞赏了两句，儿子得意了，说，就是再猛的野兽，只要你把它们关起来，给它们吃的，它们就听话了，如果不听话，你就不给它们吃的。

儿子说完后，继续沉浸在世界上最多白老虎的集体表演中，我却陷入了思考。我们常常说“苛政猛于虎”，可眼前的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呀？正如儿子所说，只要把它们关进笼子里，让他们知道口中的肉块是谁给的，你看它们还猛不猛得起来？。

我想，那些把苛政和统治者比喻为老虎的，应该从我九岁的儿子那里得到启示。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他们知道“是谁在养活他们”。至少让他们尊重和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而要让他们真正听话，不让他们胡作非为，不让他们动不动就折腾老百姓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们吃的，不把肉块喂进他们的口中……想到得意处，我情不自禁地喃咕道，对啊，让他们知道是人民在养活他们，知道是谁供养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就听话了——

看表演的小儿子听到了我的喃咕，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他把视线从白老虎那里转向我，表情严肃地说，你不给我吃巧克力，我也不会听话的！

短短两天里，这是我第 N 次被九岁的儿子雷到！

杨恒均 2009/4/26

谁为绝望买单

富士康发生 N 连跳——之所以用“N”字代替，是因为不知道完成短文的时候，这个 N 字是否又跳了——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矛头与火力也逐渐集中到富士康 身上。我想，富士康难辞其咎，跑不了的。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 20 刚刚出头的孩子们轻生自杀？匆匆浏览了一些网络文章，觉得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经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几种说法包括富士康用加班、劳动强度以及令人压抑的企业文化等等把 员工逼得跳楼自杀……如果这些原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简单：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哪怕真如外界传说的，存在血汗工厂和残酷剥削，可他毕竟 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企业，既没有发生绑架、强迫他人进去工作的事件，也没有像一些传销公司那样，把年轻人锁在房间里限制自由，结果不得不翻窗逃离，跳 楼身亡……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富士康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反问批评者一句：我们只是来去自由的企业啊，我们如何逼死员工？你高兴可以来，不高兴可以走啊，为什么用 这种方法从窗户跳出去？是不是我们的待遇太好，使得那些无法承受工作压力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或者觉得离开我们就没有前途，感觉绝望，就去自杀？

这个假设的问题你能回答吗？富士康自己显然无法回答，否则，他绝对不会找高僧去帮他驱邪。我今天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我想从其它的地方与其他的 问题入手。从

我常常去做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东莞与新塘入手。在那里做调研时，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朝气蓬勃的私营老板与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强烈对比。我在广东接触到不少勤劳聪明的私营老板，其中部分来自内地。和内地相比，这里的经 商环境好，市场成熟，私营企业发达，寻租空间少，如果不涉足垄断企业，当地政府还会适当扶持你。所以，基本上都能赚钱，比在内地强多了。

可我同时接触到的却是那些同样来自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价钱，不会给多一分钱，而他们又没有任何保护与集体行动。虽然拼死拼活也 能够赚到几百、一千甚至两千的工资，但他们付出的却是超时、超强的劳动。很多打工妹说，在这里，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工作。而工作，却只是为了活着。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国家”和“社会”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拿我经常去的新塘来（号称全世界的牛仔生产基地），你到了这里，会被这个小镇的繁华迷惑 住：街道上运送牛仔服装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老板的奔驰和宝马到处都是，豪华酒店里谈生意的老板和伺候老板的小姐们络绎不绝，只要你细心一点，还能注意到繁 华阴影下匆匆赶路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虽然占这里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仿佛只是这个地方的过客，是这个地方繁荣昌盛的点缀。在这里，你找不到他们的 位置……这里充满了活力，可却总让你感觉到这活力是畸形的。按说，这里比内地更加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国家”功能大面积地退出了经济领域，或者可以 说，在经济领域，“国家”减少了干预，还给民众一个社会空间。可是，这空间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个完整“社会”的存在……

“国家”为这些绝望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我们不妨这样问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那些并没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个让他们厌倦得选择死亡的企业门前自杀？他们都才是 20 左右的孩子，为什么不逃离富 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离开啊？难道这些孩子眼里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绝望与死亡？请问：国家在哪里？社会又在何处？

1949 年后的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或者说国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就是社会。当时，国家用两个东西把国民限制得死死的：单位和 户口。而遭到这两个东西伤害最深的就是农民：户口像锁链一样把他们绑在居住地，可是却又没有“单位”照顾他们的福利，给他们发粮票。结果，每当灾难降临 （例如 1959 年），首当其冲甚至活活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民……

1976 年改革开放后，“单位”和“户口”有点改革，控制有所松动，单位不再是束缚你的工具，有能力的人可以换“单位”了，好的“单位”还是你的福 利保障。户口制度虽然没变，你却不必老死在户口地，农民们终于可以进城去出卖苦力了。但户口仍然是锁住他们的锁链，只不过从以前紧紧锁住他们的脚镣，现在 变成了一条更松更长的铁链，始终牢牢地牵制着他们，又仿佛深深打在他们脸上的烙印。而这个时候，就连户口，也成了城市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一种身份象征与 福利保障……

改革前，抓得紧紧的时候，国家无力照顾农民，改革后，他们唯一所做的是给农民打工的自由，却依然无法或者不愿顾及他们。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 些 20 岁左右的打工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户口地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所在地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要他们不犯罪，公安不会抓你，你可以自 由出卖劳力，可以自由地生活，甚至可以自由地去饿死去自杀——他们眼中唯一剩下的竟然就是一些私人企业、老板。那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也是把他们唯一的绝 望……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这难道不正是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有的现象？不错，从现象来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惜本质却完全不同。这涉及到国 家和国民的关系问题。

每一次看到国家有大事发生，群情激动的都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爱国如痴如醉，让人看得

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别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 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总统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竟然是今天中国的打工仔与打工妹。

在中国的改革以“下岗”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自己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后，享受了自由的农民们，纷纷奔向打工之路。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好用让无数“中 国制造”的产品、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以及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阶级”相比，他们价廉物美，没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补助，他 们几乎不给目前崛起的国家制造任何麻烦——修奥运建世博，他们召之即来；等到辛辛苦苦建设好后，等到这些东西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他们挥之即去……他们 病了自己去解决，没钱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救济；这让他们宁肯加班加点不要命的工作，而我们的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勤劳中繁荣昌盛 起来……

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弱弱问一句的时候：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更学术一些地提问：哪些事应该是国民为国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须是国家为其 国民做的？就我所知道，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条件，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都处于极差的地步，在没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况下，你给他一个超过两千一个月的 工作，然后你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事，只把他们弄得崩溃……这不是富士康一个公司的问题，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区广泛存在。

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下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保护那些孩子的。富士康们只是雇佣他们工作，如果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眼里看不到国家，没有了社会，只有一个 公司的时候，那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可以轻松剥夺他们的生活、人格甚至生命……而当孩子们对一个本来可以随便离开的公司绝望到自杀的时候，说明他们早就不 对这个国家，以及我们的社会还抱有一丝的信心与希望！

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

然而，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应该是“无所不在”的。1949 年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灾难就出在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无处不在，把社会挤压得名 存实亡，而且，这个“国家”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又做了很多。

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大大减弱，所以，才有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 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这恰恰是我们偏执的改革留下的祸根。按说在南方地区，目前从经济结构上说，比改革开放以前以及大多内地地区都要合理得多，甚至有些地方表面上已经接 近西方国家了，可是，我却在那里看到了一些畸形的发展：“国家”部分撤走了，“社会”却根本没有形成。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一些有钱人独占的“私社会”：老 板就以他们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山珍海味的餐厅与纸醉金迷的桑拿按摩作为自己的“社会”，数量大得多的打工族倒反而成了服务他们的陪衬与点缀，我们不禁 要问：社会大多成员的社会又在哪里？

社会取代国家，公民利用社会参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层治理；另外一条就是民众基于不同的利益、爱好而结成的组织、社团，包括 NGO、工会与行业工会等。在以前的中国，这些本来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事情，都被国家大包大揽了。后来，国家退出了，基层治理基本上只服务于权贵与投资 者，“国家”也在社会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可是，国家却不肯在社会更多的领域放松控制，还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要和“国家”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西方的“社会” 一直大于“国家”，在中国倒好，“国家”还是老大，可这个“老大”却不肯也不能做自己该做的（例如保护这些孩子免遭企业残害，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反而 死死限制社会健康发展，不肯

还给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益，包括健康的公民社会里公民用来自保和互相照顾的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

你能想象吗，在西方一些国家，甚至连流浪汉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的甚至办有不定期杂志，来维护“族群”的利益，可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 打工一族，不但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甚至更有甚者，有些NGO 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当地“国家”执法部门 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就拿沿海地区来说，各地政府引进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经济，加上大小老板基本上都有一些共识，可是唯一没有组织起来，可以向老板讨价还价，要求提高 工资、改善待遇的就是总数高达两个亿的打工群体。国家给了他们“自由”，但只是给他们打工，甚至被奴役的自由，富士康只是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有。就算是最伪善和虚伪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勤劳与好用，如果这些劳动者像西方社会里的那样， 动不动就要求自己的权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国经济可能还真没有如此“繁荣”，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的劳动者也获得了应得的权益，“国 家”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钱和牛逼，动不动就办出世界第一的奥运会与世博会……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 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松开紧紧扼住社会咽喉的手，让公民们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2010/5/20

美国是如何解决春运的

有人会问：美国根本没有春节，何来春运？

少安毋躁。首先，洋人不过春节，但确实有春运，而且一点也不比中国的客运流量小——那就是圣诞节和元旦新年期间，我们姑且也称之为“春运”。这期间也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有时不提前半年，休想买到回家的票。

还是先从国内铺天盖地的对春运的恐慌与对铁道部的口诛笔伐开始。每年都有春运，每年的春运都搞成这样，按说，无论怎么攻击甚至辱骂铁道部都不为过。但铁道部和很多领导出来向大家保证，要在几年内或者 2012 年的时候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脑筋开动得真快呀，不过，这个保证似乎无法兑现。

为什么短期内解决一票难求不现实？因为春运的问题在本质上不是靠开动脑筋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加大投入就可以解决的，更不是靠改善服务质量就能解决的！春运问题的症结应该是一两个亿的中国人同时想坐飞机、乘火车回家和旅游，而飞机火车不够。

有人说，不够就加，增加到够，不就解决了？哎，你以为那么容易吗？中国的交通投入要加大是应该的，可如果真加大到能够满足春运需求的话，那是个什么概念？假如说现在真修铁路、建公路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投入的超过一半的交通工具将会在平时（非春运期间）处于闲置状态，请问哪个国家会这么干？不妨再想一下，如果靠加大投入就可以解决春运问题，那么为什么比我们富有很多的美国不建更多机场和铁路，让圣诞节时大家都可以到处跑？

那样做成本太大，得不偿失。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这成本都会让顾客出。如果我们加大投入几百个亿甚至上千个亿、上万个亿，前后长达四十多天的春运问题肯定可以解决了，那么这些增加的交通工具在平时怎么办？我去年一年在全国各地调查，发现平时火车票基本上还算好买（当然需要适当增加投入），有时还挺闲的。增加的交通工具只为了解决春节前后四十多天大家回家的问题，而闲置的另外三百二十天由谁买单？

有人又说了，中国有钱了，中国人买得起单。人均 GDP 排名一百多位，老百姓医保和教育都没有解决，如果真有一笔钱，是救命和教育更需要投入，还是解决回家的问题更需要投入？

再说一下服务质量问题，中国的铁路服务当然存在服务质量问题，但这和能够运输多少旅客没有直接关系。请问在春运期间，有多少交通工具是闲置在那里？或者因为调度失误而浪费？绝对有，但数字不会太大，至少不是造成春运问题的主要原因。至于说到服务态度问题，那完全是一个心态问题。不要说比印度，就算是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火车的服务质量也不算很差的。

中国的“春运”是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很难在短期内使用经济或者政策手段解决这一问题。使用加大投入的办法并不可行，而且不能一蹴而就。即便要解决中国的交通难问题，也应该以中国平时（非春运时段）的交通需求为依据，不能浪费。如果不同意这个看法的，不妨看一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他们始终不让国民在圣诞节用和平时一样便宜的票价到处旅游？为什么我在圣诞节期间在美国买不到票？

对照美国的春运问题，中国的春运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是造成春运问题的根本原因；二、政府的政策是造成春运困难的最重要原因；三、绝对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使得中国的春运问题和美国的春运问题有了本质的区别，也是加剧中国春运问题的最严重的原因！

先简单说一下中国人的春节习俗和家乡观念。大家知道，美国人圣诞节也是要全家团圆的，如果有可能，孩子也会尽量赶去和父母一起吃圣诞大餐。可是说真话，我不知道以前的美国人是什么样的，现在的美国人对这种习俗已经越来越淡了。是因为经济发达，还是不想假期折腾？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一些发达地区，春节的观念也有淡化的趋势。可是，中国人的春节团圆和归乡的观念要比世界上很多有相同习俗的民族强得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政府的政策也许有用，可是，用国家政策来改变国庆和五一长假还说得过去，是否能够干预春节，值得商榷。

春运如此严重的第二个症结就不能不和国家政策联系起来了。前面说了中国人的家乡情结，这无法改变，可是中国政府现在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严重加剧了老百姓春运困境，特别是户口制度和城乡二元制。

在中国，除了公务员可以随着工作迁移户口外，其他几乎所有阶层和领域，迁移户口都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八九亿农民和工人阶级了。

所以出于归宿感和在生活方便的考虑，相当大一部分人到了春节就要回家，这不光是像有些文人所写的，要回家吃香肠，要看看家乡的小河流，怀念故乡的云。不是的，因为那里仍然是他实实在在的家。绝大多数打工仔在城市生活几十年，但仍然是暂居人口，到了春节，心理的失落，也只有回到家乡才能抚平。

这次在美国我特别留意了这个现象，也询问了很多美国朋友。大家知道在美国只要你愿意，你到哪里，只要有住址，即使没有工作，也马上成了当地人，可以参加当地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享受和当地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这在精神上让很多人对所住地有了一定的认同，也就渐渐地减少了一些归乡心切的人口流动。

因为这种原因加剧的流动人口有多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心理因素，自然无法统计，但即便不考虑心理因素，实际的困难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流动。例如农民工的孩子无法在当地读书，

在城市打工的人户口在外地，不得不去办理一些手续等。这一问题在美国就不存在，父母住在哪里，孩子就是哪里的人，不会千里奔波为上学。
有没有人计算一下，因为我们的户籍政策，让收入最低的广大民众多花费了多少金钱和时间在路上？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买不到票，为什么美国人忍气吞声，中国人却怨声载道？有国外生活经验的人也应该知道，如果要在圣诞节期间出门，往往半年前就开始计划，否则就买不到票，或者票价飞涨了。可是，如果是临时起意，上网一搜索，发现没有票了，哎呀，怎么办？
不怎么办，取消行程吧。奇怪了，整天鼓噪不安的美国佬怎么那么老实？他们为什么不到网络上（报纸也是随便可以发文的）去攻击航空公司，去辱骂铁老大呢？他们买不到票时，为什么不上纲上线去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去质疑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呢？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却激起如此大的民愤？
如果那些买不到票的中国同胞在美国遇到同样的事情，如果他们激动，他们竟敢辱骂铁道部门，那么在这样一段话之后，他们就会心服口服地闭嘴：你买不到票吗？因为现在太忙呀，大家都想走，飞机火车太少，没有办法呀。你为什么不早订票，你为什么不早点去排队？啊，对了，不是只有你买不到票，除了国家的特殊工作人员（例如为了国家利益奔波的警察和政府公务出差的公务员），就算你是白宫的工作人员，就算你是美国高级警察，就算你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的红人，就算你是航空公司的，就算你是高干子弟，只要你是因私旅游，对不起，请你排队，对不起，请你在电脑上买票，对不起，请你到旅行社定位！
现在你明白了吗？在美国，除了少数工作人员本人出差以及紧急公务外，私人假期和出行，买票一律一视同仁，就算是公司和政府一般的出差，也是和中餐馆打工的非法移民一样：电脑订票，卖票处排队，早到早得。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如果抱怨飞机不太多、火车不够，那么人家告诉你：我们再多，平时没有人坐，我们就不赚钱了。你如果又嫌资本家赚钱讨厌，那么你自己去开航空公司呀，反正这些企业又不是垄断的，你如果不愿意按照经济规律办，你愿意烧钱，那是你的事。
现在你明白中国要怎么解决春运问题了吧？
2009.01.17 拉斯维加斯

要社会还是要政治

缅甸风灾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到100，000人，早上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新闻，让我头皮发麻。虽然CNN和BBC都把这条新闻放在头条或者靠前的位置，可是只用了短短几分钟，让人心情沉重。毕竟，那是一个南亚小国的人命。美国人更关心的是希拉里还能坚持多久，澳洲人还在关心一个星期前港口遇难的六个澳洲人——好在还有世界各国慈善机构以及政府伸出援手，包括中国政府和台湾的好几个慈善机构，已经采取行动。

据报道，联合国要求缅甸执政的将军尽快发放入境签证，让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援人员和物资进入缅甸。美国将在联合国的授意下动用几艘海军救援舰艇紧急救援（我曾经在几年前参观美国洛佛克海军基地当时美国海军最大的流动医院，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艇医院，可以同时救援上万伤员。可惜这次在救援舰艇中没有看到它的名字）。但问题在于，没有缅甸军政府的点头，不管是救援人员还是物资都无法第一时间进入缅甸。

缅甸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风灾过后，目前食物短缺，很多受伤的人亟待救援，尸体还没有收拾，已经发臭，现在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伤病无法治疗，以及营养不良，缅甸向国际发出救援请求。问题在于，这样的救援一直以西方为主，就算把物资给缅甸政府，他们也没有能力及时救援，这是需要学问和经验的。也就是说，物资和救援人员必须一起进入，才能保证做大限度的成功救援。

可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在批评缅甸军政府（1962 年政变上台）恶劣的人权纪录。在这个时候，西方要求缅甸军政府大量放行救援人员，缅甸军政府会配合吗？

美国国务卿奈斯在发言中说，这不是政治，这是人命关天的人道救援。美国媒体也说，现在面点灾民的命掌握在军政府手里，我们看他们怎么办。据 CNN 报道，风灾过后的头几天，国际观察家竟然没有看到缅甸军政府派出军人救援，错过了最大的救援机会。现在国际上积聚人力物力前往驰援，却不能得到军政府的配合。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灾难，缅甸军政府根本没有办法独自处理。国际观察家说，多拖一天，缅甸灾民就会多死不少人。

我已经注意到，风灾过后，世界各国确实把政治暂时抛在后面，但这几天的新闻已经让我感觉到，政治又冒头了。美国第一夫人在白宫草坪发言，指责缅甸军政府对自己的人民漠不关心，不积极救援。我想，如果缅甸军政府在考虑主权的时候而不积极配合西方的救援，政治议题可能会发酵。然而，西方的批评则又让缅甸军政府紧张不安，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现在我使用设身处地的方法，只想把我和读者放在几个不同的位置上思考一下：

如果我是缅甸军政府，也就是统治者的话，我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毫无疑问，主权问题是第一重要的，否则西方国家早就以人权为借口把给和平演变了，但救援工作也是刻不容缓，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政府，总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人民一个一个死亡吧？

问题在于，主权事大，还是多救几个国民更重要？摆在那里的事实是，及时配合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的救援（以联合国的名义），肯定会多挽救不少缅甸人的生命。然而，这会给缅甸军政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潜在威胁？会不会颠覆缅甸军政府——这些都是作为缅甸政府不能不思考的。毕竟，在缅甸和北朝鲜这种国家，就算死再多国民，一般不会影响政府的权力，也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他们控制得比较好。例如北朝鲜，至今大家也不知道十年前的饥荒让多少鲜活的生命在饥寒中孤独地消失了。

现在再假设我和读者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政府，我们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我想，救命第一，这应该不是问题，我们不用怀疑西方的价值观确实把人权和个人生命看得比较重。而且，西方参入救援的绝大多数组织和机构都是纯民间的，根本和政府挂不上号，有些甚至在政治理念上和政府唱不同调。

可是问题就来了，毕竟从 1962 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反对缅甸军政府。如果他们有机会，在不流血的情况下，他们是否会利用这次风灾渗透缅甸社会，颠覆缅甸军政府，或者把人权的概念和救援物资一起送进去？对于缅甸军政府，救援物资不进来，最多再死几万人，或者更少的人，可是，如果把美国的一些观念直接送进来，也就把不稳定和破坏和谐的东西一起送了进来，这个政府就有可能玩完。大家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西方政府的立场上，

如果你反对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几十年而不得，甚至无法进入这个国家，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你会怎么做？

这是超级悖论，所以，在联合国里，美国等提出要求不理睬缅甸军政府，紧急救人的提议已经被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否定。目前还在等待缅甸军政府的决定。中国的态度应该很明确，主权重要，人权和救援也重要，但国际救援必须经过缅甸军政府，通过外交。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也符合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方针。

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在我的资信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不愿对什么事都下结论，我觉得，有些思考应该留给读者自己完成。

不过在结束前，大家应该注意到，我上面提到了缅甸政府的态度和想法，提到了美国等西方的看法和要求，也提到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并且把自己，也把我的读者放在他们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思考，应该很全面了，是不是？

如果你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故意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一方——那就是没有被风灾带走生命而活了下来、可是现在他们的生存权正在被灾后的食物短缺、缺乏救援逐渐剥夺的缅甸灾区人民——

按照很多人思维逻辑，在把自己放在缅甸政府、美国政府和西方政府位置上思考过后，就以为全面思考了，却忘记了，我们不是任何政府，而当我们面对那样的灾难，当我们面对艰难和死亡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本来最不应该忘记的是——人，缅甸的人，缅甸灾区正在经历炼狱的苦难的人！

希望我们永远不会真地处在那种处境下去思考人权、主权和生存权，可是，我很怀疑，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把自己放在缅甸灾区人民的位置上，我们能够弄清楚主权、人权和生存权的内涵？！

杨恒均 2008-5-8

抗灾不是歌功颂德

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水灾发生后，美国举国哗然，好长一段时间，从上到下都在借助媒体和各种研究机构，对这次灾难中的人为因素，不依不饶地追问和追究。

众和媒体的穷追不舍，追使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检讨救灾行为，不断地进行反思。直到前不久，才总算把民众的火气消得差不多。当然，少不了巨额的赔款和昂贵的重建，只有这样，受灾民众才会最终放过政府。

在美国，灾难发生后，媒体唯一的工作，就是挖出每一个尚未披露的秘密，揭露每一个公众有权利知道的真相。新奥尔良水灾后期的救灾和重建，算是成功的，迄今为止，无论是美国

政府，还是媒体，也没有找出一个英雄模范大书特书。

在美国民众看来，无论是军队警察还是公务员，救灾是他们的工作，人民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他们，就是让他们干这活的。

下面是我自己想说的话：
灾难发生，在大自然面前，我们人类是多么渺小，它轻易的一次咳嗽，我们就要失去成千上万的同胞，孩子失去父母，父母失去子女，夫妻变成死别---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除了无言承受，我们除了坚强的忍受，还能有反抗的权利吗？

灾难不曾降临的时候，人人都心里踌躇满志，觉得自己可以征服整个世界，可是当灾难来临，我们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大自然轻易就碾死的一只蝼蚁。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所有的争执和恩怨还有意义吗？所有的歌颂和赞美还说得出口吗？

我们不需要媒体对抗震救灾的英雄和团体的歌功颂德，我们需要一个能给老百姓安心过日子的政府，我们不需要地震后岿然不倒的政府办公大楼来证明建筑质量，我们需要大片大片变成废墟的民宅不要再掩埋生命！

万众一心，面对灾难，伸出我们的手，奉献我们的爱，当我们除了在电视机前和电脑前祈祷别无办法的时候，虔心祈祷吧！

开启“民智”不如开启“官智”

在西方多年，最让我得意的就是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常常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政治与公众人物言行中的失误。我不止一次从电视上的政治或者公众人物的发言中发现了错误，我都能第一时间指出来，有时还会立即告诉身边的西方朋友，而当地的媒体，则要等到一两个小时后，才开始发出零星的批评之声，随后就铺天盖地了。在西方，盯住官员与公众人物的言行挑刺是公民的义务和媒体的职责，但我毕竟是一名中国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眼光，还是挺自豪的。

不过，我以前不但没有这种眼光，而且就在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自己也曾经说出过非常离谱的话。记得在一次军事学者参加的会议上，台湾军官与美国防部一位官员一唱一和，在那里反复讨论中国军队为什么不会打仗了，他们提出的原因包括：计划生育弄出了很多独生子，他们怕死，不想打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大家都在忙着赚钱，也无心打仗等等，我当时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站起来脱口而出：你们别忘记了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不实行独生子计划，还有，我们沿海地区不想打仗，但我们还有更广大的内地啊，那里的经济并不发达，人民不会害怕打仗……

至今想起这句话，我依然会脸红。虽然我当时年轻气盛，加上“爱国”心切，急于要灭他人之威风，可我还是不敢相信，当时竟然说了十年后一位姓朱的将军说出的类似的话（他说，要准备牺牲西安以东地区的中国人同美国、台湾打仗），现在我敢肯定，当时的美国人听到我的话后，不但没有被“威慑住”，一定更加看不起我一心想维护的祖国吧。我，凭什么喊

出这种要农村与内地民众来打仗的豪言壮语？谁给我权力代表他们？

我讲这段令人难堪的往事，是想告诉大家，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思想认识不清或者一时糊涂而说出不恰当的话，做出不恰当的事。小人物如我等犯过错误，大人物如奥巴马也无法幸免。我们大概还记得哈佛大学黑人教授被一名白人警察误以为是窃贼而遭刑拘的事，奥巴马在第一时间严辞谴责这位警察“歧视黑人”的“令人愤怒”的行径，激起了轩然大波。奥巴马显然是失误了（那位白人警察只是尽警察的职责而已），但没有关系，意识到错误的奥巴马立即出来解释并向这位白人警察道歉，还请两位当事人（黑人教授与白人警察）到白宫做客，硬是把一件坏事弄成了一件美谈。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第二件事是：领导人、高级官员、公众人物也是人，也会犯我这种普通人犯的错误，只要在人家指出，或者觉悟后能够面对错误并有勇气改正过来，不但不会让你失分，而且会让你加分。

中国的官员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越来越高，有些官员打破了以前的沉默，更积极地在新闻媒体、互联网平台（博客、微博）上发言、与普通民众交流，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这就常常暴露了我们一些官员的真实水平，怎么办？我认为，不要怕说错话，说错了就出来认错，改正过来。官员们不要害怕群众批评，不要以为自己比普通人厉害，更不要假装自己是永远光荣正确的人，做报告、回答记者提问甚至写微博，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开启民智”的德行。

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在急需开启的不是“民智”，而是“官智”。例如，正在北京开会的人民代表与委员们的发言与一举一动，都无法逃脱网民的视线，你发表了离谱或者不靠谱的言论，网民们立即就可以指出你错在哪里，是违反了常识，还是罔顾事实，又或者你正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甚至于你公然违反了宪法，自打嘴巴。在网民的监督与参与下，今年两会种出现的雷人雷语有所减少，算是一个进步。当然，据说与会者打瞌睡、玩电脑游戏与缺席的多了一些。

最近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竟然冒出一句“不要用法律当挡箭牌”。“民智”已开的网民们忍不住大吃一惊，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法律可是 P 民们唯一可以有效用来保护自己的“挡箭牌”啊！想一想，如果没有了法律，民众岂不是要任人宰割？

这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常识，它同民主国家记者可以合法采访、可以自由聚会这个基本事实一样，地球上往少里估算也有四五十亿的民众知道这回事，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上亿的网民们。难怪，当外交部发言人又把纽约时代广场不会允许那么多记者采访的话说出来后，连那些不但没有到过纽约时代广场、甚至都没有离开过自己出生地的网友们都知道发言人错了。为啥这样简单的事实，外交部发言人也会搞错？

最近大陆负责香港的一位官员脱口而出了更加不靠谱的话，他在讲到香港人上街抗议港府的财政计划时，说香港太政治化，要避免犯希特勒与中国文革时的错误。这里先不说他把文革与希特勒大屠杀相提并论是否会受到北京的惩处，就他把世界上拥有最优秀的自由与法治的香港社会里民众的游行示威同毛泽东的文革与希特勒的纳粹等同起来，实在是缺乏了对香港社会最基本的了解，以及对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严重误读。

话说回来，无论是外交部发言人，还是负责香港事务的大陆官员，真要想全面了解美国与香港，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例如受外交纪律所限，不能到纽约广场附近去“围观”、“散步”），

随着现在官员不再被要求死板地照本宣科，他们有时也想发挥几句，难免也就要说错话。说错话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官员绝对不会出来认错，而我们的体制也绝对不允许他们出来认错。你可以对比一下，美国历史上几乎任何一届领导人，都至少一次（或者很多次）向全国民众、某个团体 、媒体记者认过错，说了“对不起”，这事在中国就是天方夜谭了。中国的官员应该认识到，世上最高的道德品质不是永不犯错（根本就不存在），而是知错就改的道德勇气。官员有错就改，体制就多少拥有了部分纠错的功能。

“民智未开”成为很多官员愚弄民众、营私舞弊的挡箭牌。其实，“民智”易开，“官智”难搞。互联网就给大众提供了发挥“民智”的机遇与平台。从民众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判断来说，西方人利用平面媒体走了几百年的路，中国网民利用互联网十年就达到了一定程度。当我看到中国一些官员与公众人物失言，准备指出来的时候，互联网上早就炸开了锅，让我不得不佩服中国网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练就的“火眼金睛”。互联网时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不再是陈词滥调。

可怕的反倒是“官智”不开，或者官员们拒绝接受潮流，不许民众监督、批评他们，一边愚民，一边拒绝开“官智”。更可怕的是，中国是官本位制国家，官员们不但是“父母官”，还扮演教育人民、引导民众的角色。一帮“官智”未开的官员在教育与引导“民智”已开的国民，能没有社会冲突？国家能够真正和谐吗？这才是国家与民族最大的杯具。

杨恒均 2011－3－13

民生篇 动什么，不能动民众

全民医保太“恐怖”

一位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外科医生，为了让孩子能够考上精英中学，给学校老师送了两次信封，信封里总共装了 2500 澳币（相当于一万多人民币）。为什么要送钱呢？很简单，澳大利亚学校的考试不像中国一样决定胜负就在最后的升学考试，澳大利亚学校平时就会根据一些考试成绩和老师的观察给学生打一个分数，这个分数和升学考试的分数综合起来，才能决定孩子到底上什么学校。

那位医生给孩子的老师两大信封钞票时，还夹了一张纸条，意思是，我很想看到我儿子的各科成绩（特别是英语）都有显著的提高。

这位医生送完红包后以为没事了，可不久廉政公署来找他了。接下来是起诉，后来这个案子惊动了整个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法官看来，这是赤裸裸的贿赂，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原来，在医生离开后，那位打开信封的澳大利亚老师傻眼了，立即报了警。对于这位老师来说，身为老师，教育学生是自己的责任，一视同仁更是教师的基本职业标准，收下这些钱无疑是对教师身份的玷污。如果受这些钱支配，那就有可能是犯罪了。

这件案子对那位医生很不利，据说他已经输定了。

可是，这位据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家长医生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说了一句刺痛我们广大中国人

的话。他在法庭上解释，他不是行贿受贿，只是为了感激老师对孩子的照顾。就在大家对这种说法半信半疑的时候，他补充说，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这是我们两国文化差异造成的。不错，我们中国的孔子确实说过，去见老师啊，带两条干鱼吧。这就是表示我们尊师的方式。可文化是前进的啊，西方在学校没有公立公办的时候，你要拜师，你要学手艺，也要送礼、送钱的，甚至被剥削劳动啊。可那是什么年代啊。现在全世界都与时俱进了，怎么还在拿所谓中国文化为自己辩护？现在中国大陆的家长据说为了让老师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是要请客送礼的，那些老师难道不是本来就应该照顾好你们的孩子吗？我想知道，有哪一个家长在给孩子的老师送礼的时候，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迫使他们这样做的？

再说，澳大利亚有三十万华人华侨，还有第二个中国家长封了 2500 澳币给老师作为感谢？难道我们这三十万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就都没有文化了？

这位华人在国内是外科医生，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些更不愉快的事。十五年前，帮一位香港朋友在国内联系外科医生动脑部肿瘤的手术，交了昂贵的费用后，医生暗示手术时还要送红包，最后那位香港朋友无奈地送出了一万元的大红包，手术很成功。

据说现在在中国，不少外科医生动手术都要收红包，否则你就要担心他们在你亲人身体上划下去的刀子是救命的还是要命的，而我们那位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外科医生，一定受到了这种“中国文化”的熏陶。

不好意思，回到正题，关于澳大利亚全民医保的故事。

澳大利亚可能是世界上全民医保做得最好的国家，远远强过美国，这也是我把儿子放在澳大利亚不放在美国的原因之一。在澳大利亚只要你拥有一个医疗卡，看病基本都不要钱。而且，所有的医生只要看一个病人，就收三十多澳币（相当于一百多人民币），这钱从哪里来？当然是由国家医保那里出，也就是全民上交的税钱的一部分。

这个制度好不好？当然好，你们没发现我每年都偷偷去几次澳大利亚吗？我去干吗？去看病啊——开玩笑的，别当真，我除了有时身体有些虚之外，啥病都没有。

可当我一知道澳大利亚有这样的全民医保制度后就暗中为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捏了一把汗，为啥？因为这个制度实在太大方了，稍微不注意，就会有人钻漏洞，澳大利亚政府受不了的，最终吃亏的还是纳税人。

可我担心了好久，都没有问题出现，就在我不再担心的时候，却突然爆出了一件案子，惊动了澳大利亚。

原来，一位不良医生和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好像还包括街坊邻居）串通好，于是那些亲戚朋友们每天不停地来“看病”，可能有时根本不来，只提前或者事后签个名，于是这位澳大利亚医生一天竟然看了一百多位病人。大家算一下，一百多个病人，每看一个，医生就收相当于一百多元人民币的诊金，这位医生一天收入多少？一万多元人民币啊！

按照澳大利亚全民医保的规定，来看病的病人如果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数字，一分钱也不用出。那么就是说，那位不良医生每天欺骗来的钱都是从澳大利亚政府国库里拿的钱，也是澳大利亚老百姓交上去的税金。

这正是我当时了解到这个医保制度后所担心的。虽然澳大利亚至今公开的只有这一例，而且已经得到了严肃的法办，可这漏洞还在那里，想一下，是不是很可怕？

但你不用担心，在澳大利亚这种制度性的漏洞还有很多，可去钻这些漏洞的人却越来越少，少到几乎没有。

就在我刚刚回到广州时，又听到一个好消息，中国的医保方案公布了。这个医保方案和前几天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都是很让人鼓舞的。至少可以这样说，是和国际先进文化和生产力接轨的重要一步。

特别是医保方案，我能够感觉到，如果成功执行，十几年后，我们国家的全民医保真不亚于

西方国家。如果有了完善的全民医保，我就不用偷偷摸摸跑到别国去看病，很不光彩地花人家纳税人的钱看我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病了。
从长远来看，这医保计划几乎可以和西方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相媲美。可问题是，我们有适应这种从外面引进的全民医保的文化和制度吗？这种从外面引进的制度肯定是有漏洞的，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制度，那样的道德水平，那样的职业道德标准，那样的环境，那样素质的民众……情况会如何？
西方是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医院大多是私人的，私人投资医疗也是主流，所以就有了竞争，有了竞争，就有了选择，也就保证了医疗的质量。我们呢？公立医院始终是独大，谁来保证质量？在全民医保的盛宴下，会有很大问题的。
当然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大的制度，如果没有很好的制衡和防腐败的机制，加上中国文化造成的有一点小权就要贪污腐败一下的中国特色，我很想知道，在中国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到后来，一定会出现没有病的人发了大财，有病的人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腐败深入到这种外来的制度中，最后弄得国家财政紧张，普通百姓又得不到好处，搞不好真要国破（产）人亡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别笑我又扯到核心价值观上了。你们也注意到，我们一边和国际接轨，一边拼命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搬进来（人权啊，劳动合同法啊，全民医保啊，教师待遇啊，等等），一边却在那里拼命抵触支撑这些东西的价值观。这样下去，大家好像生活在冰与火之中，搞不好会精神分裂的。
2009.04.16

食物还是出口的好

8 月 17 日《新闻联播》播报了关于《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的相关新闻，白皮书显示，“中国食品总体合格率稳步提升。全国食品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从去年的 77.9%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 85.1%，
同时，中国食品出口到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中国出口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 99%以上。”
回忆了一下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十年是否看到过类似的新闻。结论是，没有！而且，以我对那两个国家的理解，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如果公布的食品安全白皮书上有上面的那些内容，我相信，这两个政府都会备受批评的。
没错，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也不是百分之百，再说我们国家发展的水平还差很多，没有必要用人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说实话，中国一年的食品合格率提高了 5%，确实说明政府以前的失职，而不能说是今年取得了成绩。但即便这样，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有必要钻牛角尖。
可是，我还是认为，如果上面引用的白皮书中的两句话出现在美国或者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白皮书中，民众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政府。
为什么？
请大家看看那两个百分比，一个是今年国内食品安全合格率——85.1%，去年只有 77.9%，前年呢，前年的前年呢……一个是过去多少年来中国出口到欧、美、日、澳等全球 200 多个国家的食品合格率——一直在 99%以上，今年达到 99.9%!
对不起，各位！我就是被上面这几个百分比震住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会为国家出口食品的合格率达到 99.9%而自豪，我也不会为我们国内食品合格率只有 85.1%而自卑。可是，

我会为我的同胞消费食品的合格率与他们出口给外国人享受的食品合格率相差 15 个百分点而感到可悲和气愤！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不管日本还是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食品合格率绝对不会高于供其国内公民消费食品的合格率，更不会高出 15%！因为这些民众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清楚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如果用来供外国人消费的出口食品的合格率远远高于国内民众消费食品的合格率，民众会毫不犹豫地让那个关心外国人超过自己的国民、注意国际形象而忽略本国国民的感受、重视出口赚外汇而不重视国民身体健康的政府滚蛋！
2007.08.17

在中美两国开车，不是堵与不堵

从广州开车到深圳，刚过新塘不久，后面就传来警笛声。这个时候车虽不多，但毕竟是广深高速，三条道上都有车在行驶，所以警笛在我后面响了好一会儿。等有了空隙，这车“呜呜”叫着从我右边超了过去，原来是一辆带“广”字头的广州军区的车。军车超过我之后，没走多远，就又被堵住了。我看到，如果前面的车想让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让出快车道，或者和旁边的车拉开距离，鸣笛的军车就能过去，可是没有一部车这样做。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好多事，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公里的高速路上，我紧跟这部闪烁警灯鸣着警笛的军车寸步不放，一直来到东莞境内。
这可是享受高速路上的“警车开道”，可哪里想到，仅仅三十公里，简直把我辛苦死了。原来，这一路警灯警笛没有闲下来，可不但没有车让出快车道，即便有条件闪避的时候，也没有一部车主动让开，结果可想而知，那部任务中的军车几乎是一路避让绕行，我也跟着它走了三十公里的 S 型，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就慢了下来。
高速路上的军警车警笛嗡鸣的时候并不多，也许速度太快不好让道。但在城市街道和普通公路上，“你的警灯闪你的，我自岿然不动”的情景太常见了。这种景象常常让我困扰，因为没有什么比警灯警笛更能展现一个国家的权威和权力了，而中国人应该是最屈服于权力的民众。可是，如果你把中国司机对待警灯的态度和西方其他国家一比，你就会发现，把警灯不当一回事的反而是中国人。
世界各地闪烁的警灯常常让我驻足思考。我对警灯的关注当然也不止一天了。在澳大利亚、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开车的我，最害怕的就是听到警车声音，因为我总是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闪避。其实，在西方和中国学习驾驶的那个小本子上，都有教导大家在看到执勤的警车和救护车时立即避让。如果你到澳大利亚、欧洲或者美国等地，当你听到远处传来警笛的声音时，你会注意到身边的车都会慢下来，等到看到那警车是朝他们方向开过来时，那条道上的车一定会停下来。
这一情况我当然并不陌生，但我还是被在美国时的一件事惊到了。在华盛顿南边的北弗吉尼亚，有一条在美国很有名的公路，叫哥伦比亚道。这条路很有历史，道路两边韵味十足，好像还有什么讲究；路面有起伏，但却笔直，是我以前经常开车散心的一条路。一次，我去吃晚饭，正好开车经过这条路，我正欣赏雨中的小道时，听到了警笛声从身后传来。
这条路虽然拓宽了，可仍是窄窄的两条，旁边救援车道非常窄，中间是修缮得很好的草坪。正在我不知道怎么避让的时候，一个让我惊讶的场景出现了，两排望不到头的车队，从我前面那部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部又一部迅速转向，车头朝两边滑开去。转眼间，我前

面所有的车几乎都成了车头朝向左前方或者右前方，停止不动了。那景象好像摩西出红海时的感觉，摩西的手一挥，“水”向两边分开，以最不可思议的形态静止在那里。
我当时被眼前整齐划一的好似军事训练的场面震到了，差一点就把车停在路中间。好在前面一辆车给我让了一点空间，我滑了过去，刚刚停好，后面那部警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当时震惊于眼前所见，急忙找出相机，调正了车头，拍下了照片。当然，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由于警车已经离开了，刚才停得一动不动的车也已经开回到路上。在这张照片上，那些车显然还没有完全回到自己的道上，左边的比较靠左，右边的比较靠右，有些车因为没有错开，还毫不犹豫地开上草坪，而我由于闪避不及，还在比较居中的位置。

住在海外十几年，“呜呜”的警车从眼前过去当然是屡见不鲜。为什么这一次把我惊到了？我想，这和那条道有关。因为当时是下午六点左右的下班时间，这条有名的道路上挤满了下班的车辆。突然来了一部警车，这个时候，你根本不能使用慢行或者走入其他道路来避让警车，唯一的办法就是所有的车都尽量向两边靠，留出中间狭小的空间。只要有一两辆车不这样做，警车就无法通过。而且，那条道是美国最著名的起伏直道，一眼望不到边，就因为听到了警笛声，路上我目力所及的大概有上百部车，竟然如此齐刷刷地转动了方向盘，停了下来。
美国人一向对军警和权力不当一回事。可是，看到他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国佬如此敬畏一部也不知道去干啥的警车，我真的有点感动。这也是为什么我电脑里始终保存着这张拍摄失败了的照片。
从我看见这部左避右闪的军车，我就一直在想：如果这辆军车真是去执行军事任务，去保卫国家，去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坐在车里面的军人的心里会不会升起一种悲哀？超过上百辆的车竟然没有一辆主动避让。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就要开打前夕，海南军分区司令员驱车从海口到三亚海军榆林基地视察，车到途中，被一部慢吞吞行驶的大货车挡住了。当时的路很窄，只要那部大卡车不主动让路，司令员的车还真就挤不过去。可任凭那司令员的司机如何闪警灯按喇叭，那大货车司机只当没有听到，就是不让，大概足足有半个多小时，司令员的车终于在一个弯道超了过去。超过去后的司令员命令司机立即停车，截停大卡车，然后怒不可遏的司令员掏出手枪，就把大货车的轮胎给击破了。
这事后来传出来，几乎没有人说司令员做得过火，按照相关法律，这种故意阻拦军警执行任务的行为是要受到起诉的，中国是这样，西方也如此。可是，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却发现，最害怕军警，常常匍匐在权力脚下的民众，却偏偏是最不敬畏警灯警笛的人；而从来不必害怕军警，甚至往往不把军警放在眼里的西方人，却对警灯警笛言听计从，一副随时听从召唤的样子。
是的，不是老百姓不敬畏和尊重象征权力的警灯，而是我们的执法者太多次滥用这种权力了，当统治者使用特权愚弄了民众，民众就对那些正当与合法的权力也产生了蔑视。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军警车辆在不执行任务时，甚至以前在送老婆孩子的时候，也总是无视交通规则，甚至闯红灯。就在他们每一次玷污权力的时候，那本该受到民众敬重的用于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权力也受到了侵蚀和轻视。
好了，最后再讲一个故事。那是二十年前了，有一次在广州环市路区庄立交附近的远洋宾馆的一家潮州菜馆吃饭，当时在场的都是政法系统的领导。菜开始上的时候，一位领导突然提到他办公室里有一瓶什么法国出产的限量的洋酒，另外几位一听就起哄，说立即去拿吧，好久没有喝那酒了。于是，领导招呼司机进来，让他马上开车去取。过了十几分钟，那位领导说怎么还没有到啊（办公室就在离远洋宾馆不远的农林下路附近）。我就起身走到窗边查看，这时，我看到闪烁的警灯由远及近，车停到宾馆门前时，那临时放到车顶的警灯几乎刺痛了

我的眼睛。我看到那位领导的司机抱了一个大盒子从皇冠车里爬出来，两个健步就冲进宾馆。原来，司机开着警灯警笛在最快的时间里取来了洋酒。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想指责什么人和机构。我自己前后对权力的看法与理解，让我知道哪些权力是必须摈弃的毒素，哪些权力应该珍惜，哪些权力是用来保卫国家和保护民众所必需的。
如何让民众不再害怕军警，同时又对真正执行任务的警灯怀有敬畏，可以说是检验军警持有的公权力是否合法与合理的试金石。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只有当权者遵纪守法，民众才会认同法比天大的道理，只有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民众才会对权威保持应有的理解与尊重。
2010.03.03 香港

穷人心理都不正常？

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报纸媒体上常常有发家致富的事迹，他们是在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指引下最先抓到老鼠的“好猫”，俗称“万元户”。这些人有靠摆摊发家的，有靠搞运输发财的，更多的是靠小工厂发迹，我和周围的人一样，对这些万元户是充满了佩服和向往的。

那时可能早就有了靠不正常手段发财致富的人，但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至少我们看到的“万元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中的一员。虽然这种印象被八十年代后期不断爆出的贪污腐败案破坏了，但总体感觉“邪不压正”，总觉得大多数致富的人还是靠自己的双手。

可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老百姓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进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这种变化就越来越显著了。最先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是“富翁”们自己，他们开始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了。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诞生新富翁，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用了十年时间，而千万富翁取代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取代千万富翁则越来越短，甚至给人一夜之间，易如反掌了。

这种看上去越来越容易的致富，渐渐疏远了普通老百姓，也让他们知道了“致富”与自己越来越无缘了。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你可以摆个小摊，起早贪黑，靠出卖自己的脑力和劳力赚钱，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你要想大富大贵，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出卖了。而这时，最容易致富和换钱的就是公权力、整个国家的道德底线，还有良心。

这个时候，民众依然渴望致富，但对于普通民众，靠勤劳和智慧致富几乎比买彩票中奖还要难。对于大多数人，致富变成了幻想。而仇富则成了天经地义的。

我不知道西方或者整个世界，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经历了多长时间，对于中国，也就是十几二十年。这个变化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可以理解的反而是整个社会对致富和富翁们的态度。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有“仇富”心理，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多大岁数，但从他们的心理年纪来判断，一定是“80 后”，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就一点也不仇富——当大家看到你的财富如何得来，当知道你如何致富的时候，他们对富人充满了敬意和向往。

茅于轼老师为富人说话为啥受到攻击？

改革开放后的发家致富是从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开始的。可以这样说，小平当时提出“白猫黑猫”理论是有其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中国人被管死，国家被管死的的时间太长了，老百姓发财致富的主观愿望与能动性被压抑得太久。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小平的号召在民间起到比任何政策都有效的作用。当时，能炒瓜子的就去炒瓜子，能蹬三轮的就去骑三轮，会种水果的不再种粮食……每个人的都找到了自己最有利可图的发财资本，可问题也同时就出现了，这一“不管白猫黑猫”理论也很快渗透到党政机关，国家干部也开始加入致富的行列，要不管白猫黑猫地去抓老鼠了，于是倒卖批文、划地圈地、收受贿赂等等都应运而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黑白不分的“猫理论”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了，我们毫无保留地引进了资本主义那一套市场经济，却把另外一套用来调节和限制市场经济的民主机制（特别是监督机制）摒弃在外。

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底线被拍卖，底线一再被突破；公权力都被投入到自由市场待价而沽，其他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制约的游戏规则被我们拒绝，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普通中国人眼里，“富翁”不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级”，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文革中以出身来划分的那种“阶级”——是天生带来的，或者命中注定的。

近日香港有媒体刊登了统计数据，宣称中国大陆 91%的富翁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裙带关系，我对于这种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持怀疑态度，可当我和大陆朋友提到这一数据时，他们都认为这个统计是靠谱的。而且更让人寒心的是他们都会加上一句：其实不用统计我们都知道，这是常识！

一个“常识”的形成并深入人心竟然只用了短短十几二十年，当发财致富不再是普通民众可以望其项背，当富翁是一生出来就被注定了的时候，仇富变成了理所当然，于是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老先生成了众矢之的。

茅老可能至今也没有搞懂他为什么受到攻击，颇感委屈，他老人家不清楚的是，他和攻击他的人都没有错，他们在两个语境中对话，一个在讲经济，一个在说政治。当茅老从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为“富人说话”的时候，那些攻击他的人却在宣告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发财致富不再是经济问题，也不再是是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经常听到有识之士摇头叹气，为社会上的仇富风气担忧，认为这样下去对中国发展不利，可他们倒是很少去担心那个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正在对大多数的老百姓不利。

穷人的心理不正常吗？

当今中国的富翁比 30 和 20 年前要多得多了，可媒体报道却少之又少。到现在为止，如果还有媒体和电视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推出一个典型富翁，那无异于是对那个富翁的公开预审。富翁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不再张扬。可民众的仇富却在与日俱增，直到上个星期，一群工人殴打一位私企经理致死，我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痛快之声”。其实这一现象早就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一个大陆的富翁被抓起来，民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欢呼雀跃。

我不同意中国人有仇富情节这个说法，除了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我的观察，中国人对于国富民弱是可以容忍的。在过往观察国际问题时，我常常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中国人均 GDP 在全世界排名要到一百位以后，属于发展中国家中比较穷的，

但中国政府却是一个富有的政府，国家公务员用公费出国的比例可能也是全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一个稍微有点级别的领导人出国就大摆排场，国家领导人更是财大气粗，在国际上大摆面子……

这种现象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民众早就不满到要上街游行了，毕竟一个国家所有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得来的。国家花的钱都是大家的，政府花多了，用到老百姓身上的自然就少了。可受到几十年特殊教育的中国人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家有面子，强大了，是好事，即便老百姓穷点，少分点钱，也值得。中国人不管多穷，即便勒紧裤腰带，也不会让国家没有“面子”。这样的老百姓在世界上已经成为稀有品种了，主掌这样国家的政府，应该为此感谢苍天。

中国的精英和国外的观察家们早就清楚如下的现象：中国强大了，老百姓平均的生活水平却并不高。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 GDP 比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速度多了几倍，可中国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速度却比人家慢很多。要知道，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工资增长水平比美国的快了 70%。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都被“国家”拿走了，老百姓就算继续勒紧裤腰带，也不会仇富或者口出怨言的，问题在于，随着资讯的发达，互联网的成长和媒体的开放，普通百姓越来越看清楚，改革开放的红利都被一小撮“富翁”和权贵占为己有了，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往往打着“国家”的牌子。大家不妨看看各地征地、拆迁，本来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商业行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用市场规律可以搞定的，可是各地都出动了维护国家政权的警察来对付弱势。这是最典型的拿“国家”来帮助富人发财致富的例子。

中国人“不患寡，只患不均”，这个“不均”的并不完全是说的“平均”，而更多地是包含了公正、公平与合理。老百姓为什么一看到有富翁被逮捕就咬牙切齿，甚至认为每抓一个都该杀？因为让富人们致富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违反了国家法律和老百姓心里朴素的价值观的，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被民众监督的权贵市场经济，很多富人致富之路也就是权钱勾结的犯罪之路。

富人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问中国富人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一定有恶搞的朋友说，当然是国外。这话一点不假，我想，中国当今的富人们即便没有外国护照，没有把孩子送到海外，那么也一定转移了可以供几代人享受的资产到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即便一些新富们，也一定在积极打算“走出去”。

其实，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哪一个毛孔是那么干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富人积累财富的过程并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要邪恶和凶残。问题在于，那些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已经走出了困境，而我们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在扩大，仇富情绪在扩张。更糟糕的是，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看过几本书的人都清楚，我们至今放着河上的桥不走，还在小河沟里摸着石头过河。也难怪，从官员到富翁，到普通老百姓，心里几乎都感觉到，这样故意摸来摸去，总有人要淹死的。所以，能够转移，就转移吧。应了路易十五的话：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过往的社会变革大体可以归结为两条路子，民众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及有精英主导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由民众的革命推动的，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可惜，被农民起义推动的中国，要说进步，实在乏善可陈。

可见要想社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应该是上下一起动，政治、财富和知识精英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拿中国目前来说，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精英和富翁们应该反思一下，

如何明确致富的游戏规则，如何用良性的互动推动社会进步，从而也让他们已经获得的财富合法化，让今后所有致富的行为合法化，否则，他们除了转移资产到国外的这条出路，就是等着中纪委半夜来敲门，或者更坏的结果，等到老百姓来收回自己应得的那份。

学界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应该在民主化之后或者同时来分配社会财富（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这种情况发生在苏联东欧那里，所以，社会变革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大体上却比较平稳；另外一派认为不妨让富人们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如果可能的话，把国家都变成私人财产的也在所不惜，希望寄托在捞到钱的富人和权贵身上——当他们把国家瓜分完了，把大家的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了，哇塞，私有制不就形成了？！

第一个理论听上去很美，问题在于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年的"财富再分配"后，那样做的基础已经没有了。第二个理论听上去不美，但如果能够真实行起来，前景却一样很美。问题在于，中国的富人和权贵会听你的吗？他们是否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在自己的财产达到某一个界限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突然要从"带头致富"到"共同富裕"？他们能否改弦易辙，抛弃旧的邪恶的致富规则，而重新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在香港的一点感受：路在何方？

我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香港开会，而香港却是一个贫富差距并不小的地区，可我没有在香港感受到弥漫中国大陆的那种仇富情绪。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开会所在地的香港理工大学，置身在校园的时候，四周一望，几乎所有的楼房上都是香港富翁的名字。原来这些发财了的香港富人，不忘回馈社会，对慈善和教育事业多有捐出。

我很感叹，大陆的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说，大陆大学的楼房也越来越多以富翁的名字命名啊。我问他们是什么富翁，他们开口说出了一串名字，我一听，又是我熟悉的港澳台富人的名字，大陆富翁的几乎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当然主要的是大陆富人们钱的来路不正，自然不能高调，否则投入教育事业，"包养"一个教学楼，就会成为别人质疑的对象。于是，和港澳台以及国外一些富翁们争着"包养"大学楼相反，中国大陆富翁们投入大笔的钱包养年轻的女大学生，包养二奶。

还有一个原因，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富翁们很清楚，他们能够致富，除了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机遇之外，和社会认同的致富游戏规则分不开，没有公平公正和合法的游戏规则，富裕起来的不一定是他们，于是当他们富裕了，很多时候想到的是回馈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富人们对公益和教育事业兴趣不大，但对于投资于政府官员和权贵，却积极热衷。他们很清楚，让他们致富的是官员，于是他们要回馈的不是社会而是官员。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每一个富翁落入法网，就能够牵扯出一长串贪官污吏；而每抓一个贪官污吏，又都能够顺藤摸瓜逮捕一大溜"包养"他们的富翁。权钱交易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严肃地警告年轻官员，不要沦为富翁们的"家奴"。

普通民众都怀有一个善良的愿望，期待权贵和借助体制先富起来的人也许会慢慢变得善良一些，更有责任一些吧，愿意制定一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看到希望的游戏规则，可没有想到，一些富人继续帮凶，甚至主动作恶。把公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家奴，随后，他们和自己的"家奴"一起，把国家的主人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公仆"。

一个富人再怎么剥削人，甚至花钱去道德败坏，他损害的只是他的雇员和少数愿意被他玩弄的女人，可当这些无良的富人学会了权钱交易的时候，当他们用那些肮脏的钱和官员一起同流合污，继续坑害老百姓的时候，他们污染的是整个国家，损害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民众。中国的仇富，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这些原因吧？

民众是什么级别

深圳一位涉嫌猥亵女童的五十八岁官员在遭到家长质疑的时候，叫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句：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后来有比他“级别”更高的官员出来道歉，说是这位深圳海事局的喝高了。这话我相信，因为对这种长期受到教育的官员，只有喝醉了的时候，才会说出真心话。否则，他们满嘴谎言，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这位官员酒后吐真言，让中国民众再次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育。说实话，如果他不是在猥亵一个女童后，说出来这样一句关于自己“级别”的话，我们有理由有办法有能力愤怒吗？例如当他用这样的话压制民众，用这样的话耀武扬威，用这样的话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的时候，民众有几个有渠道、有办法、有能力、有胆量对抗一个和你们市长一样级别的官员？
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官民分化和官民对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宿命，但不要忘记了，人类社会进入到 21 世纪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突飞猛进，中国也不能走回头路了。可是在一些官员心目中，不但官员高人一等，而且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一个深圳市，他喊出了“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就可以压住平民百姓了。这次之所以没有压住，弄得满城风雨，恰恰在于“酒后吐真言”。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他不说这句话，如果不是有很多不屈不挠的目击证人，如果他只是暗暗用自己那“和市长一样的级别”来对付普通百姓，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你是生活在我们这块神奇土地上的民众，如果不是生活在某个利益集团的象牙塔里，你的经验绝对会让你对这样“级别”的官员的能力深信不疑。别说级别都和“市长一样高了”，就算一个小镇长、处长、科长、股长，也绝对可以摆平民众的。
写到这里，感到有些悲哀，禁不住想问一句，在这些官员眼里，民众到底是什么级别？
无论从我们的宪法还是每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文件，民众在他们口中都是级别最高的，他们就是为民众服务的。他们是民众的公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民众的。最后干脆直接说，他们就代表民众的利益！
那么，谁能够告诉我中国民众是什么级别？
问过这个问题后，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幕场景：一位道德败坏的官员突然对我吼道，我是和你们市长一样级别的，你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算个屁呀！
我听后反问道，你知道我是什么级别吗？那家伙听后一愣，他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就很冷酷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枪，瞄准他那颗腐败的心脏，在扣动扳机前，很酷地说，我的级别嘛，在我们的国名中，我排在
“共和国”三个字的前面，我的“级别”比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还高。现在，我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啪啪”！过瘾，过瘾！——不过，太残酷了，而且，落于俗套，或者说是我没有逃脱当年被灌输的那些鲜活的画面。
那么，我们这些普通的民众在面对那些一层一层“级别”的官员们时，有什么办法呢？难道真要等着他们来一个一个“收拾”我们？要知道，部长下面有局长，局长下面有处长，处长下面还有科长和科员，最后才轮到平头百姓。
最近有一则新闻让我激动万分夜不能寐。这是一则假记者领取红包的新闻。话说某地发生矿难，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奔走相告，结果一些记者和更多的社会闲杂人员蜂拥而至，个个自称记者，来采访报道死伤人数。当地官员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不让消息外露，给那些真假记者

共四百八十人发了二十万元（人民的币）的红包，作为封口费，点头哈腰送走了真假记者，皆大欢喜。据报道，真记者只有少数几个，绝大多数都是假的，事情曝光后，舆论哗然。
哗然的舆论自然是辱骂一片。有的骂真记者缺乏职业道德，有的骂假记者缺乏人格，更多的骂当地政府官员既没有人格也没有官德。不过，我认为，骂声一片都不得要领，要是我说的话，我们应该欢呼雀跃，何止欢呼？在看到深圳海事局那个新闻后，重温真假记者发财记的新闻，我是老泪纵横、喜不自禁呀。
这条新闻不正说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正在日新月异地进步，正在朝着光明的前途奋进？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有官员害怕民众揭露真相而给他们封红包打发他们离开的？几千年历史上，民众敢揭露真相，即便不被打死，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哪里有红包？
即便是今天，大家能够想到官员给你送红包吗？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或者换一个说法：非官员的人民——除了你是在家务农或者属于城市“窝囊废”之外，我们哪一个没有给政府官员送过红包之类的？

可是，这则新闻却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分明看到了官员放下架子，给记者，特别是假记者——这些非官员的人民——送红包，你真没有看出社会的进步？乱骂一通干啥？
我再弱弱地问一声，这些真假记者是什么级别呢？怎么让我们的地方官员如此害怕？如此礼贤下士？如此爱民如子到封红包？难道他们是北京派来的，难道“级别和你们的市长一样高”？要不然，我们真想不通呀，有级别的官员怎么会给没有级别的民众送红包？
好吧，让我们来拆穿那些官员害怕什么。他们不是害怕民众的级别，他们害怕的是真相，害怕的是言论自由，害怕的是民众的监督和互联网相对自由的舆论和民意！
有记者证的就叫记者？没有记者证的就不是记者？记者是揭露真相的，但有些拿记者证的只收红包，专门负责掩盖真相。而很多没有记者证的中国公民，却在生活中随时记录下真实，揭露真相。但是民众没有记者证，民众看到真实，不掩盖真相，民众就是公民记者，民众的级别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
不过事实上，看起来，民众是有“级别”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到 21 世纪的今天，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美国正在实行大选，我们看到，无论是共和党抑或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们即将掌握的权力应该属于人类历史上级别最高的，但连他们自己心里都清楚，比他们级别更高的是民众——美国的普通民众。民众将用选票决定他们的级别，同样用选票评定他们的成绩，决定他们的去留和历史地位。
在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里，从上到下都应该有一个共识：这个国家“级别”最高的是民众。对于长期生活在有级别的官员统治下的民众，他们对级别那夹杂着鄙视、崇拜和无奈的复杂感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正如三岁小孩都知道的，在当今官场，要想提高级别是一定要付出的，例如副厅到正厅，正厅到副省，都需要一定量的固定打点费用和人际关系。同样的道理，民众的地位和级别的提高也不会是免费的午餐。
然而，我真的很不想看到那种用冒充假记者的方法来提高我们面对官员时的级别。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我认为在现阶段，最好的就是言论自由，媒体开放，允许民众说话，让那些有级别的官员真正接受民众的监督。这样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
说到这里，该澄清一下。因为我一直在使用级别这个词，我怕有人会误会我满脑子都是等级和级别观念。其实，级别还是很重要的，有了级别才有待遇。我想提高民众在国家的级别，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举个例子，在说到级别的时候，最近又有一则新闻可以让我们这样理解，在中国，民众的级别是挺重要的。
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中国人——普通的中国民众也是有级别的，级别不同，待遇迥异。我说的中国人是指大陆的中国人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人，我说的新闻是大陆海协会日前致函台湾，就毒奶粉事件给台湾造成的危害向台湾普通消费者和民众正式道歉，说对不起。

这件事其实是我一直主张并写博文支持的，按说，我应该为海协会的行为而欣喜若狂、老泪纵横，可是现在看这篇新闻，我却和看假记者新闻的感觉正好相反，我不由得悲痛欲绝。

在毒奶粉事件中，台湾民众虽然受到了伤害，但比起大陆那么多民众，比起我们成千上万的苦命的孩子，他们那点伤害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人家就得到了道歉，人家就有海协会会长说声“对不起”。

我又忍不住弱弱地问一声，你们什么时候对我们这些大陆的民众道歉，说一声“对不起”？难道大陆十几亿民众的级别还不能让那些比海协会级别高一点的人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

2008.11.01

都是“弱势群体”惹的祸

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以大篇幅报道官场“弱势”群体画像，描画“弱势”心态在中国蔓延，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统计数据显示：73.5%的网民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公司白领有 57.8%，知识分子的比例是 55.4%，就连天之骄子“党政干部”，也有高达 45.1%的认为自己属于“弱势”。

就在昨天，我这个“弱势”遭遇了更大的“弱势”，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网络风波。我带 82 岁的父亲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打针（广州只此一家），感觉他们的排队程序不合理，弄得父亲和一群中年人一起等了好几个小时，体力不支，就去问护士：“为什么等这么久？”，结果她立即回了一句：“大家都在等，你没看到？”这让我挺生气的，虽然她态度马上有改变，我们也没有争论，但我还是把我对护士的“生气”发到了微博，结果竟然有十几位网友指责我“欺负弱势”、“不换位思考”，甚至上升到“恃强凌弱”，我一看，坏菜了，还是删掉吧，再这样辩论下去，我都快成“特殊利益集团”了。

我当时之所以会生气，正是因为觉得 82 岁的父亲是弱势，医院一点也不考虑这种不合理安排（不是先来后到，而是全体一起看病，一起打针，先来的都得一起等到最后），才理直气壮，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气还没有撒出来，那个护士就成了护士这个弱势群体的总代表……

这是关于我 82 岁的老爸的故事，还有一件让我郁闷的事是关于我 18 岁的儿子。如果用中国目前的标准去划分澳大利亚的“弱势群体”，毫无疑问，新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肯定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之一，除了少部分贪官污吏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一穷二白”来到澳洲的，和澳洲当地有地有房的白人没法比。这种“弱势”心理使得澳洲华人加倍勤奋与努力，付出更多的代价去建家立业、发财致富，可喜的是，绝大多数还真的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但即便有了成功，那种“弱势心态”依然存在，尤其反映在对子女的要求上。说好听点，就是对孩子严格要求，希望他们好好学习，说白了，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要读最热门最赚钱的专业，进入主流社会认可的热门行业。我当然也不能脱俗。好在儿子成绩相当不错，要考取最好大学的最热门专业也不是问题，可是，在考试前不久，他突然向我们宣布，他的理想是去开飞机……

各位，在澳洲这样的地方开飞机，工作不但没有保障，而且仅仅培训费就将近十五万澳币（相当于 100 万人民币），再说，你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富翁是开飞机发财的？可是儿子很明确地说，这是他的 passion (强烈爱好)。我想告诉他，爱好能够养家活口吗，爱好能……我突然意识到，儿子的心态已经与我的“弱势心态”不同了。实事求是的说，在澳洲这个地方，即便不去当医生、律师和商人，恐怕也不会没饭吃，也不会流落街头，或者就成了“弱势”，在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的社会，跟着感觉走，追寻理想，变得也轻松多了……

在澳洲，你要在老板和工人中明确划分“强势”与“弱势”还真有些困难。你当老板雇佣工人，按说够强的，可国家的各种法律和规定，让你在同工人打交道时，往往处于“弱势”。工人呢？却得到很多保障，有国家强制老板提供的，也有国家嫌老板做不来而征收税收进行再分配，用之于工人的。你要说老板不好当吧，可别忘记，老板是纳税大户，很多时候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通过自己的金钱控制的媒体与代言人等），更重要的是，法律保证他们拥有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我们大家可以记忆的这几十年里，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澳洲的富人被剥夺过财产？中产阶级被人抄过家？老百姓的房子被人强制拆迁过？

海内外的评论大体把中国这种“弱势蔓延”的心态归咎于收入达不到预期、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生活压力大、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等，都是有一定根据和道理的，但最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归纳到缺乏制度与法治保障。一个公正、公平与均富的社会，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一个有法治保障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自己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人，抱持“弱势心态”的人群自然会大大减少。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法治不彰，穷人可能被富人欺负，富人的财富可能被权贵鲸吞，权贵则可能被更大的权贵折磨与玩弄，最大的那几个权贵被“民意”折磨，整天担心被人民清算……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又同时会被更加“弱势”的人认为是“强势群体”。

在西方社会学的语境中，“弱势群体”只是指那些社会边缘人如流浪汉、妓女、长期失业人士等等，早就不再把工人、农民或者小摊小贩当成“弱势群体”了，“弱势群体”始终占人口中很小的一个比例，成为大众关注与救济的对象。可到了我们这里，这“弱势群体”竟然占了绝大部分（算起来会不会有七八个亿？），连得天独厚的党政干部，都有将近一半自认“弱势”。一个“弱势”充斥的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与和谐吗？当“弱势群体”的队伍日渐壮大，“强大”到接近百分之八十的时候，那些“强势群体”还强得起来吗？

2004 年我从国外回到中国，写了“致命些列三部曲”，其中《致命武器》无疑是代表作。这是一本把“弱势群体”（农民工，小说中选用当时的说法“盲流”）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的通俗小说，常常写得我泪流满面，而书中所使用的有关“弱势群体”的故事，都是从新闻上搬过来的，无一编造。那是从事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工作近 20 年后，我第一次猛然意识到，威胁这个国家、危及中华民族、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最“致命武器”不是什么外国人的飞机大炮，不是西方的间谍特务，而是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弄出了的这么大一群“弱势群体”……

这本书受到读者普遍好评，后来才知道，早在上网的同一年，已经上达天庭，多少对当局改弦易辙，多关注农民工起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只是，我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一辈子都处于“弱势”的母亲。母亲离开后，翻看她留给我的遗物，发现了这本她老人家翻烂了的《致命武器》，以及她写在封页里的留言：“2006 年 6 月 8 日……如果在政人员看了可能有很大的帮助对人民有好处。”

母亲的这句话，我会印在新书的封面上，来自“弱势群体”并一生都没有走出“弱势”的母亲，始终对“弱势群体”充满了同情与支持，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代，一切货币都在贬值，只有母亲留给我的这种与弱势群体站在一起、为公平与正义而呐喊的信念与勇气，是比任何金银财宝都坚挺的“货币”，陪我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危机。

我们弱势但不自暴自弃，我们坚韧且充满激情地去面对与改变中国人的“弱势”，在此，我愿与诸位再次分享我的座右铭：三种简单但又强烈的激情支配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不堪忍受的悲哀！（罗素）

杨恒均 2010-12-10

教育篇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

西方教育让儿子失去了“理想”

看了我写儿子在西方上学的文章，很多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就教育问题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推动一些改革。我又何尝不想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教育是头等的大事。如果想一个国家发生变化，最平和又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成人加强启蒙教育或者宣传洗脑，可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彻底发生变化，则非得从孩子的教育开始不可。

对成年人的思想控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控制了现在，就可以改变过去；改变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说的是篡改历史和控制舆论的重要性。可如果在和平年代，则我认为下面的话更加具有普适意义：谁控制了孩子的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

当然，我这里说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内容，是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多少人读书，多少人失学的问题。

我对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我出国之后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我很想知道中西文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只要在大陆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年轻人出国后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而在西方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移民第二代却再也无法融入中国大陆的社会——你能告诉我有一个海外出生的华人华侨能够从精神上回流到中国大陆的例子吗？

十几年前出国后，我除了老老实实潜伏下来，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外，有段时间我一度把注意力转向教育，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甚至是经济，都不能最终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最终将由我们施于孩子身上的教育来决定。

于是，我先后在美国和澳洲大学（美国的是华盛顿的一所大学，澳洲的是悉尼大学教育学院）里申请了教育学硕士等课程，但都因为看不到显著效果而半途而废。可我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形式和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因此，我一度悲观地认为，与其任凭学校把那些垃圾和有害的东西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不如让他们当文盲。当文盲的话，他们总还有靠自己的天性和经历觉醒的一天，可一旦被灌输了那些所谓的“知识”和害人的价值观，他们就沦落为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知识人”了。

没有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可我自认对教育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从中国农村小学读起，又到多个国家读书，在四十多的高龄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经验也有教训吧。可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最终认定是教育的内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而我始终无法掌握外国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不可能再靠我一直自鸣得意的“实践”的方式到西方国家的小学、中学去“潜伏”，去取经。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想到，我对中西教育最大的灵感和收获却来自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国内读幼儿园，到美国和澳洲读小学，小儿子出生在国外。我对他们的教育一直很重视，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本能关心。可后来，就在我对教育很迷茫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两个分别在美国和澳洲从幼儿园一路读到高中和小学的儿子，却给我另外一种启示。虽然我竭力在用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式方法教育他们，然而，短短两年后，我就发现在教育上（包括世界观上）他们和我渐行渐远。那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澳洲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在短短几年里，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我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人，可面对他们学校整天放羊似的教育，我竟然显得无能为力！

（插一句，说到美国和澳洲“放羊似的教育”，我要控诉：几乎就在儿子要考大学的前一年，他们竟然还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延长教学时间，早上九点才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中间竟然还有那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读小学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读到四年级，竟然没有给我带回一本让老子看看他在学什么的“课本”，到他教室去，竟然发现，他大部分时间是爬在地上一边玩耍一边听老师讲课的，我郁闷啊！想当初老子在神州大地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早起晚归，忙得连偷看邻家女孩的时间都没有……）

从自己和儿子身上，我深深的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的内容，而我们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在小学和中学就被决定了的。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在研究教育上的“潜伏”毫无疑义，反而是无意中以儿子做实验，让我感受良多，也最终让我明白，人是怎样被教育出来的？我为什么是我？我的儿子又和我有什么不同？……以及，你为什么是你，那些年轻人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大家注意到，我并没有说哪种教育好哪种教育坏的意思，这不是此篇短文里要探讨的。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特别是理工科的设置和内容几乎全盘西化，就连社会科学，各科目的设置也是从欧美以及前苏联引进的。唯一有中国特色的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课文内容的设置，让我们有了中国特色。

和很多朋友期待的我来攻击一番中国教育相反，今天我要“攻击”的正好是儿子所受的西方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十六岁了，快要高考了。我对大儿子影响比较大，从幼儿园就灌输他要“有所作为”，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他已经从我对他的中国式的灌输渐渐走开。

我曾经按照我的父亲对待我的方式多次和儿子讨论理想，也就是今后想干啥事、想从事什么职业，一开始，他还能听我忽悠，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当科学家，要当公务员，要当作家，要当……。可最近一次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对我说，可以开一个卖东西的小店铺啊……

乖乖隆的冬！你不在中国，我就不怪你不想当雷锋、王杰、黄继光，但你至少也应该有当一名厅长、局长或者师长、团长的志向吧，再不济，你也应该搞个科学家、不拿工资的市长、总经理、作家什么的玩玩吧？没想到他的理想就是去开一个小商店，看到我横眉冷对怒发冲冠血脉膨胀浑身上下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儿子心态平和地说，能养活自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就很快乐了。

鉴于万恶的西方教育把我的大儿子搞得一点“理想”都没有了，我就立即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刚上四年级的小儿子身上。我要多和他交流，多引导引导他。特别是利用他回国的机会，我得让他从小心中有一些榜样。要知道，在中国的教育下，像小儿子这么大的孩子，早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但有那么好的主席（主席的睡衣）、那么好的将军（朱德的扁担）、还有让孩子都能流出眼泪的“人民的好总理”恩来同志，而且，九岁的中国孩子谁不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

可是，我郁闷地发现，我的那一套在小儿子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才多少年没有把他抱在怀里啊？竟然这么快就被澳洲的学校“洗脑”了？！

很显然，我已经无法在儿子心中树立一些我认为是楷模的榜样，无论是什么“家”还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小儿子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说到“当官的”，在他眼中，竟然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官的”还没有一个拥有几匹马的农民酷。在儿子眼里，当官是不实际的，又不开工厂，又不卖东西，靠什么赚钱呢？靠税收养活的人，总要看纳税人的脸色，腰杆总是站不直的啊。(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最优秀的人才，总是集中在创造财富、钻研科技、从事教育等领域，至于公仆的行列里，大多是碌碌无为的家伙）

在儿子们的学校，好像没有任何政治思想教育课，也没理想培养之类的课程，我曾经和八十岁的老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他和我一样感觉问题很严重，我们当时一起哀叹，这种（西方）国家，到时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干劲和理想？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理想、道德和中国式的思想教育这一课，就由我这个老爸来完成。

不幸的是，我失败了，更不幸的是，儿子并没有失败——不幸在哪里？不幸在我从中国带出来的那一套是失败的！更不幸在哪里？在于我那失败的一套正在教育全中国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培养出来却能够让这个社会挺和谐的，甚至那些整天放羊似的教育却仍然培养出在科学技术和各方面都引导世界潮流的人才，而我们，一个最注重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国家，却培养出——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好不好？——培养出我这种到了四十岁还在迷茫和彷徨的人……

我再强调一句，区别不在教育的方式方法，甚至不在于有多少人不识字，是文盲，更不在于我们的孩子是否从小学就开始加班加点学“知识” ……问题的关键，也即是我们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杨恒均 2009/4/30

最牛的价值输出——高考噩梦

老同学相见，音容笑貌依然，然而 25 年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及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的滚打磨爬，足可以让我们“貌合神离”了。经过多年的努力，老同学们都打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除了对过去共同的记忆和对未来一些相同的憧憬之外，其他的相同之处确实不那么多了。不过，有一点却让我非常讶异，那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共同之处：我们都做过同一个梦——一个关于高考的恶梦！

关于高考带给我的恶梦，我曾经写过，不过是轻描淡写而已，因为我一直担心那是我自己心理有问题，再说，考上一个大学，竟然做了 20 年的恶梦，实在不是一件值得大写特写的光荣事。

去年我参加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87 届大学同学聚会时，无意中提到高考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还经常做和高考有关的恶梦，结果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到我的话，一下有好几个同学附和我说，他们也常常从类似的梦中惊醒。

在这次迟来的高中同学聚会上，我本不会提起。可是没想到一位当时成绩最好的同学在发言中突然提出了自己一直做高考恶梦的事，并对都已经有了“备战”高考的子女的老同学们告诫道：千万不要让你们的孩子为了一个高考，再做二十多年的恶梦，像我们一样。

话一旦被这位同学说开，真可谓群情激动，于是纷纷说起了自己的高考恶梦。高考的紧张虽然得到了好成绩作为回报，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二十几年里，那种未成年时的过度紧张造成了经常性的恶梦：有的同学梦中发现到了考场却忘记带准考证；有的则发现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根本不是自己考上的那个大学；有的一路狂奔，只因起床晚了，错过了高考时间；有的正坐在考场打开试卷，却发现一题都不会做，在梦中奔溃了；有的在梦中看到老师铁青的脸，意识到自己考砸了；有的在高考后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跳农门无望，继续在农田里“锄禾日当午”……

最后老同学们自然不忘记加一句：你的恶梦什么时候结束的？

对于其他人，这些梦境看上去也许并不那么可怕，但对于我们经历过残酷有如战场的高考的人来说，则绝对是恶梦，常常让我们在梦中惊醒，有时惊出一身冷汗。

这种恶梦对我们这整整一代所谓精英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也许只有未来的心理学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高考那种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还在“拼搏”的所谓“学习”对我们这些尚在发育阶段的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摧残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人对高考制度提出过质疑，也有人从孩子们的身体状况提出过问题，但很少有人从孩子的心理健康探讨过这一问题。也许心理学还不够完善，还无法深入研究下去，他们只认为自杀才是心理出来问题，却不知道另外一些心理问题可能更长久的影响一个人，以及他生活的这个社会。

放下心理学理论不提，对于高考的个中滋味，我们是过来人，感觉是从一个战场幸存下来，不堪回首。加上我们对现有的应试制度也无能为力，所以只能漠然地看着一届又一届的高中生遭遇同样的折磨。只到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时，才蓦然回首，后悔却已来不及，看来，我们的孩子也要遭受同样的折磨和罪孽。

就在我们这个班级成绩最好的同学站在讲台上“控诉”高考制度，并殷切希望老同学们

在对待自己子女上不要重蹈覆辙的时候，我们班另外一位成绩最好的同学——老班长杨恒均，早在十年前就悄悄把儿子送到了国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他远离我们那个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高考制度，避免缠绕我二十年的恶梦在下一代身上延续。

谁说中国不输出价值？让我们把同一个恶梦带向世界各地吧！

可是，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恶梦”在考试制度上率先实现了，也成为中国这些年继输出中餐馆和唐人街文化之后最牛的一项价值输出。

这些年由于华人大量涌入一些国家例如澳洲，结果当地本来按部就班的考试，也因为各种补习班而变得空前的激烈。现在如果到澳大利亚的一些精英中学去看一下，你会吃惊地发现，最好的精英中学里，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是华裔，这和华人华侨在澳洲总人口中的比例是严重失调的。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当初设立这种考试制度的澳洲人的担忧。

华人华侨的孩子能够进精英中学，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智商就比白人高，也不能说明我们中国人更聪明，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因为华人华侨的孩子刻苦，父母肯下本钱，加上牺牲孩子们玩乐和休息的时间（例如放学后的时间和星期六和星期天）送他们去各种补习班，初中就开始学高中的课，高中就开始学大学的课。在补习班里一遍又一遍地做习题，被范文等等。

在澳洲的教育制度特下，特别是小学升中学，严格来说和中国的高考制度一样，但在亚裔人口大量涌入前，从来没有什么补习和加班加点“备战”考试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如果现在去到各个补习点看一下，里面坐的几乎是清一色都是亚裔学生。

澳洲人最近在检讨这种考试制度，因为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可能会出现精英中学里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澳洲白人的学生越来越少。而那些靠补习和所谓“刻苦”进入精英中学和各大重点大学的亚裔会越来越多。

澳洲人担心什么？亚裔拼命学习，牺牲玩乐的时间考上好的学校，难道不是贡献澳洲？难道不符合澳洲等西方国家的“公平竞争”？当然不是。澳洲人担心的是中国人带过去的那种“学习风气”，或者说被中国移民家长们带过去的那种应试方式方法——那种牺牲孩子的玩乐和休息时间的做法，不但破坏了澳洲的教育制度，而且通过这样“竞争”一路考上去的孩子，就算是重点大学毕业出来后，他们的工作能力，特别是创新和创造能力，往往名不副实。而那些实际上有创造力和天赋的孩子，却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竞争中连大学也考不上。

澳洲一些有识之士是不是杞人忧天了？也许我们应该去查一下记录，为什么各种国际大考的数学和科学尖子都在中国，可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都是人家设计的？为什么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考试都遥遥领先，可环顾周围，世界上几乎所有现代文明的科技产品几乎没有一样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就在写此文的时候，又发现一个不那么有趣的现象：大家都知道西方国家的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有很多假期，往往弄得父母很被动，因为他们要上班，孩子却放假在家。而就在这个国庆节假期里，我发现中国却正好相反，大人——这些公务员、商人和工人等等都在享受国庆长假，可我们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班孩子却已经悄悄返回学校，开始“备战”考试！——这是个什么国家？大人们享受假期的时候，竟然让没有成年的孩子们去“学习”去“拼搏”去“备战”？！

不过，各位也有值得感到欣慰的地方，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输出价值？这不，我们总有一天要让我们那种折磨孩子的考试方式传遍全世界，让世界胆战心惊，真正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个关于考试的恶梦！

杨恒均 2008-10-2 随州

我对儿子讲我们是少数民族

最近由于俗务缠身，很想暂时既不写文章也不上网。当然网友可以理解为最近敏感的话题太多，如果不想把自己也弄得敏感的话，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假装聪明，对什么都来指手画脚一通。真正聪明的作者都明白：有些议题最好绕开来——例如宗教和民族问题，这样你才能永远保持政治正确。

对于我这个业余写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虽然网友不停提醒我“你没有权力保持沉默”，可我毕竟不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不对？我可以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我可以借机到世界各地旅游一番，去搞我的国际问题研究，而且，最妙的是，狡兔三窟，我还可以离开东半球到西半球，随着太阳转；也可以离开北半球到南半球，来到最适合人类住居的澳大利亚——那里的季节由于和中国的正好相反，我发现人类最高的理想都可以实现了：你可以选择春夏秋冬——不喜欢冬天的可以一年过两个夏天，不适应夏天的可以一年享受两个冬天。再说，又可以和儿子在一起，何乐而不为？

不过一来到澳大利亚，就发现问题大得很。原来最近一段时间，这里的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把西藏、中国人权和奥运圣火等当成头条新闻，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只当没有看到的，也不见朋友，不写文章，不发表议论，可是我的两个儿子却看得清清楚楚。小儿子还可以对付过去，上高中的大儿子就不好办了，而且我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好像他老子是来自一个蛮荒之地，来自一个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家，来自一个侵略者的国度，来自一个——

躲得过网友，躲不过儿子。一个人可以对全世界隐瞒自己的观点，却绝对不能不对自己的儿子有所交待。我还是不能回避西藏问题——这可是一个集统一与分裂、宗教信仰与民族冲突于一体的超级大问题。不过，既然是对儿子讲，我就天马行空，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吧。

1）小心老子揍死你！

我的两个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在美国和澳洲上的。他们都有正规的中文名字。当时孩子出生时，远在湖北的奶奶（上帝保佑她老人家在天堂里幸福快乐！）按照家乡农村的习俗给两个儿子取了小名：大儿子叫“铁蛋”，小儿子叫“铜锁”。他们奶奶的意思是有了如此“土”的家乡名字，今后无论在华盛顿、纽约，还是悉尼和伦敦，想忘本都难。

可是——别提了，几年下来，他们的中文一塌糊涂，普通话比我讲得还糟糕，可是英文倒是越来越溜，比那个整天出现语法错误的布什总统都强。我也就只好安慰自己，入乡随俗吧。

在我的记忆中，和已经上到十年级的大儿子铁蛋只有两次严重的冲突。第一次发生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事件经过我都详细记录在《父与子》这篇短文中。当时，铁蛋在学校欺负一名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人家的奶奶过来求我们不要让铁蛋欺负她孙子。我真地火了，对儿子动了粗——我想，儿子应该记住了，这一辈子宁肯被别人欺负，也永远不要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三年前铁蛋已经上了初中时。有一天他回到家，说起中国，满脸不屑，甚

至使用很重的“恶毒攻击”的语言。我大吃一惊，他说的不是中国的某项落后或者不好，而是表现出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鄙视和愤怒。

我很紧张，问他在学校学了什么。原来，他们正在学习一些和人权有关的知识和理念，老师把中国作为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举例了。我后来猜想大概是他们的老师传播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相当负面的东西，加上儿子当时有逆反心理——反对我这个处处强调中国式教育方法的“中国人”。结果，在我多次解说和辩论后，他仍然坚持己见。

要知道，我自己就一直在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也热爱中国，我相信中国可以发展得更好，中国人可以更平等、更自由和活得更有尊严。和儿子那段时间表现的鄙视中国的态度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儿子一直不听我说，说到中国就用极其负面和不公平的词语，最后我终于使出了杀手锏。我吼道：别以为这是澳大利亚，老子就不敢奏你，你到镜子前面去看看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就算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你老子我还是中国人！再敢在我面前说中国人坏话，老子就揍你！

当然后来情况改变了，不知道是儿子懂事了，还是我的“爱国教育”起了作用，铁蛋后来再也不和我讨论中国有关的问题了。

现在电视上突然出现那么多关于西藏、奥运圣火和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我总得有个说法吧——

2）儿子，我们是少数民族！

如果问我对儿子在美国和澳洲小学读书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是他们班上的小朋友的皮肤和头发颜色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人种的。特别是在华盛顿小学里，儿子拿回一张班上同学的合照，我一看就乐了。十几个小朋友，竟然有四五种颜色的皮肤和三四种颜色的头发，像个人种孩子博物馆。最近澳洲的小学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的孩子，说明澳洲也开始在多元文化的路上大步跨进。

第二点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孩子们都是“色盲”。我发现在美国和澳洲的小学里，孩子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肤色。我多次问儿子，你的某某同学是哪里来的？他听不懂。我再问他那个同学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他竟然要想一会才能想起来。要知道他们都是每天在一起玩耍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族群和谐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住在海外的华人最想看到的和谐社会。毕竟，离开中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是少数民族！

虽然目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总数多达两千多万，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华人仍然是少数民族。当我对儿子讲我们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都会把西方一些国家过去排斥华人、歧视和侮辱华人的历史多多少少讲一些。我讲这些当然不是激起仇恨，而是告诉儿子，很多东西都不是想当然的，特别是有些人在灌输白人比黄人优越和更适合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社会制度时，我提醒他们：就在不久前，白人们还在疯狂践踏人权——非白种人的人权。

当然我还想让儿子知道，今天这一切也不是想当然就到来的，它是几代人奋斗争取的结果。

这些前仆后继争人权的人既包括我们这些被歧视的少数民族，也包括那些各种肤色的人一起游行示威的白种人。

在和儿子讲到我们华人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也告诉了他们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也就是西方如何侵略中国的。那时西方人以为自己是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代表，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虽然有些人一直在为西方的侵略行为辩护，说是他们给封闭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文明，但西方的文明却始终没有在中国扎根，倒是在枪炮声中，混乱和屈辱伴随中国达百年之久。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不管是真正落后还是被认为落后的民族，它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轨迹，一些自以为强大和先进的民族如果依仗强权，使用武力来施舍文明和培养一种不伦不类的新文化，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告诉儿子，有人说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我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也许你们在美国出生和生长的这一代很自然地融进了这个所谓的大熔炉，但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也融不进的，再说，我也不想融进去。

澳洲在霍华德执政时，出现了一个种族分子韩森，她是个炸薯条的，组织了一个党，叫“one nation”党（一个国家党），听上去就让人气愤，因为这个 nation 也可以理解为民族。我可不和你同一个民族。韩森最终失败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回去炸薯条了。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不但是指导政治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普世价值，也是指导民族和国际事务的唯一标准。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民族闹独立搞分裂的时候，我们都是使用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去诠释，或者用文明冲突论去解释，结果越弄越复杂。其实，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的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一条规律：所谓民族分裂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和人权、宗教自由、人人平等以及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密切相联的。

以前华人在西方国家受到歧视和排挤，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弱，也不是因为华人天生没有尊严和不重视人权，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强国在内尚未有完全拥抱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当一个社会真正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享受信仰、言论、结社和游行等自由的时候，皮肤的颜色不是问题，宗教信仰不是问题，生活习惯不是问题——

这个时候，就是和谐社会了。也就是说，中国要想最终实现和谐社会这个理想，一定是在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基础上的。

3）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不好意思，让你看到这里，还没有看到我对儿子讲西藏问题。请允许我拉扯一些其他的。这次回澳洲，我首先要祝贺大儿子铁蛋。为啥？因为陆克文当选澳洲总理了。铁蛋不到 18 岁，

虽然没有选举权，但观察总理大选也是他们学校讨论的内容之一。儿子希望陆克文能够取代霍华德出任澳洲总理。

我也希望陆克文当选，原因是看腻了霍华德，他那个长相看上去地道，可实际并不老实。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那个种族分子韩森多有包庇。加上他一直限制移民，害得我好几个朋友多等了好几年才能够移民澳洲。

儿子铁蛋可不管这些，他希望陆克文当选的理由涉及到一段澳洲历史。就是澳洲政府主导的把土著人的孩子从他们父母那里弄走的历史事件。当时澳洲政府认为土著把自己的孩子像牲口一样养，不让他们上学，不培养他们过文明生活，于是决定把他们的孩子强迫带走，送到条件更好、更文明的家庭去抚养。

要说清这段历史，确实不容易。从我自己所见所闻来说，我得私下承认，至今都有很多澳洲土著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不重视，甚至不管不顾，生出来就把他们放在那里，任其发展，有点自生自灭的味道。当时澳洲政府的决定可能也是有些“有识之士”担心这些土著孩子长大后不适应现代文明，无法立足等。而且让人难堪的是，那些被从土著父母手里夺走的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了，比起那些没有被抢走的土著孩子来说，不但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而且也大多事业有成，过得比较富裕。可是——

可是这不能成为一个自以为优秀的种族用如此方式“帮助”另外一个被认为落后民族的理由。历史问题尽管需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但总还是有大原则的。我儿子铁蛋就把握了这个“大原则”，他的大原则是基于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有人把我从你们身边带走，你们说那是对，还是不对？

评判一段历史的标准竟然如此简单，是我们太复杂了，还是有人想故意把它弄得复杂？

霍华德当了十几年澳洲总理，却一直不愿意为“被偷掉的一代”向澳洲土著道歉，他始终认为政府没有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帮助澳洲土著用文明的方式抚养他们的后代——当然，代价是活活分开父母和子女！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霍华德在这次大选中失败，借用何与怀博士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表达，“澳洲一夜变天”——陆克文当选为澳洲总理。陆克文一上任，马上就那段历史向澳洲土著道歉，他真诚地说：对不起。

对不起——只有三个字，但就在那三个字从陆克文嘴里吐出来的一霎那，澳洲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父母们笑了，孩子们也笑了，历史并没有被改变，然而却被拨乱反正和重新书写。没有人否认，如果没有欧洲到来的白人移民，澳洲土著至今还可能生活在沙漠和森林里；没有人否认，白人移民把澳洲这块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强国。然而，绝大多数澳洲人也同时感到，这句迟来的“对不起”却是澳洲族群和解的真正开始，社会也将更加和谐。

我惊讶于"对不起"这三个字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分量和作用。

前不久加拿大政府也向半个世纪前遭遇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华人劳工道了歉，说了"对不起"三个字。其实，随着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观念的继续推广和深入，我们将会听到越来越多的"对不起"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口中说出来。对于一个权力来自于人民手中选票的政权来说，权力的傲慢已经被谦卑的权力所取代。作为一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伴随每一声"对不起"的是华人地位的提高和人权更加有保障，社会更加和谐。

且慢，怎么说到这里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弱势似的？哈——我可是堂堂的中国人，我们有 13 亿人，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可怎么倒成了少数民族？难道我要一直等人家来对我们说"对不起"？难道我们没有对不起过别人，或者其他的民族？或者我们自己的同胞？

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大家还记得我写过一篇《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吧，那篇文章写到后来，我得出了让人沮丧的结论，在缺乏监督和不民主的体制下，就算我阴错阳差地当上省长，不但不会有什么作为，而且绝对会像现在所有的省长一样，沦落成贪污犯和徇私枉法的罪犯。可是，如果换个体制呢？例如用选票的那种体制呢？

我说过，等到那种体制到来到时候，我就周游中国去。不过现在我后悔了，因为我想去当一回主席或者总统——别误会，我只想当一天或者一个小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需要一天，甚至一个小时就够了，我要用这一天或者一个小时说出无数个"对不起"——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对不起！

杨恒均 2008-4-9 悉尼

我们需要家长，但不需要大家长

工信部推出电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引发网友热议，随即卷入世界各大媒体，最后连外交部发言人也加入战团……在被咄咄逼人的 BBC 记者追问中国将强制在新出厂的电脑上安装过滤黄色和“不健康内容”网站的软件，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连续两个反问，其中最后一句“你有孩子吗”，不但让 BBC 记者哑口无言，也触动了我杨恒均最敏感的神经……

这句话触动我，是因为：我有孩子！我的孩子生活在最开放的澳大利亚，而且更巧合的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专门为孩子开发和生产过滤黄色和“不健康内容”软件的最先进国家之一。更有意思的是，我给孩子的电脑也装上了过滤软件！

作为一名家长，我深深知道互联网上的黄色和暴力网站对未成年孩子的影响，一个跳出来的变态的色情图片甚至可以摧毁一个幼小孩子的健康心灵，这就是为什么最早出现色情场所的西方国家，不但有少儿不宜的红灯区，而且在任何一个色情场所的门口都有“18 岁以下禁入”的告示。可是互联网出现后，这一“儿童不宜”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被淹没了。现在，只要有部电脑，只要会上网，只要家长不在旁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只要会打“色情”两个字，他就能够看到你玩到 80 岁也玩不尽的色情花样！

所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触动了我，所以，我支持有这样的软件问世，所以，我给自己孩子的电脑上安装了这样的软件……然而，这却不是发言人的问题触动我最深的地方——

感谢外交部发言人，说出这么不“外交辞令”的话，说出这么有人性的话，然而，却正因为他这句话，本来不想对“绿坝”软件发表任何评论的我，觉得不能不站出来大喊一声：同样因为我们都有孩子，所以，我反对任何由大家长安装的过滤软件——就目前已经披露的“绿坝”的有关资料，我——一个急切想保护孩子的父亲，还有更多孩子的家长，要说一句：我们应该反对这样的“绿坝”!

没错，我在澳洲孩子的电脑上装了过滤色情和暴力的软件，而且这种软件绝大多数是免费的，是由政府和一些福利机构资助开发和生产。然而，请大家搞清楚我支持和反对这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这个软件不是由任何权威机构下令装配到我孩子的电脑上的，更不是政府和某个公司独家经营，由政府及其支持和信赖的某独家公司找出色情和“不健康内容”而加以屏蔽的……

这就是区别！任何西方政府，不管他拿出多少资金资助这类软件开发，他不但没有权力强迫用户使用，事先安装在出售的电脑上，而且，连寻找色情内容的屏蔽词都由各家公司自行决定——因此屏蔽程度和功能也就不同，质量也有差别——而选择何家公司的过滤软件，是否需要使用这样的软件，这个权力完全掌握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孩子、也最想保护孩子的家长们手里！

可是，如果根据目前我们得到的资料看，即将肩负起“保护我们的孩子”的任务责无旁贷、毫无选择地被另外一个“家长”承担起来了——那就是“大家长”!

我在网络上稍微做了点调查，查看了一些网站做的民意调查，我发现无论支持或者反对“绿坝”的，似乎都没有看到点子上。支持的家长们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应该支持，却忘记了，资助开发这种软件是政府的责任，可选择安装何种软件，以及把何种内容屏蔽掉，却应该是家长们的责任，也应该由他们来选择，而政府没有在他们电脑上安装过滤软件前，他们其实一直在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反对安装这一软件的，则给人一个印象，他

们连政府出钱开发旨在保护孩子（而不是成年人）的软件也全盘否定了。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类软件是否被政府垄断？开发后，到底谁决定装，谁决定不装？过滤什么样的内容？是否电脑到达用户手里前必须安装？……到底是由家长决定，还是由“大家长”决定——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类整个文明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集中回答的一个问题。

而外交部发言人和工信部提到的所有那些开发和安装了这类软件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澳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孩子的电脑是否装上过滤软件，装上哪家公司的过滤软件，必须由家长决定，而不是由扮演大家长和“老大哥”的政府来决定，更不能由他们垄断到“只此一家”!

我告诉你，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或者美国政府在我购买的电脑上事先安装哪怕是我现在为我儿子安装的这款过滤软件，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就算我忍气吞声，那么，澳洲和美国公民绝对会上街游行，反对老大哥的“监控”，反对“大家长制”的“压迫”。

也许有人说了，你不是说你也会安装相同的软件吗？为什么政府就不能为你孩子做这件事？你能做，政府就不能做？政府做不是更加有效果？很简单，我安装是有选择的，在很多屏蔽色情和不健康网站的软件中，我们家长比较后选择适合的或者自己喜欢的。如果有某一家公司把我认为非常健康的内容也屏蔽了，或者有哪一家公司为了奥巴马的利益而屏蔽了有关美国反对党（现在是共和党）的消息，那么我会立即宣布不使用他们的软件，那么他们会得不到政府的资助，那么他们会倒闭！而这家公司如果正好是奥巴马政府的，而且只此一家，那么他奥巴马总统将要因违反美国《宪法》而不得不下台！

可是，如果由当今某个政府（例如美国和澳洲）的某个部门垄断了，找了独家开发商发展，而且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是健康和不健康的——结果家长们没有了选择，大家长的决定就是成千上万个家长们唯一的选择。那么，他们很可能（注意，我使用的是“很可能”）把一些对国家和民族非常有利，对我们孩子的前途非常有利的消息也过滤了、屏蔽了，从而让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愚民，一个顺民，一个“做稳了奴隶或者正在争取做个奴隶”的人，而不是我们希望他们成长的那样——一个健健康康的公民！

也许有人又说了，扯，你只是说政府“有可能”，这就是说，政府也许不会屏蔽那些真正健康的东西……请你不要说下去了，让我告诉你世界历史和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一个好的社会，一个有前途的民族最应该做的是防止政府成为监视我们的老大哥，阻止政府成为控制人民思想的“大家长”！这是常识，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显示：色情从来没有折腾我们的人民，但政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老百姓！色情更没有摧毁过我们的孩子，可是独断专横却又不让人民批评的政府却一直在……（此处，老杨同志自动过滤掉一行“不健康的内容”）

如果你认为我在小题大做，如果你认为我在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是纯理论而在现实中不适用，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一句“你有没有孩子”让我感触如此之深——

因为这一句问话，不但直刺我们心坎，而且他简直是在重复我们在过去几年反复呐喊过多少遍的同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孩子……

还记得黑窑洞的奴隶孩子吗？当时有多少家长一边和我一起流泪，一边痛斥那些败类：你他妈的有孩子吗？

还记得珠三角的童工吗？你告诉我，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问题？啊，那幸亏不是我的孩子，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孩子那样……

还有地震废墟下的孩子……如果看到这一句你就想删除我的文章，我倒要问你：如果废墟下是你的孩子呢？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也许你的记忆模糊了，那么，你不会忘记毒奶粉吧？你有孩子吗？

他从来不喝牛奶？难道他是喝狼奶长大的？

还有，当你看到习水的人民公仆集体嫖宿幼女的时候，你难道不想质问这些很可能成为要为我们孩子过滤色情内容的官员们一声：你有孩子吗？

而就在不久前，在巴东弱女子邓玉娇被三个男人调戏的时候，我站出来为她辩护，感情冲动地宣判她的行为是正当防卫，结果有人很理智地对我说，你太不理智了。这个时候，我也只是弱弱地问了他们一句：你，有孩子吗？

……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一句问话挑动了我多少思绪？在过去两年里，我的文章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这样的问句：你有孩子吗？而我当时的心情和我们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质问 BBC 记者的心情一定是一样的。我们又多少次想大声疾呼：我们都有孩子，让我们一起，用生命的代价，保护他们，好嘛？

可是，我们却恰恰发现，在上面所有原本需要我们家长保护那些孩子们的事件中，都有一种势力出现，力量远远超过了家长，每当在孩子们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们，在过滤信息；他们，在屏蔽真相；他们，不是在保护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在保护一些邪恶的势力；他们，是在保护那些连孩子们都不放过的利益集团……

如果你有孩子，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是的，作为家长，你有责任保证你的孩子不被网络上的色情毒害，但同样作为家长，我们却更要保护孩子不受到更加广和深的邪恶的侵害！

如果一个家长不能管理好自己的电脑而无意中让色情侵染了孩子，他只是损害了自己的孩子；可如果一个大家长控制了更广泛的信息，一旦行差踏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多少时间是不行差踏错的——那么，受到伤害的不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甚至不是一群孩子，而是所有的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民族！

请你记住一个常识：由于电脑没有管理好，或者某个过滤软件有了漏洞，让孩子们受到色情图片的侵蚀，那只是一件普通的违反刑法的罪责；而一旦由某个“独家公司”借过滤色情内容而屏蔽了对他们的“健康”不利的信息，对利益集团胡作非为不利的消息，那么，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则是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谢谢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不那么外交辞令却充满感性的质问，我想现在，我们都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孩子！

所以，我们要肩负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希望政府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拿一大笔纳税人的钱，资助那些有能力开发这类软件的公司竞争开发和生产各种过滤软件，供家长们自由选择。

而同样作为一名家长，我们不但要反对别人来充当我们孩子的“家长”，更要反对那些把中国所有的家长都当成“孩子”来管理和监控的大家长、老大哥……

我们需要的是家长，我们绝对不需要大家长！

杨恒均 2009-6-10 广州 ！

钱学森的最后提问

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 30 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产党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党，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 1955 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温家宝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 6 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温家宝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刚刚过去的 9 月 4 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 35 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

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温家宝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温家宝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温家宝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

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 年 6 月 16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 160 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 N 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

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 1949 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 FBI 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国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 11 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 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权，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 9 月 4 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

他做了出来。

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谐？

杨恒均 2009-11-1

美国家长为啥不愿意让总统教育自己的孩子？

当今世界上最有演讲才能的无疑是奥巴马。没有人否认是他的那张嘴巴把他带进了白宫，但大家也清楚，要想在白宫继续赢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光靠一张嘴巴显然力有不逮。不过，奥巴马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所以，在最近推广医改、教育等多项政策不顺的情况下，他要趁开学的那一天，再一次鼓动如簧之舌，向全国公立学校中小学生发表电视演讲。

可没有想到，消息刚刚发出，离开演讲的 9 月 8 日还有好几天，白宫就受到了“猛烈攻击”，最先攻击奥巴马的自然是在野的共和党，尤其是保守势力，他们抨击奥巴马借演讲机会向孩子们灌输政治理念，推销自己的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对共和党的话打一个问号，或者直接打一个折扣，在这种民主制国家，所谓反对党，就是专门反对执政党，对执政党吹毛求疵甚至鸡蛋里挑骨头的。所以，奥巴马的白宫并没有回应来自共和党里保守派的攻击。然而，他却不能不重视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公立学校学生们家长的批评。这种批评一波高过一波，致使很多公立学校感到吃不消了，因为无数家长们反对奥巴马对他们的孩子演讲的电话把学校的电话都打爆了。

我的天啊，美国人怎么了？奥巴马不是他们的总统吗？公立学校不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吗？仅仅在一年前，难道不是这群家长们——不分黑人和白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奥巴马的演讲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还记得去年就职典礼那天——华盛顿最寒冷的一天——美国人几乎都停止了活动，好像冻僵了似的，一动不动，站在各处如痴如醉地倾听奥巴马的就职演说……现在，

同样是这些美国人，听到他要在电视上对学生们演讲，竟然激动地跳了起来，举起双手来——反对。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民众对澳巴拿马演讲的态度怎么会判若云泥？是奥巴马改变了，还是美国民众变卦了？其实，改变的只有奥巴马的地位——他从普通民众变成了美国总统，永远不变的是美国人对国家拥抱的价值观的追求，以及对政府的看法。

奥巴马参选总统是政治，他是一名政客，只要他按照游戏规则，他可以宣传鼓动，号召选民投他一票。于是他尽量表演，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在自己用尽了华丽词藻和排列句的演讲中，他始终围绕“自由、民主、集会、平等、宽容”等核心价值观，加上他的一张黑皮肤脸蛋，本身就是美国价值观取得胜利的见证，于是民众推他为总统。

现在，这位卑微的黑小伙子奥巴马已经贵为总统了，当初那些把他选进白宫的美国人却不愿意他去学校对他们的孩子演讲？是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美国，“政教”分离除了“政治”和“宗教”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教育”的分离。民众选出的总统只不过是管理政府，为美国和民众服务的。他们不但没有“教育”民众（包括他们的孩子）的权利，反而使常常受到民众“教育”甚至教训的。

学生们无论在私人学校还是公立学校，接受的价值观教育来自于这个国家拥抱的核心价值观（集中的反映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里）。如果说当初美国人喜欢黑人小伙子的话，那是因为他紧紧拥抱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但当他获得了最大权力的时候，美国人拥抱的价值观同时提醒了他们：当上总统的奥巴马不但不能代表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在这个国家，最有能力破坏核心价值观，与民众作对的，正是在这个位置上的最高权力者！

美国的历史也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展示，没有一个总统在进入白宫前不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在进入白宫前，不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忠实拥护者，但在过去两百年里，对《宪法》破坏最多，时常挑战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正是来自国家政权，来自白宫的主人——从冷战时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到尼克松破坏宪法，再到克林顿在办公室玩弄实习生并当众撒谎，还有布什政府的“黑监狱”……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总统也肩负起教育全国民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的“神圣使命”，如果美国总统有权力制定美国人的道德标准，动不动就号召人家学习这个学习那个的话，那么现在的美国人一定搞不清随便抓捕异议人士是否正确，到反对党的总部安装窃听器是否非法，以及体罚和折磨战俘的美国士兵是否应该成为全美国人学习的“爱国标兵”……

一个一度被视为“世界的总统”的美国总统要对公立学校的学生讲几句话，竟然受到家长的反对。这件事对于中国大陆民众来说，可能有点天方夜谭。但是，美国人的过虑并不是在杞人忧天。美国不会有人反对奥巴马在学生开学的时候对学生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家长们显然也会欢迎总统现身说法，向孩子们弘扬美国的价值观。可是，如果给奥巴马这个机会，谁能保证他在演讲中不会搞道德说教？不会用自己的政治理念影响政治上还不成熟的孩子们？不会转弯抹角地对自己政府的政策歌功颂德一番？

是的，除了这个国家民众集体认同的那些核心价值观之外，任何当权者不能把自己的政治理念灌输给孩子；任何“德高望重”的人不能拿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所有的人；任何政府不能

把自己的政策当成国家永久的方向！政府可以更换，最高统治者最多干八年（四年一任，可以连任），而不变的是国家、民众，还有他们拥抱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一名中国人，可能没有人比我们更深地体会到这一点了。在政策千变万化的年头，从小学到中学的我，几乎每半年都要举着不同的标语，呼喊不同的口号，一次又一次否定不久才被灌输进大脑的价值观，假装接受注定不久后又要被否定的价值观：一会是打倒刘少奇，一会是打倒“四人帮”，一会要火烧孔家店，一会要弘扬古文化……不同的人上台，都想把我们像橡皮一样，揉捏成符合他们“价值观”的顺民，结果——他们说教的越多，我们失去的越多，到现在，有多少中国人说得出他们拥抱什么样的价值观？有几个中国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面对自己的灵魂？

截止此文发表，白宫顶不住压力，已经声明奥巴马对公立中小学的演讲属于有选择性的（注意，他演讲的对象本来就不包括私立学校），爱听不听，由各学校自己决定。我想，奥巴马如果不取消这次演讲的话，那么，他至少得修改自己的演讲稿。他和他的政府应该清楚，他的这次演讲已经不再是去“教育”美国学生们，而更像是美国总统在学生和家长面前经受一次“考试”!

杨恒均　2009-9-6

网络力量篇 君要臣死，臣 Facebook

有人民没民意

1998 年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来自日本防卫厅情报部的军官提呈了他研究中、日、美的形势分析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以确凿的材料（特别是数据）展示了日、美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当权者及民间对台海局势的态度与意见。每讲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时候，他都能用调研数据列明那个政府（以及国会）对台海事件的态度和政策，同时公布比较详细的民意调查数据来说明民间的意向。
可是在他的文章讨论到中国大陆时，只是用大篇幅写了中国政府的态度，甚至津津乐道地把中国政府高层的强硬派和温和派拿出来作比较，却始终没有论述中国民众的意见。
一位与会的美国专家打断这位日本研究员问道，你在分析日本、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时候，都分析了当地的民意，只是在讨论中国大陆形势时，你却只字不提民意，难道中国大陆只有政府没有人民吗？
这位日本防务厅的研究人员一开始有些尴尬，但随后傲慢地辩解道，中国大陆当然有人民，也有民意，但我不认为我们现阶段有什么可靠的办法弄清那里的民意。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无法在中国大陆从事调　　研活动，而那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政府的喉舌，媒体反映的民意基本也是政府的意思。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认为在严肃的论文里列出这种所谓的“民意”，不实际、不科学、禁不起推敲。
与会者听了这个回答，有的耸耸肩，有的叹口气，有的做一个鬼脸，作为当时唯一在场的中

国大陆人，我本能地想反驳他，却不知从何下手，憋了一肚子的委屈，还有屈辱。
十年后的 2008 年，当我再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特意收集了上百份华盛顿几大智库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报告。我惊讶地发现，在所有西方（包括日本）研究中国的报告中，中国大陆的民众意见和看法已经占据了主要位置，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民意终将左右政府的施政方略，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民意终将决定国家的未来。
十年时间，发生了什么？是的，在这种多少年都不会有变化的八股文式的研究论文中出现了一个十年前还没有、现在却必不可少的新词语——互联网。
互联网！不但成为西方学者窥视中国民意的唯一可信的窗口，也是中国民众表达意见、实行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参政议政的最切实可行的平台。而且不可忽视的是，互联网也逐渐成为中国高层有识之士越过尾大不掉的机构直接了解民意、与民众沟通的最有效的平台。互联网提供的虽然是虚拟的空间，却让中国民众第一次能够实实在在地“触摸”到言论自由、以民为本和参政议政这些普世价值中最核心的内容。
如果说网络民意等于民意，估计很多人感情上都受不了。专家也说了，就算上网的三亿人都积极参政议政，也是十三亿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呀，更何况上网的人大多是玩游戏、看新闻、收发邮件！更何况，农民绝大多数不上网。所以，真正从网络上看到的民意只不过是一些精英们的民意而已。
这话说得有道理，然而，却是跳入了一个陷阱。因为按照这话背后的逻辑，十三亿人能够发言的平台才能代表民意，那么就如我们说起民主的时候所说，只有每人一张选票才是真正民主一样。
可问题是，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美国这种走在民意自由表达最前列的国家什么时候才有真正民意的？大家知道美国在二百三十年前立国的时候，所有的少数民族和妇女没有投票权，大多数的穷人也根本没有条件投票，更不用说利用当时只有少数富翁才拥有的媒体表达“民意”了。正是因为当时的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美国设置选举制度时才选用了不是靠每人一张选票的大选举团的投票制（也最终造成了选票少的布什当选总统，获得多数选票的戈尔反而落选）。
无论是民主还是民意表达，从希腊的民意到美国民意，大家难道没有看到民意表达的渐进曲线？从希腊广场上的几千人，到美国建国时的少数精英和有产者，再到几十年前的多数，几乎走了几千年。
即便几千年后的今天，美国依旧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有时甚至超过了大多数）根本不去使用自己的“民意”，而且在很多时候有相当一部分（好在没有到公民的一半）美国民众连手中的民主“选票”都不去使用。但我们谁都不会去指责他们的民意没有表达出来。
有人会说，那是以前，现在不同了，要说民意，我们就要从十三亿人开始，要说民主，我们就要人手一张选票，否则就是歧视，就是精英政治。但你得知道，如果不一步步开始，不从一亿人开始，不从三亿人开始，就永远到不了十三亿人。
互联网虽然只是一个平台，但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互联网并不只是精英的互联网，在大部分农村，只要你愿意安装，并不比有线电视和电视机贵，而且，在乡村一级，基本上都有网吧了。如果你真想利用互联网看到人家不让你看的新闻和信息，想表达你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民意”，没有人可以阻挡你的，即便你不认识字，你也可以让你玩游戏的孙子代你发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愿意利用互联网的精英正好是被自然选出的精英。或者说，是因为你使用了互联网才成为互联网精英，并不是因为你是精英才使用互联网，很多社会中的精英根本就不上网。
举个例子，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每天上网玩游戏，对论坛讨论国家前途的事不关心，认为写博客是多此一举。有人因此得出结论，你看这大批网络年轻人，他们都不关心国家大事，怎么能说互联网代表民意，难道他们不是民众？难道只有你们这些愿意在网络上发言的人才代表民意？

对，但也不对。民意当然是愿意表达才能叫民意，那些有一定条件而不愿意表达的人用他们的沉默表达了他们的“民意”——不关心自己的“民意”，认为自己的声音不重要。这种情况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比比皆是，有些人根本不去投票。
所以，并不是跟着你喊“民主、自由”才叫民意，人家什么也不说，安于现状也是一种“民意”。对于那些玩游戏的孩子来说，等到他们父母不供养他们了，等到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饭吃了，等到他们不表达自己的“民意”别人就欺负他们，把他们当屁民的时候，你说他们会不会利用自己面前的互联网表达“民意”？如果还不想利用，或者认为互联网没有用，那么就说明他们很享受被欺负，很喜欢当屁民，难道这不也是一种民意？即便民主真实现了，如果大多数人愿意当愚民，难道你就说那不是民主吗？
且不说有互联网你却不好好利用，就算没有任何平台，你不去争取自由会“带着微笑来到你身边”吗？换一句话说，你不去争取自由，那你也不配享用自由。你不去争取民主，民主也不会死皮赖脸地缠着你不放。
而且，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即便在美国民主制度确立后，在立国的时候言论自由就被无限推崇的美国，过去两百年，民众为言论自由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甚至付出流血的代价！你说那种连走两步路到网吧，或者少吃几顿饭装一个宽带都不愿意，发一个帖子就怕得要命的人，你真把言论自由硬塞给他们，天下不大乱，那才怪呢！
很多人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等到那一天？三十年还是五十年？我等得到吗？如果等不到，那又有什么意思？
当我收到太多这样的问题时，我心里也渐渐郁闷和烦躁起来。但我无法接受有些人仿佛只为那一天而活着，把那一天看得无比重要，仿佛那一天不到来，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但我知道，如果你只抱着等那一天到来的心态，而且认为那一天比现在的每一天都重要的话；如果不调整心态，眼前只看到差距，看到鸿沟，看到那一天的遥遥无期，而不愿意在现有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艰难跋涉的话；如果只等着某个人出现，等到某个人在讲话中让你兴奋得跳起来，等着某种东西自动消失的话。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一天永远不会自动到来，就算它被别人带到你的身边，你还是没有准备好。于是那一天也就和以前的每一天一样，至少对你来讲，没多少意义。
你得自己走过去，别等着那一天走过来。
原文《我们还能在互联网上走多远（上）》 ，有删节 2009.03.05 北京

自由言论不等于言论混乱

如果说当今的言论自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言论自由，那么西方人用了多少年才走到今天？例如美国，在内战时，南北双方都曾要处死记者，因为他们的言论自由危害了“国家安全”；越战的时候也出现了五角大楼文件的案子，言论自由的先锋报纸被起诉……那时的美国算是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吗？如果不算，那么，美国的言论自由从建国开始，一直在以其客观和主观的条件限制了一部分人的话语权，例如白人和黑人奴隶、无钱无势无土地的白人等，这样的发展轨迹是本应该避免的弯路，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是应该避免的弯路，那么为什么所有言论自由的发达国家，历史上几乎都走过类似的漫长“弯路”？
如果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那完全绕开这种具备合理性的“弯路”，是不是会造成一些混乱？有了一定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最近几十年，都有或多或少绕过了西方走过的漫长弯路而一蹴而就地踏上民主和言论自由之路的经历。可是，我们难道没有

看出来，他们确实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当然这些代价比起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主要小得多，但如果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降低这些代价呢？

如果没有互联网，我这些话只是多此一举，不但毫无实际意义，还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当做抵制言论自由和民主的挡箭牌。

有了互联网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不像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一样有点浮躁，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看一下过去十年互联网在推进中国言论自由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网民在互联网上用了十年的时间，差不多走过了西方国家在现实中走过的上百年历程。从上网的人数——从当时的几万精英到现在的三个亿，到互联网上讨论的议题的逐渐深入，直到涉及对政府的监督和参政议政，这过程和西方经历过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程惊人的相似。其实没有必要吃惊，也许有人会立即指出中西之间某些制度上的本质的区别，但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言论自由的本质只有一个，一旦言论自由了，最终的目标也只能是一个。

从十年前互联网起步发展到今天，互联网的特性正好让一部分对言论自由感到非常陌生和麻木的人被自然隔离，让因为自身自愿或者被迫变得愚昧的人退避三舍，让一部分哪怕你真给他言论自由他也绝对不会使用或者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人敬而远之。这在客观上，让那些愿意追求言论自由，也认为自己适合民主，认为言论自由可以让中国进步的人成为互联网上言论自由的先锋队，也就是在有些人口中变成贬义词的“网络精英”。

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这种把一部分不适合言论自由的人隔离起来的事，当今文明的社会是没有任何人和政府会去做的。如果你现在实行言论自由，却还去限制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理由是他们素质低或者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自由的言论，本身就是严重违反了言论自由和人类的基本政治道德。

可是在人类言论自由的历史上，这种有限制的言论自由却发生在几乎每一个先进国家里，历史学家们给这种情况找的借口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包括科技落后、交通和通信不发达等。可正是这种情况，把后发民主国家置放在非常矛盾的位置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包括民众的素质，确实和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上百年前的水平不相上下。可当今文明社会，无论你多么落后，又有哪一个国家敢于像西方百年前或者几十年前那样开始实行民主、推广有限制的言论自由？

然而，我们看到，互联网的特性却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没有任何人有异议，因为这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互联网的特性使然。

其次，比起现实世界，互联网有便于控制的特性。实际上，即便在互联网上，我也多次听到一些所谓的“有识之士”大喊言论自由“太过分”、“失控了”、“低俗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去研究一下，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所谓言论自由失控的现象，更不用说纳粹德国等极端的例子。

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过激的言论，也都是西方国家在现实中经历过的。只是，由于有了互联网，我们的言论自由虽然有时显得不那么靠谱，显得不太“真实”，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没有那么严重。这对于当权者，无疑更加容易接受。

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可控性还反映在互联网本身就是由每一个分散的网民的自由言论组成的。虽然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语叫“广场政治”，而且在互联网上常常出现“广场政治”的现象，但毕竟，互联网从来都没有促成一个现实中的让一些人紧张的“广场”产生。网民都是各自为政，散布在每一台电脑后面，睡眼惺忪，或者反映在高度近视眼镜，牙也不刷，臭屁哄哄，又或者在发表冠冕堂皇的言论时，像我现在一样，穿着一块小小的遮羞布似的三角短裤。

和很多关心中国的美国朋友聊天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也搞不懂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的尺度要远远大于现实社会中的平面媒体。我当然同意一些朋友所说，互联网是一个高科技，很不容易管理。但如果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那你显然对我们强大的国家了

解不够。所以，我宁肯相信这也是高层的一种新思路，而这种新思路也是在考虑到上面三个（或许还有更多）原因后推出的。
而在这种新思路的鼓励下，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监督了政府，部分地震慑了贪污腐败，给民众一个宣泄的渠道，有利于现实社会的和谐；民众参政议政，对国家有了更强的向心力，从而也给政府更多的信心。互联网成为高层了解民意的一个窗口，这是一种良性互动。
回头看看，短短的十年，我们已经在互联网上走了很远，甚至已经把现实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面。当初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它会改变世界，不过过了几年后，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很多人就失望了。
当时比尔 •盖茨说过一句话：人们对于新出现的高科技，往往过高估计它在短期内的作用，却又总是过低估计它在较长时间里的重要性。互联网就是这样的高科技。
很可能有人会站出来说，你说的都是虚拟的互联网，这和我们现实社会有什么关系？就算你在虚拟的世界里走得再快，又关我们什么事？
那也许是虚拟的互联网，那些网友大部分是穿上马甲的“虚拟人”，或者是隐名埋姓的无名英雄。可是，离开电脑屏幕，他们毕竟也是这个现实社会里真实的人，而且他们彻底打破了现实社会里精英划分的标准，在虚拟的世界里为我们重新确定了精英的概念：只要你愿意，你就是随时可以发言的精英！
最重要的是，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没有人会否认，网民们在互联网上一路走来，已经走进了贪官污吏的内心世界，跟随公费旅游的官员走到世界各地，还走到监狱去调查躲猫猫事件，走进了两会的会场，现在甚至走进了温家宝总理的会客室。我想，这些都不是那么虚拟的，对不对？
所以我说，虚拟的互联网对于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我们能够走多远，而在于当我们在这里提高了自己的民主素养，练习了我们的自由言论，学会关心国家和自己，维护国家和自己，接受了更多的真理，获得了更多的认同，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后，我们随时能够轻轻关上电脑，离开虚拟的空间，回到真实的世界！
原文《我们还能在互联网上走多远（下）》 ，有删节
2009.03.05 北京

把互联网变成儿童乐园？

今天看了“妈妈评审团”召开第一次评审会议的新闻，加上这段时间一直有朋友希望我就此说两句，我就简单说几点。

1）无论是扫黄还是反低俗，都不应该以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的方式展开，也不应该搞成一场信息和精神领域的“严打”。有法时要严格依法办事，没法可依时要赶快督促人大立法，绝不应该把“低俗”的内容交给各地甚至电信公司来任意发挥，这是违反《宪法》的。鉴于这种法律常识，我们可以问“妈妈评审团”两个问题：第一，谁授权给你们来“评审”互联网内容的？第二，你认为自己未成年孩子不能看的内容就应该删除？网站就应该关闭？难道全中国人民都不能看？哪怕那内容是《宪法》保障我们看、《刑法》不禁止我们看的内容？

2）打着“妈妈”的神圣名义，打着“为了孩子”的更加神圣的旗号……“妈妈评审团”的创始人说“儿童利益优先”，要把妈妈们组织起来，删除掉低俗和不健康的内容，他说自己很有成就感。还有的在会上说，要让互联网适合儿童，把互联网变成“护联网”……我的孔

子啊（就是说“食色性也”的国宝），这些人犯了一个如此“低俗”的错误：互联网不是儿童乐园，也不是幼儿园啊！

3）如果真要“儿童利益优先”，那么你们家的儿童年岁也不一样吧，儿童包括从 0 岁到 18 岁，只要从中间 9 岁的算起，哪怕是用西方最开放国家的标准，中国所有的新闻网站，包括人民网都必须关闭，因为中国任何一家网站（除了专门为 9 岁以下孩子设立的儿童网站）上都会有对于 9 岁的孩子无法解释清楚的“低俗”内容（例如犯罪新闻和社会新闻中的成人词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看到不适合你家“儿童”的内容就删，那么，一本新华大辞典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汉字涉及“低俗”内容，是不是都应该删除掉？

4）让我们进一步发挥所谓“孩子利益优先”的原则，既然你们用这个原则来治理整顿虚拟的互联网，那么我有理由质问你们：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对付更多孩子们生活其中的真实社会？请妈妈们到新华书店看一下，那所有的书籍，有几本适合十岁的孩子阅读？再到街道上看看广告，是不是应该拆掉所有无法向六岁孩子解释清楚的图片？再请你去看看电影和影像制品，你会带你十岁的孩子看有杀人和强奸内容的电影吗？还有在全国各地合法开设的成人用品商店？你是不是也要以母亲的名义删除我们现实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也想把现实社会变成一个只适合你儿子和女儿的幼儿园？

5）“妈妈评审团”的妈妈们要记住，管住自己的孩子该上什么网站，不该上什么网站，以及多大年纪才能独自上网，这才是做母亲的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你可以限制自己的孩子上互联网，但你不能以“儿童利益优先”的名义把互联网变成一个只适合你孩子的学习园地和迪斯尼乐园，那是违反《宪法》也违反人性的。而且，别忘记了，你们的孩子也会长大的，到时他们也许仍然会生活在一个打着“妈妈”神圣称号的人在继续管理着他们的成人世界，就像那位“老大哥”一样一直盯住我们，把我们都当成了“祖国母亲”庇护下的儿童……当我们把互联网和社会 变成只适合儿童的时候，儿童不但不会成长，而且，我们成人也会变成“儿童”……

最后，我想请妈妈们记住一个道理：今天你以“妈妈”和“孩子”的名义损害《宪法》，违背法律，随心所欲界定“低俗”内容，损害他人表达权和知情权，明天会有更多的“母亲”（包括“祖国母亲”）打着各种保护你和孩子的招牌而损害你们的权利和利益。这个道理很多中国父母都明白，所以当他们积攒了一点钱之后，宁愿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到“色情成灾”的外国读书……

我想，作为“妈妈评审团”的妈妈们，作为任何一个不想自己的孩子受到色情和暴力侵害的父母，其实有很多事情可做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依照《宪法》和《法律》督促政府加强网站管理，尽快制定详细的界定“色情”和“低俗”的标准（法律不允许有模糊得以某个母亲或者某群包着二奶的道德领袖的意志来界定的“低俗”内容）。如果有可能，尽快实行国际通用的法则，实行包括电影、网络在内的成人分级管理制度，并制定专门保护未成年人免于色情和暴力侵害的法律……

请别再以妈妈的名义干那些事了，而且，作为要保护孩子的妈妈们，你们整天去接触那些你们认为不但小孩不该看，就连我们这些成年人也不能看的低俗内容，你们看过几次之后，难道没有受到污染？难道你们就有了抵抗力？竟然评审那么多低俗网站后依然保持那么高的道德水平继续为我们“评审”、“过滤”有害的内容？

你们如何向自己的孩子交代正在干的事？“儿子，为了不让你看到不该看的，妈妈每天去找不该看的东西来评审”……说实话，你们既然那么纯洁，请别每天以“评审”的名义把自己赤裸裸暴露在色情和低俗的东西面前，我都于心不忍了，请把这些低俗的东西留给专业的警察叔叔，或者我们这些有法律博士和硕士头衔的专业人士，好不好？妈妈……你还是和你自己的儿子与女儿一起，做一个妈妈该做的事……

杨恒均 2010/1/23

中国的“网民外交”

有读者给我写信，希望我多谈点国际关系。本来这是我的老本行，但却有些为难。我这些年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满脑子都是民主、自由和法治，而研究外交与国际关系时牵扯更多的是国家利益与安全，这两者与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适价值理念之关系不但复杂，而且纠结得一塌糊涂。

即便那些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国家，有时他们短期的国家利益也会违反民主自由的原则，甚至不时在国际上搞出为了“国家安全”而忽视普世价值的事。就拿美国来说，美国人在国内追求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普世理念一直毫不含糊，但在国际上，却常常违背自己在国内推崇的那些价值理念，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来看，无法否认的是，指导国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大原则迟早会走向统一，统一在国际人权公约与普世价值理念之下，可这个路还有较长一段要走，且并不平坦。在这之前，“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还会像两个幽灵一样，经常会冲击一下国际关系里的普世价值理念。

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与国际地位迅速崛起的关键时刻，处理中外关系与国际问题时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普适价值理念，显得尤其重要。有时，国内对如何处理指导外交之间的这些原则的争论，甚至超过了国际问题本身激起的风波。更加“添乱”的是，中国的外交碰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中国“网民外交”的兴起。

在中国，“外交无小事”成为金科玉律，所谓“无小事”其实是用来糊弄老百姓的，回头看一下，“外交大事”几乎都是最高领导人趟在床上和藤椅上决定的，而老百姓呢，今天让你打倒美帝国主义，你连美帝国主义在哪里都搞不清，就得去高呼口号；明天的社论让你去反对苏修，你也会立即表现出像对待那些扒你祖坟的人一样痛心疾首……可是，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尤其在很多国内问题不能讨论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牵涉中外关系的国际事件，几乎都能够在网络上成为热点，而这些“热点”就形成了我所说的“网络民意外交”。“无小事”的外交，也自然成了“小民”们关注的对象。

也难怪现在的西方智库对中国的“网民外交”重视异常，他们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的：第一，他们发现“网络外交”对中国外交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认真研究涉及中外关系的网络民意，可以帮助他们推测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第二，网络上有一些非自发的网络“民意” ，或

者说是政府引导下的“自发民意”，正好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意思。研究这种“网络民意”，就等于是直接研究中国政府的意向。无论如何，研究自发与“非自发”的“网络民意”，相辅相成，形成了西方智库对中国“网络外交”的系统研究。

自从有了互联网，西方研究中国外交的专家学者几乎像找到了“富矿”似的。要知道，在这之前，他们要揣摩中国外交，除了情报机关花高价收买某些已经移民到西方的决策者与外交官的配偶子女之外，就是盯住外交部发言人，或者那些中国政府资助的专家学者们，研究后者时还得了解一下他们是否和中国官方某个大人物有“关系”。不过，说到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网络民意”，我也有担忧之处。这两天就最近几件国际事件浏览了一下互联网上的“民意”，感到不但普通网友，就是专家学者与理想追求者们，也常常迷失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普适价值理念”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中。

网络上最有代表性的“网民外交”呈现这样两个趋势：一是以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流的专家学者们为代表，他们在外交关系研究中几乎完全摈弃了普适的价值理念，一切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从，弄得自己鼠目寸光，完全搞不清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与总体利益也一定要得力于他所持有的价值理念，并受这种理念支配。

这些主流学者的研究颇能得到一些网民的喝彩，尤其是当他们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逐渐确立的普适价值理念故意对立起来，逢“普适价值”必反，逢美国必反，逢西方必反，甚至快要弄到“逢世界必反”的时候。谢天谢地，好在我们这些年的外交决策者并没有完全跟随他们走。

我举个安理会制裁伊朗的例子。当中国投了赞成票的时候，有些专家竟然认为这是中国向美国卖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凡是美国支持的我们就应该反对。说实话，从近期国家利益来看，投票制裁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供应绝对有影响。但如果中国在更大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核子武器的扩散上妥协退让，最大的受害者绝对不是美国，而是过去多少年来，一直靠拥有核子武器而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再说，核子武器不扩散早就是国际社会（在五大核武国家的威逼利诱下）达成的一项共识，不能为了一点点石油进口破坏这共识，也不能为了“逢美必反”而破坏这一价值理念，自绝于国际社会。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少数同我一样在国内竭力推崇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理念的朋友（有些是自由主义学者），他们刚好走向另外一个方面：过分强调国际关系中普世价值理念，而把“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完全从属于国际关系中的这些原则。从理论上或者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他们是无懈可击的。但大家不应该忘记，这些普世价值理念，在西方国家同世界交往中都没有能够完全实行，中国一个贫穷国家，又如何能够一步到位？结果甚至出现了一些要欢迎外国人来统治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言辞，这些东西，你同任何一个非种族主义的西方人说，他们都会摇头的。

谈到外交事件，说到外交事件中折射出的国家利益与价值理念，往往比国内问题更需要平衡与妥协，甚至有时必要的退让也是不可少的。我们来看一下联合国刚刚通过的“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

这个《主席声明》不痛不痒，语焉不详，但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成功”，也是中美之间妥协的产物。这个产物能够横空出世，要感谢北朝鲜的态度：死不认账。

韩国的“天安舰”当然不会“自爆”，韩国也不必玩苦肉计——如果玩这种苦肉计，就应该在炸掉自己舰艇的同时向朝鲜宣战。而北朝鲜显然也不至于公然用鱼雷袭击韩国舰艇，否则，他也不用“矢口否认”。所以，这次事件应该是擦枪走火，或者是朝鲜有些层级的官员误判，做过之后又后悔了。但这件事造成了韩国军人死伤和军舰的沉没，后果很严重。

“天安”号事件本来有一个处理办法：承认误炸，道歉了事。正如当年美国悍然炮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样，不管真相如何，总统克林顿先“道歉”，一次不行来两次，最后各方博弈，各取所需，危机竟然被搞成了转机。可是，朝鲜不是美国，韩国不是中国。朝鲜不会道歉，他搞的是野路子：不是我炸的，你能怎么样？

于是这个《主席声明》只能各说各话，韩国指责朝鲜击沉自己的舰艇，而朝鲜说不是我搞的，美国和中国一起站出来义正词严的样子：好吧，不管是谁干的，这事到此为止，而且下不为例。《主席声明》中强调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两个大国把南北朝鲜当棋子下了一次棋。

大家想一下，如果朝鲜承认这事是自己干的，却又不道歉，那问题就相当严重了，甚至会把中美两国拖下麻烦之水。所以说，这起最严重的一个涉及区域安全的外交事件，是靠朝鲜同志们的“撒谎”来平息的。两个大国玩了一次外交中的“我知道你撒谎、但我假装相信你、只是希望你今后别这样干、也别再撒谎了”的游戏。

这就是外交关系，听上去也许有些不爽，但没有啥办法，我和你一样不爽。美国和韩国也不爽，所以，据说还要继续搞军事演习。朝鲜毫无底气地抵赖，本身就是承认了袭击“天安”号是错误的，否则他早就光荣承认了，所以，他也爽不到哪里去。而更不爽的当然还是中国：朝鲜的领导同志访问中国的时候，到底告诉我们“天安”号事件真相没有？如果他矢口抵赖自己对“天安”号事件负责，是不是把中国这个靠山也当成好欺骗的？

而更糟糕的是，如果他不愿意欺骗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如果他当时到中国来时就偷偷地告诉了真相，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已经背上了为这样一个国家政权圆谎的沉重包袱？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平和、稳定地放下包袱的过程。

杨恒均　　2010-07-13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十

“跨省”的另一端

香港著名的民间智库推出了一篇《“网络问政”：互联网发展的中国路径》的文章，很有意思，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五年前在海外做的一个学术项目就涉及到互联网的中国将何去何从。正如天大智库的文章所说，不外乎两种理论：作为前所未有的开放平台的互联网，将会挑战甚至终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只不过是一个传播平台，作用如何，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当时虽然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互联网很可能会被公权力利用来加强集权统治，但比较微弱，不成气候。

大概是前年在德国开会吧，同一位埃及来的互联网异议分子同台发言，她讲了一些埃及人如

何利用网络维权的事，听起来离成功赶走集权者实在遥远，我也没有好好听。然后就是我讲，我提到了“广场”这个词。记得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提出了“博客就是中国网民们的虚拟广场”，我们在上面实行言论自由，第二天，翻译成德语的这短话被转载了五千多次，创造了记录。

但很显然，即便是虚拟的广场，也并不平静，冲突不断发生，例如文章中提到的跨省。而且冲突越来越严重，现在是连县委书记也认为面对网络他们成了“弱势群体”，早前也官员深情的怀念“没有网络的好日子”一去不返了。

这种情况真让人担心啊。我不是为这些官员担心，而是为互联网捏一把汗，要知道，在这个国家，与官员作对的东西，命运都是挺悲惨的。我一度悲观的认为，当“广场”成为官民斗法的“战场”的时候，官老爷们迟早会一声令下，把网络都一关了之。

好在目前来看，还只关闭了一部分。而且，从有限的资讯来判断，从江主席到胡主席，尤其是温总理，他们对互联网还挺重视的，而且，胡温两人都“触网”与网民直接交流，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吸取网络上的民意。我最近也在思索，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中国政府会找到一种新的办法在网络上沟通民意引导民意，加强执政能力，甚至部分实行某种有中国特色以及网络特色的民主？

我想这也就是人家香港的一家智库提出这篇文章的意义，感兴趣的网民与转嫁学者不妨就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一下，最好可以参阅我写的那几篇有关互联网的文章。

从革命到开放，从和平崛起到和谐社会，下一站：“幸福中国”？

61年的中国历史上，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特色，老毛的时候是革命压倒一切，小平上台后，开放是主流。到了江时代，“和平崛起”是主旋律，而胡总上台后，提出了“和谐社会”，在可以预见的十年里，新一代领导人一定也会提出自己的“主旋律”，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研判，应该离不开“幸福”两个字。

例如构建“幸福中国”，或者“幸福社会”。但幸福这种东西，是比较主观，也是非常个人化的感受。例如，主人有主人的幸福，奴隶有奴隶的幸福。当然，关于幸福也还是有比较符合客观的现实标准的，那就是幸福应该是建立在公正、公平，至少是不受欺负，不受侮辱的现实制度至上的。

重庆在建设幸福社会，广东的汪洋也在不停地重复“幸福广东”，我想，你幸不幸福，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不能缺少了你的声音。否则，到时你“被幸福”了，就不要怪人家了。（参阅：《从“幸福广东”看改革新模式》）

比奶粉造假更为严重的是：运动员的年龄造假！

今天中午看新闻，香港媒体报道了中国某地不良商人利用皮革提炼蛋白质制造奶粉，里面含有可能致癌的物质。令人气愤，就顺手发了一条微博：“中国科技创新再传新捷报：把废旧的皮革用石灰浸泡后进行一连串加工，榨取里面的蛋白质，成为大陆最新奶粉配方。据说可以让孩子们成长的同时，有机会得癌症。”

这条冷嘲热讽的微博得到网友们的激烈响应，我则继续看新闻，结果又看到今天放在头版的新闻“罗格要求查清中国花样滑冰多人年龄造假事件”，我就非常气愤了，又马上发了一条微博。回应的网友少了不少，激烈程度显然也下降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奶粉是大家吃的，哪家没有孩子？谁家里没有人喝奶粉？现在能到香港去买奶粉，或者只买进口牌子奶粉的，毕竟是极少数，广大的内地民众根本没有这个条件。至于花样滑冰运动员年龄造假，则说不定还能为国争光，又不伤害任何人一根头发，算不得什么。

可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而且，立即发了一条“运动员年龄造假比制造毒奶粉造假更为严重”的微博，结果可想而知，几乎就没有网友来回应不说，还有几位表示不理解。都是该死的微博，140 个字，号召革命还差不多，真要把道理说清楚，哪里够用啊？

我想说的当然不是奶粉造假不严重，直接危害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孩子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奶粉制造中的造价再严重，毕竟是个人的犯罪行为（它并不比拿枪射杀孩子更严重多少），个人犯罪不但中国有，全世界都有，政府不会支持，也在镇压，试图消灭……

可是，年龄造假呢？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说得严重点，它成了一种国家犯罪，公权力的犯罪。我们国家的体育组织都是国家的，而能够篡改年龄的只能是政府的公权力机构，这种为了抢金夺银的名利而不惜篡改年龄的做法，实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件造假的表面意义了。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两件毫不相干的“造假”，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政府为了利益而篡改年龄，正是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利益而在奶粉制造中作假的根子所在。

奶粉造假终有一天会被国家法律制裁，但国家造假呢？或者换一句话问：你相信一个动不动就造假的政权，会真心实意、脚踏实地地去杜绝奶粉造假？所以，大家不必为奶粉造假哭天喊地，甚至又在哪里怀疑自己民族的劣根性与道德水平之低下，西方都出现过类似造假事件，你只需国家政权实行法治，见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惩罚一个就行了。但是，我倒是想请大家多追问一句：是谁给公权力这么大的权力，竟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篡改运动员的年龄？谁来制裁他们呢？

当然，无论什么样的造假，都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公权力造假。不过，此时此刻，我倒希望我今天看到的两条新闻都是“假新闻”……

杨恒均 2011-2-16

观念篇 无梦一代的 80 后病

躺平了世界就不存在

到达天安门东站后我问一位地铁女服务员，哪一个出口离孔子雕像最近，她显然不知道什么孔子像，转身问她旁边的另外一位 80 后女孩，她竟然也是第一次听说。我有些迷茫，我可是专门来寻找孔子雕像的啊。她们告诉我身边的这个出口通到历史博物馆。我来到上面，还没有出门就瞥见有 9.5 米高的雕像，原来离这个出口不到 20 米，两位女孩都不知道？还是根本不关心这个不起眼的雕像？我来不及细想，迈开大步走过去，没想到，昨晚才落下的北京今年的第三场雪，加上我好多年没有在这样的雪上踏过，被滑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还好，骨头没散架，只是屁股有点疼而已，准备爬起来时，看到地铁出口的一位小伙子快步向我走来，“你没事吧？”他伸出手要来扶我。我说没事没事，自己赶紧爬了起来。看着这位 80 后离开的背影，我才意识到自己滑倒的真正的原因是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他站着时把他打倒，他躺下后他又站了起来……

不过，在他面前，我怎么也不能说老，他都两千多岁了，而且摔倒过无数次。我拍拍屁股，收拾心情，来到孔圣人的雕像前。这里有两位武警巡逻，有一位保安站岗，还有一位公安在不远处抽查行人的包裹，虽然并不是专门守卫孔子像的，但乍一看上去，还是有些怪异。孔子的脸很饱满，有九五之尊的形象，不像一名为五斗米折腰的“丧家犬”。他头上与肩膀上还残留着昨晚的落雪，双眼微微眯着，不知道设计者是何用意，但却引起我的思索：他为什么要眯起眼睛？

雕像前是车水马龙的长安街，左前方就是天安门城楼。即便眯起眼睛，在孔子那个高度，也应该能看清城楼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有意思的是，画像里的毛的脸正好是朝向孔子雕像这边，那脸上挂着十三亿人都熟悉的、几十年没有变化的那种微笑。难道孔子是为此眯起双眼？要知道，就在离他站立不远的广场正中央，画像中的毛泽东的遗体还躺在水晶管材里……

在毛泽东还站着的时候，他曾经号召全国几亿人一起砸烂孔家店，把孔子打倒在地，再踏上几亿双脚。对孔子（当时叫孔老二）的批斗贯穿了和我同龄这代人的整个启蒙教育期，那时高喊了最长时间而没有变化的口号只有两句：毛主席万岁，打倒孔老二。

如今，万岁的人已经死了，而被打倒的孔老二却不声不响地站了起来。滑稽的是，就站在那位把他打倒在地的毛泽东身边不远的地方。而被他们“启蒙”的我，却被一些网友说成是启蒙小贩，就在刚才，还一屁股坐在他们两人之间……屁股上传来的微痛触动了我的大脑深处，我想，认真思考眼前这位站着的和那位躺着的对中华民族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你不能站着，也不能躺着，更不能跪着，你得坐着，哪怕是摔了一跤后的坐着……

孔子与中国文化

一直不愿意加入评价孔子的行列，原因是我对批评孔子与抬高孔子的做法都持保留态度。我对那些把我们几千年的专制独裁、奴性顺从与思想僵化都一股脑地归咎在孔子身上的做法不以为然。孔子是当时中国一位最了不起的思想家、教育家与道德启蒙者，他一生都想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但到死都没能如愿。生前只好与一帮粉丝东奔西走，弟子们写写记录他走遍中国的博客，他偶尔发发微博体的论语。他的思想（精神财富）对于当时与后来的专制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不靠谱的统治者——秦始皇与毛泽东正好都是最恨孔子的，一个焚书坑儒，一个火烧孔家店。这多少反证一个道理：

孔子的思想绝对不是最邪恶专制的精神支柱。

至于后来很多人（董仲舒等）对儒家进一步发展，赋予新的内容那是另外一回事。从孔子原装的微博（论语）与他编写的书来判断，他很多道德说教无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中，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一些激烈反对孔子的，认为孔子的思想奴化了中国人，没有民主思想，必需彻底清除，作为改造中国文化以适应民主潮流的一部分等等，我认为实在是没有必要。大家只要别带着对自己历史的偏见甚至仇恨的话，再去认真阅读一下和孔子同时代的欧洲那些大思想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等，在他们被放大了的思想中，其实也有非常多糟粕的东西，例如当时的大学者几乎都对民主（所谓暴民的民主）没有多少好感，甚至在当时一些主张民主的思想家的著作中，民主就从来不是一个好东西。只不过西方后来的学人在梳理前人的时候不象我们那样，故意把好的东西丢掉，反而把糟粕拿出来炒作。而整个西方几乎没有一个人要把无论在思想与理论上都不比孔子差的同时代西方大学者树立为偶像或者"教主"。

和他那个时代的中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孔子当然也是有局限性的，但那种认为西方现在在民主政治上的先进就是两千年前的西方古人奠定的基础，而中国至今的困难一定是孔子造成的，牵强附会了。从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哲学等方面来说，孔子留下了很多空白，没法和西方大哲们相提并论，但这是我们整个民族文化与文明的问题，不是孔子的问题。至少他关于教育与道德方面的说教就不比西方教育家与道德家们逊色，而且，用当时尚处于先进地位的方块字表达出来，意犹未尽，更显魅力。黑格尔在评价《论语》时说，那里面的思想，哪个民族都有。——你可以说黑格尔认为《论语》没什么了不起，也可以同样说，原来哪个民族都有的那些思想，我们孔子早在两千年前就说出过啊。

可以这样说，如果道德与思想领域也有"普世价值"的话，孔老师的很多说法是符合"普世价值"的。我们没有必要用西方人曾经达到的水平，以及我们现在站立的高度，去评价孔子的所有思想与做法。更不能把他变成"教主"，把一个两千多年前知识分子的说辞当成"教义"，全盘接受，各取所需地尽情发挥。

更不能像有些人一样，把孔子抬出来，就是要树立起所谓中国的价值观，而且准备用这种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来对付"普世价值"。这样做的人，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普世价值。

什么是普世价值？

当今说"普世价值"的中国人要远远多于西方人，原因很简单，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实在太普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普通人的基本生活常识，没有必要整天挂在嘴上了（只有总统候选人说得最多）。可是，在我们这里，竟然有那么多人反对普世价值。我很想问一句，你们到底搞清楚什么是普世价值没有？

当今"普世价值"最普通的说法包括自由、民主、法治、宽容、人权。人权放在后面，是因为有时连人权都不提（前面几个就包括了人的最大政治权力）。普世价值虽然现在变得很普通，但即便在西方也从来都不是古已有之的，如果你一定要从古希腊那时的反民主学者的著作里找到"普世价值"的光辉，其实，不要说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一部《论语》里就能挑出很多。但，既然西方人说起普世价值的时候，从来不引经据典，我们也没有必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拿现代西方的发展来说，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也是

从二战以后才逐渐成形的。

我常常对那些把这几个耳熟能详的“普世价值”说成是西方的，是反动的，不符合中国的那帮人感到好奇，不知道他们嘴巴里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普世价值包含的这几个内容，都是非常简单的，根本不用绕弯子，即便你偷换概念，也不至于得出那么咬牙切齿的结论啊。这几条普世价值，别说普通的人类，即便动物，估计也不会排斥，你说，谁不喜欢自由？谁不想为自己作主？哪一个民族没有主张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谁不想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和谐与宽容的社会……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二战后直到现在西方人嘴巴里说的“普世价值”已经越来越简单，简单到你无法提出反对意见。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美国人拥抱的“普世价值”在历史上可并不都是这么简单的，例如他们从建国起就鼓吹自由——宗教自由，可你能告诉我这个自由的含义吗？一百多年后，中国华工“猪仔”运到美国时，不信仰他们基督教的被歧视得一塌糊涂，而记载称有中国人带着自己的信仰物（菩萨之类的雕塑），则被白人当成邪教之物予以没收、烧毁。从这一方面来说，我甚至可以说，西方之所以大多数信仰宗教，并且一国人大多信同一种宗教（例如天主教），正是宗教“不自由”的结果。哪里像我们中国，一个小乡村，信菩萨、信土地爷、信猫儿狗儿的都有，没有绝对的信仰自由，能有这么多信仰？中国的神仙可是比世界所有宗教里的神仙加起来还多啊！如果中国的皇帝不许你信仰各种东西，只需信仰他们发明的某种宗教，那时，中国人倒是都有信仰了，但，那是宗教自由的结果吗？

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现在说的“普世价值”，不但不是西方古已有之的，甚至二战以前，他们自己都没有完全拥抱。现在的普世价值里的宗教自由，绝对不是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也不是信仰佛教的自由，而是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以及更重要的：你还拥有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所以，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他们所谓国教“基督教”组织，也不能主办集体的祈祷等活动，美国钱币上还留下了违反“普世价值”的东西（In God……），那上面留下了上帝的印记。——可见，现在的普世价值里的自由，已经和西方人以前甚至二战前的“自由”有了不同的价值与道德标准。正因如此，才更加“普世”。

这种例子还有非常多，而我们一些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却常常还陷在早期资本主义确立的一些带偏见的价值观与文化观里。他们认为西方的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支持民主的人的自由，却不知到，尤其是在西方，在民主制度已经确立的国家，所谓自由，更多的是反对民主的那些人的自由。支持民主的人能够上街游行，反对民主的人照样可以去，在美国，甚至一些极端的纳粹组织都有上街游行的自由。美国的共产党组织不但可以游行，每年还在纽约举行大会（虽然人数少得可怜），招兵买马，这难道不是信仰共产主义者的自由？

更有意思的是，悬置道德判断与具体的某种文化理念不说，过去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普世价值，还加上了必不可少的“宽容“（有的人也使用“包容”，多元），这一宽容，让普世价值的界限就更加宽广了。也可以说，普世价值本身包含了对那些不相信甚至反对普世价值的人或者组织的“宽容”，有了他们，就是多元的一部分，各位，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西方人几乎从来没有为“普世价值”而战，争吵得面红耳赤吧？没有必要啊，普通人接受这些价值理念，至于一些不普通的人不愿意接受，大家宽容你了，但在民主的制度下，你不可能以一己之利或者一党之私来强奸民意、倒行逆施。这就是简简单单的普世价值的威力所在。

普世价值与文化、道德

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发现，当今普世价值里根本不包含我们常常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文化因素，而且也排除了道德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一般人都不会认为普世价值里包含了不要随地吐痰与尊老爱幼的品德）。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美国立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民主大佬都认为共和国最重要到任务之一就是要教育美国人，用什么教育？当然是西方的文化精粹与西方价值观里的道德标准。仅仅从这点来说，当时的“普世价值”根本不能普及，所以，美国人自己也知道，没有相同文化的黑人不应该立即拥有民主等“普世”的投票权。

和早期西方人（例如英法与美国）动不动就搞殖民、搞文化歧视、搞种族主义不同，当今的普世价值不是穿西装的，也不只是吃麦当劳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被美国占领了，被美国人用普世价值洗脑了，但却没有被美国人殖民，于是，接受了普世价值的日本，他们文化几乎完好无损，一些习惯或者毛病，例如温文尔雅过头的礼貌、变态得连我都顶不住的 AV，有哪一个不散发着日本文化与道德的原汁原味？甚至很多文化产品（例如日本动漫）已经开始渗透与蔓延到西方国家。这些文化，剔除了军国主义的糟粕，带上了“普世价值”的光环，畅通无阻，威力无穷，一点也不比所谓西方文化差多少。

回到孔子。孔子的整个思想与说教更多的集中在教育、道德与人际关系上。孔子的思想相当一部分代表了中国文化，当我们用现在的普世价值来审视这些文化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文化与普世价值根本不存在冲突，甚至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难道一个人一旦孝顺父母，就不会选举了？美国人选举时可能不看候选人是否是个孝子，但中国人完全可以选一个孝敬父母的当总统啊，孝敬父母的总统就会破坏民主制度？再说，当今我们所有的道德品质与行为规范几乎都是历史上某个人物主张过的，可他们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局限性，活在今天的我们最幸运之处就在于可以在简单的普世价值观支配下，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西方目前推崇的这个几乎成了空壳的“普世价值”，需要的内核正是各个不同的民族与国家自己的文化、风俗、习俗与道德标准，如果没有了自己的道德标准，给你一个民主制度，给你一个好的法治，你又能如何？难道我们选举领导人的标准应该是会吃西餐而不是使用筷子的？

同样的道理，哪怕你有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资源，还有孔子这种道德教育家留下的精神富矿，可你始终没有一个符合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框架与环境，结果会如何呢？结果很简单，孔子宣扬了几千年的道德为什么始终无法深入中国人之心，更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

原因：没有普世价值提供的那几个框架，再好的文化与道德教育，常常沦为统治者用来驯服、愚弄老百姓的精神鸦片与奴役工具，而糟蹋这些普通人珍惜的宝贵的文化瑰宝与精神财富的恰恰正是绝对权力不受限制的历朝历代的独裁统治者。那些要复兴中华文化，抬出孔子的人不妨回顾一下：要想真正贯彻孔子的思想，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接受普世价值，建立一个制度框架，让大家在框架里，制定出符合中国文化与道德标准的法律法规，选出符合中国文化与道德的精神楷模、圣人，与总统？

可怜的孔子，始终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想通过各国统治者来推广自己的教育思想与道德理念，却弄得自己如丧家之犬，他应该明白，那些美好的思想与道德，只有在制度的保障下，

才能最终开花结果啊。现代的人如果还闹不明白，请把目光从孔子雕像稍微移过去一点——

让躺着的站起来，中国人才能站起来！

厘清了文化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反对与支持孔子的人就不应该再那么固执了。这一点我们真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的"孔子"比我们多得多，但没有一个人会蠢到把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树为两千年后的现代人的偶像，更不会提出什么国教。这些"孔子"的思想，也大多在专家学者与学子们的研究中出现，尤其在他们的一些思想已经成为当今普通人的常识时，你有必要一定用"三人行必有我师"来告诉孩子们要谦虚向他人学习？难道"两人行"就没有我师？孔子宣扬的很多道德其实在西方小学二年级的课堂上就被灌输过，而现在热传的《弟子规》，和我在西方读小学的儿子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差不多，根本没有多少冲突之处。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在当今"礼崩乐坏"的今天，那些扮演了道德楷模的人信用崩溃，国人们不再相信任何活着的人的情况下，我们顺势抬出两千年前的孔子。可这怎么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应该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根子其实就在离孔子不远的地方，那位躺在水晶棺里的毛泽东（这里我自动省掉十三亿字，就不对毛主席做任何评价了）。我只想说，迄今为止，他不但是阻碍我们接受简单的普世价值的最大嶂碍，而且，也是对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破坏最严重的一位。可悲的是，他当初打倒孔子，彻底摧毁中国文化，要给每一位中国人换一个新大脑的目的正是要推行当时的"普世价值"——当时的"普世价值"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价值观，以及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价值观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建立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却同时把中国的文化与传统中残留的一些道德标准也破坏殆尽。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失误或者说失败，给当今那些走向两条岔路的人提供了错误的"经验"：一派认为中国的失败，是因为从五四以来到毛泽东时代，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理念，于是，现在要复兴传统文化——这本来没有错，可他们竟然要用传统文化来对付先进的价值理念，就错得离谱了；另外一派则认为从五四到毛主席，传统文化破坏得还不够彻底，只有彻底清除中国文化，最好连筷子也不用了，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普世价值了……这些人对普世价值的认识，恰恰停留在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那个阶段，他们应该到现在多元的西方社会去好好住一段时间。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多个方面给了我们积极的经验，大家不妨看一下，这三十年来，从上面提到的几个普世价值层面（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宽容），我们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进步，在诸如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力上，进步更是非常巨大，而同时，我们在传统文化上也拨乱反正，从而出现了很多复兴儒教的知识分子。这都是进步，不能否认。可要想更进一步，让中华民族真正崛起，摆脱几千年的恶性循环，我们既不能从普世价值退缩，更不应该妄自菲薄，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是要在普世价值下，重新认识、发扬我们的文化，抱持"宽容"（的普世价值精神）拥抱世界各国与各地先进的理念，正如我们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科学方法一样。

我们要走出这一步，第一步就是认真对待站在那里的孔子，以及躺在那里的毛泽东。谁都知道，当初用水晶棺把毛的遗体保存在十几亿人的圣地天安门广场上并不是毛本人的意思，虽然寄托了当时中国人的感情，但时过境迁，不能再把他与北朝鲜的金日成摆在一起，划归统一类人类了。再说，让他入土为安，让大家更安。他应该腾出那块风水宝地，让位给中华民

族历史上的各位先贤，包括孔子、老子、孟子、墨子、荀子等等，还有在天文地理与文学艺术上延续了中华文明的人，还有从孙中山到那些同毛泽东一起打江山的诸位领袖如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等，当然还有邓小平，这位中共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改成中国先贤祠的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也可以同其他人一样站起来，不用躺在那里了。而孔子等也没有必要站在广场外围，眯眼对着喧闹的长安街，一副看不明白的样子。这一步应该走出去，这绝对不只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它预示着中国人珍惜自己的历史与先人，愿意以博大宽容的心胸拥抱普世价值。

孔子站起来了，毛泽东也应该站起来，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真正站起来。

没有结论的结语

这就是我摔疼的屁股给我带来的一点想法，但我知道也许只不过是想法而已。屁股上隐约传来的疼痛，让我再次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年轻了，时不我待。可一些简单的事情，就有那么一帮人，宁肯让中国人一代一代的等下去，老下去……

还要等多久呢？我猛然想起——也许，我今天已经得到过答案，或者得到过启示？莫非希望就在他们的身上？那两个根本不知道孔子雕像在哪里的80后女孩？还有那位热心的80后男孩……

杨恒均 2011－2－28 北京

一天才赚 75 万

好几位朋友写信给我，督促我就国企兼并山西私人煤矿的事写两句，按说，这是典型的“国进民退”，实在是逆历史潮流的搞法，写写也是应该的。可是，由于最近比较累，已经提前进入圣诞和新年假期状态，加上和儿子一起有点乐不思蜀，所以，就迟迟不愿下笔。当然，文思迟滞也是一个原因，造成这个原因的原因则是我有了点情绪。

上次到墨尔本，朋友告诉我那里有一位大陆来的煤矿老板的儿子，来到澳洲不到半年，先是用现金买了宝马，随即又换了崭新的奔驰，据说还要换比奔驰更酷的跑车，当然，这速度与他换女朋友相比，实在算是慢的。不停换女朋友的结果是，他无法过语言关，也就换不成学校。这位煤炭老板的儿子最近有点不高兴，可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无法上学，他不高兴的原因正如他对同学讲的：最近中国生意不太好做，我爸现在一天才赚 75 万……

这次到悉尼，又听到一个煤老板儿子的故事，据说这位不换女朋友，租了五六个地方，一个地方放了一个女朋友，一个也舍不得换掉。有意思的是这些女朋友还都是大陆来的官员们的千金。只是最近他老爸突然给他打电话，说煤炭生意可能要被当官的抢走了，他问儿子手里现在有多少钱。那儿子说，还有几十万啊，老爸一听就摔电话了：老子不是给了你一千多万，才两年不到，只有几十万了？

听了这两个真实的故事，我平时如泉涌的文思就迟滞了。毕竟，我也是有感情的，既然有感情，有时就会感情用事滴。我杨恒均总不能每天都高谈阔论，政治正确吧？有些事情的内在逻辑挺逗的，不是大道理就能够一言以蔽之的。例如，这煤老板本来是与官府勾结才能够发财的，发财了，却去玩弄官府那些尚无法贪污到大富大贵的官员千金；可是转眼之间，这官员又要开始没收煤老板的财产了……你说，这不正是中国朴素哲学思想中的因果报应？

再说，你什么时候听说腰缠万贯的煤老板对个人的权利有过兴趣？更不用说他们拿出九牛一毛来维权了，我倒是听说过穷得叮当响的北京律师千里迢迢去为山西的煤老板维权。

我以前就经常对父辈那代人说，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你们当土豪很久了，霸占田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能告诉我，你们有田有地的时候，想到给这个国家和普罗大众做点有益的事吗？或者试图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的制度？

例如，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在大陆也好歹折腾了几十年，死活不肯设立这个地球上迄今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权益的宪政民主，最后不是被赶到台湾岛？再说，共产党中起来领导打土豪分田地的领袖们，不是地主富农，就是资本家的后代，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报应其实是中国历史无法走出的恶性循环。中国上下如果不思改革，这循环还会继续，而且可能循环得比以前都要快。不过，现在的人也不是吃素的，和中国几千年历史不同的是，恶性循环无法打破，但我可以把子孙后代送到循环以外去——送他们出国！你再怎么循环，再怎么折腾，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吧？

最早是高干子弟出国的多，后来是富翁把孩子一个一个送出去，留了后路，再后来连要为一个美好中国奋斗的知识精英们也歇菜了，急不可耐地把独生子女送到海外与达官贵人的子女们一起接受资本主义再教育。更让人震惊的是，最近有迹象显示，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的打工仔，也开始为襁褓中的独生子女攒钱留洋了……

其实，如果有其他的选择，谁愿意把子女送到一个文化和语言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中国人是最注重家庭的，我们不是因此常常嘲笑西方人家庭观念淡薄，父母不关心子女？可是你什么时候看到西方父母忍心让未成年的子女到一个异域去学习和生活？

而且，你知道中国大陆出来的孩子们都在怎么生活吗？每一次到澳洲、新西兰和美国，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听到那些留学生的故事，我都很难受，也为他们父母觉得不值。我不排除这些孩子今后有能够融入当地社会的精英，甚至还会继续出现几个诺贝尔奖得主，为整个中华民族争光，但代价是什么？是更多的孩子始终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或者在学生阶段就出事了，而那些看上去没有“出事的”，又有多少心理和性格受到了伤害，谁知道呢？

可我不能告诉中国的家长们，不要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因为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反复上演的悲剧相比，把孩子“流放”一样送到海外，至少是一个保险的做法……

说了这么多尖酸刻薄的话，我也想表示一下，对孩子们，我始终是关心的。例如去年一些留学生爱国爱到失控，在人家国家横冲直闯，我当时就凭自己的经验，旁敲侧击地提醒他们要注意后果——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但也差不多了。

首先，由于部分留学生不照顾人家的“国情”而过早地暴露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实力，结果他们受到了所在国家政府的报复，目前在美国和澳洲，对于毕业后的中国留学生就业，特别是政府部门和高科技公司，都有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有些是明文的，但更多是心照不宣的，也有内部掌握的。

其次，海外留学生去年澎湃的爱国热情是从大陆网民传过来的，他们作为中国愤青中唯一享受游行示威自由的群体，义无反顾地冲上了法国、美国和澳洲的街头。可是，他们不但过早地把力量暴露给了资本主义，也同时暴露在大陆那些爱国爱红了眼的愤青眼中。

国内情绪多变的愤青在利用了这些海外留学生之后，海内外“爱国者”们在“爱国”的大旗之下短暂地结盟之后，迥异的利益最终让他们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就在五星红旗遍布欧美之后不到两个月，大陆互联网上质疑之声四起：这些不用再喝大陆毒奶粉的年轻人是谁？他们的家庭都是什么背景？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在外国留学？他们毕业后有多少回国的？

进入 2009 年，我通过自己文章的跟贴明显地感觉到，当初那批对海外留学生上街叫好的国内“民族主义者们”，开始把“爱国”的长矛对准海外留学生。以致当这些海外留学生在当地受到欺负的时候，国内的网民不但不再是支持，甚至在有非常死亡事件发生在海外留学生之中时，国内互联网上的“活该”叫好声代替了同胞之间应有的同情（见我的多篇描写澳洲留学生的文章）。

第三，不过，和这些国内愤青的仇视相比，还有更让留学生的家长们恐惧的。我最近收到的信息显示，海外留学生的家长们感到大事不妙了，他们也是最早为海外留学的子女的“爱国热情”泼冷水的。

原因有这么两个，一个是部分家长认为孩子还年轻，不懂得国内的事，希望他们成熟点后，看问题更全面时才“参与政治”。但更重要的理由则是家长们感觉到国内互联网上的“民意”越来越对他们不利，例如经过海外留学生的折腾，大陆网络上一片呼声，要求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长们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尤其是那些官员背景的。

难怪，一位澳洲留学生向我描述这样的情景：当一些家长看到他们的子女出现在国内电视画面时，几乎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据我这些年涉内和涉外工作经验所知，中国目前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长只有一小部分真正经得起“严查”：贪污腐败的当然并不占多数，但灰色收入，以及偷税漏税，足足可以让绝大多数家长们吃官司——

当然最让留学生和家长们恐惧的不是“民意”，而是“官意”，最近这几年，在胡温的领导下，“官意”也多多少少反映了一些“民意”，例如就从去年海外留学生像抗日战争时候的百团大战一样过早的暴露了实力之后，阳光法案虽然没有能够实行，但中纪委已经开始要求各地官员必须如实汇报子女在海外留学的情况……

今天就到此为止，顺便一起回复几位朋友的短信，三位朋友在前两天发来了几乎相同内容的问候：老杨头，冬天到了，寒潮来袭，又有流感，请注意保暖……

谢谢哥们姐们啊，我此刻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悉尼，这里的冬天已经过去了，现在正是盛夏，最近几年我每年都过两个夏天……俗话说，冬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老杨头则说：既然一年可以过两个夏天，为啥一定要过冬天呢？

不过，这里的夏天也有让人郁闷的，例如圣诞节要到了，这里不但不会下雪，气温竟然高达三十度，加上又有流感来袭，结果我今天在大街上见到一位给孩子派糖果的圣诞老人——他热得竟然穿一条红色的大短裤，却带着一个大口罩子……

杨恒均 2009/11/23 悉尼

留学的富不富都是“事”

留学天堂澳洲，最近接二连三地亮起了红灯，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数据，从 2001 年起大约有 2646 名国际留学生被羁押，当中大多数来自中国，拘押是因为出勤率偏低，学业通不过。此前也有报道，中国留学生在澳洲死亡率奇高、犯罪率也偏高，《侨报网》最近引用澳洲官方统计，在澳中国留学生的自杀倾向为澳洲当地年轻人的四倍……

这些报道实在让人忧心，澳洲留学不便宜，能够把孩子送到澳洲去留学的家庭绝大多数非富即贵，可那些忙着奔前程和赚钱的家长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孩子在澳洲的境况？究竟是澳洲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留学政策出了毛病，又或者正如最近纷纷扬扬传出的一种观点：这些到澳洲留学的中国孩子本身不怎么样，其中更不乏坏孩子？

相对于其他国家，澳洲的留学移民政策比较宽松，只要有钱，学校入学的门槛比较低，签证也比较好拿，加上只要澳洲大学毕业，再搞点假材料和假动作，技术移民成功率也高，所以留学生的人数众多。由于很多学生的留学目的并非学习，出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

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留学生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笼统指责他们是纨绔子弟，留学垃圾，是坏孩子，实在是有失公允。以我的观察，我想强调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价值观、世界观的冲突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姑且不说留学的孩子都是在高中、大学阶段出去的，就拿我自己来说，30 多岁去到西方，仍然在学习和工作中感到了两种价值观的冲击。虽说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初来澳洲的中国孩子可以找到中国大陆能够得到的所有东西，唐人街甚至比中国大陆的街道还更加具有中国传统风味，可是，内心深处价值观的冲突却阻挡了他们真正融入主流社会。在热闹的留学生活背后，这些留学生内心的孤独和压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二、中澳教育制度的不同也是一个原因。很少家长会问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的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孩子突然被转到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下，他们能够适应吗？例如，中国的教育是以老师和课本为中心，而澳洲的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很多时候，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是最重要的，老师只是引导作用。这使得在中国受惯了填鸭式教育的学生一到澳洲突然“轻松下来”，老师不会强迫他们学习了，慢慢就真正松懈下来，结果考试的时候才发现该看的书没有

看……

三、中国新一代留学生和20年前的老一代留学生相比，更缺乏谦卑学习的态度。上一代中国留学生无论家境如何，内心深处都存有一份“谦卑”，这和我们国家落后人民贫穷有关，可也因祸得福，他们带着这份谦卑的心，不但更容易适应西方的环境，也有更强的求知欲望。如今，当我们国家崛起强大了，澳洲留学的孩子们也大多是富家子弟的时候，不但这种谦卑没有了，取而代之的甚至是“趾高气扬”，我不止一次听到刚出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大加贬损，对澳洲这也看不惯，那也不习惯，认为还是中国的好。这种批评的精神是很好的，但把这种心态带进学习中，就有问题了。你可是要花费一百多万人民币去学习的，没有谦卑和虚心的心，学什么？

四，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面对，那就是留学的目的。以前老一辈留学生的目标很明确:学到知识，赚到钱，拿到文凭，或者回国，或者留下来。而现在留学澳洲的绝大多数学生目的也很明确:取得文凭，移民，拿到“身份”后再决定住在中国或者澳洲。在众多中国留澳学生中，相当大一部分并不是他们自己想来留学，而是父母家长要求他们来的，其动机无非是让孩子留学澳洲取得移民资格，也是整个家庭的一个退路，国内的环境也许会恶化，赚的钱也许不安全等等。大家想一下，这样被父母劝说出来留学的孩子，能够真正安心读书学知识吗？

留学澳洲的中国学生不是坏孩子，留学制度也没有问题，澳洲社会和留学市场也相对健康。还是那句话 ，这 些 孩 子 们 需要 更 多 的 关心 ———澳洲学校关心的是钱，中国政府关心的是他们学到了什么，以及能够为祖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家长们关心的是孩子能否在澳洲拿到文凭和绿卡，于是，只要能够让孩子去留学，一切都 OK 了，各方皆大欢喜了……

其实，这样被弄到澳洲去留学的孩子们往往会在学业和感情上遭受困扰，如果我们社会和家长对此问题有认识，多沟通、理解和关心，问题也许不会那么严重。

来源：《南方都市报》

打倒“三俗”主旋律

最近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反三俗”，所谓“三俗”，就是庸俗、低俗和媚俗。胡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掀起了“反三俗”的高潮。8 月 6 日，文化部长蔡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给出了“三俗”的原因并连发六问，包括每年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没有多少力作，每年三十万种出版物也乏善可陈……

蔡部长的六个问题问得好！我原本以为只是我们这些小民看到了现实，哪知道连主管中国文化的掌舵人也看得一清二楚？不过，六个好问题都被部长问了，我等就只能弱弱地补问一句：部长同志，你问谁呢？你不是主管中国文化的领导人吗……假设蔡部长是问我等小民的，那么，为中国文化重建出谋划策，就该当仁不让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问题，但如何去解决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谁不知道中

国文化与精神生活中庸俗、低俗和媚俗已经成为主流了？当然要反，可如何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我们在文化与精神领域经历了“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迎来了“反三俗”。根据前两次的经验，我们是用“清除”的办法，把“精神污染”清除掉，用“反对”的办法，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拒之门外，或者藏在寝室里，自己捣鼓……

我们成功了吗？这个可圈可点。我只想提醒一下各位，清除被污染的精神，最好的办法是有一种新的不被污染的精神取而代之，否则，人没有精神，乱七八糟的东西自然乘虚而入，不被“污染”才怪。至于说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好的办法就是确立一种“无产阶级的不自由化”，否则，你用什么来反？果不其然，反来反去，我现在反而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最腐朽、最糟粕的“文化”，反而都跑到中国大陆来了。

也难怪，大家一听到“反三俗”，第一想到的就是要封杀谁了，要删除谁了，要关闭一些电视频道了……可我总认为，不能重蹈覆辙了！可喜的是，虽然文化部长对“三俗”痛斥了一番，他开出的药方并不是“铲除”“清除”之类的。也许他和我们一样清楚，一年两万首歌与三十万种出版物对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并不算多，而如果按照“三俗”的标准把他们都“清除”掉，估计到年底，我们最多剩下八首样板戏一样的红歌，以及几本红宝书一样珍贵的图书……

文化部长开出的方子是“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引路。”“多用引导的办法，少用行政的办法，团结、带领艺术创作人员，逐步形成强大的良好的创作风气。” 这个说法虽然和我的思路还有一定距离，但比起用行政手段大刀阔斧“清除”三俗，已经是大大的进步了。

“三俗”不好，可为什么不应该用行政手段来对付？原因很简单，形成三俗的根源除了部长所列举的三条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三俗”歌曲、文学作品与电视电影层出不穷？还可以这样问：那些不“三俗”，那些有思想性、有人文关怀，那些真正忧国忧民、发人深思的好作品都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就不客气地自吹自擂一次。七八年前我写了三本政治间谍小说，那是我为国家工作以及游离世界思考中国十几年后的产物，第一部《致命弱点》描写的中美关系后来几乎每一件事都发生了，《致命武器》首次把农民工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这样一套书，无论如何不应该是“三俗”吧？可至今无法出版不说，唯一一次差一点出版的情况竟然是：一位编辑把《致命弱点》里的政治与思想内容删除殆尽，加重色情描写要隆重推出——谢天谢地，后来因为没有把思想全部删干净，所以还是没法出版，也避免了我沦落为色情小说与“三俗”作家，跻身于中国“文化人”之列。

每年三十万种出版物，可我每年写的百万字的博文竟然始终无法出版？就在三天前，一位美国的大学教授亲口告诉我，他把我写美国民主与亚洲民主的几篇博文当教材讲给美国学生听，让他们讨论美国问题。注意，不是讲中国问题，而是讲美国民主！一个中国人讲的美国民主小故事，竟然可以成为美国大学的课堂讨论素材，这样的博文怎么来说都应该是有点点思想、不那么“三俗”吧？可是，这么多年，你们每年都允许三十万本出版物出版发行，而我的得到那么多中国读者喜欢的博文，却始终无法出版？

我支持党中央"反三俗"，更欣赏文化部领导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我认为，"反三俗"最有效的办法不但不是收紧控制、打压甚至清除"三俗"，反而是放松控制，让有思想、有人文关怀有现实意义、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优秀文化产品能够降临中国大地。

我举个例子，有人说小沈阳是庸俗的，可实话告诉大家，我就喜欢看小沈阳的小品，而且，我还可以告诉大家，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像小沈阳之类的小品演员，有些更加"三俗"……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连美国的杂志也说小沈阳庸俗？

原因很简单，人家在说你这个国家庸俗，是你的文化氛围与文化政策把小沈阳弄成了主流。如果在西方，我看小沈阳（或者外国的庸俗小品与脱口秀）只是一种娱乐，而我最主要的文化享受还是电视黄金时间里宣扬西方"主旋律"的作品，还是有深度的新闻追踪，还是 Larry King 访谈节目，还是以揭露统治者阴谋与社会阴暗为主的主旋律"新闻六十分钟"等等……可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电视上，一个本来应该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却登堂入室，成了主旋律，这才是真正的"三俗"啊——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文化部门承认的"主旋律"是人为的矫揉造作的，是比小沈阳还装腔作势的蹩脚货……

比"三俗"更可怕的是用行政手段、用专制手段一刀切地清除"三俗"，同时封杀那些高尚、有思想与引领中国人向上的作品。当后者都被"清除"了，被禁止了，或者根本就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你用什么来对抗"三俗"？你又用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与精神走向世界？

说起电视连续剧里的庸俗与媚俗，可能没有比那些描写清宫戏、皇帝老爷沧海遗珠、格格们与皇亲国戚打情骂俏更过分的，说起高雅与有一定思想性的，有大量清宫戏的《走向共和》算是一个。结果如何呢？后面那个从屏幕上消失了，前面那些"三俗"的代表作品被上百次、上千次地重播。请问，如果都有相同的平台，即便观看后者的人数并不及前者多，但"三俗"能够那么猖獗吗？"三俗"目前之所以如此猖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不三俗"的文化产品了，"三俗"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三俗"其实已经成了我们的主旋律……

至于部长说的"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引路"等，我是这样看的：中国目前文化与精神领域的危机来自于缺乏国人都认同的价值观，因此在价值观都得不到共识的时候，"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等等行为，可能会弄出更多名正言顺的"三俗"作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建国六十年里，政府文化部门可是一直没有停止树立文化界的典型，今天样板戏，明天"致富光荣"……而这些典型后来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证明是毒害中国人精神的真正祸首，也成为当今"三俗"猖獗的深层根源……

"宽容"这把钥匙

我并不否认时评与杂文本身就是以冷嘲热讽与批评为主的文体。这其实也是鲁迅与胡适的区

别。鲁迅是杂文与小说的大家，他选择的文体注定他是一名战士，一名把杂文当成“匕首”的战士。而胡适是一名学者与思想家，他不能也不应该偏激。鲁迅绝不宽恕，胡适有包容心，虽然这是由教育与修养所决定，但也多少受到两人职业的影响。后来的人，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严重弄混了一点：他们把鲁迅当成思想家顶礼膜拜，而把胡适当成了“最有思想”的作家推崇备至。

鲁迅和胡适都不可少。鲁迅的性格和杂文也许缺少了宽容，但宣称“我一个也不放过”的鲁迅本人却正是“宽容”的产物。鲁迅的文章虽然像匕首一样犀利，但肯定不像真匕首一样能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更没有军阀和蒋介石的子弹“犀利”，如果那时的当权者也像鲁迅一样“一个也不放过”的话，请问，经常“出离愤怒”的鲁迅即便逃脱了割喉管、被枪毙的命运，估计也难不遭受五六年，甚至十一年的牢狱之灾。更不用说，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鲁迅先生竟然享受到如此宽松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说，鲁迅本身就是宽容的产物，而不是“一个也不放过”的楷模。

由于出生背景和成长的环境，我本不是一个宽容的人。甚至当我毕业后想当兵、当警察，也是出于想找机会报复小时候欺负过我的人。然而，半生的风雨与追求，让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人能够拥有的最美好、最受用无穷的品质，就是宽容。

尤其当我涉足到中国政治，包括和政治有关的研究与写作之后，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们缺乏的正是政治包容与宽容——而缺乏这些，要想走出几千年的恶性循环，可能比登天——登上月球，要难很多……

在和香港的青年人交流的几个小时中，他们对我的经历感兴趣，想了解我的政治观点，以及对青年人的看法。我们有交流，有争论，我是知无不谈。离开后，我才猛然想起，我竟然忘记把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经验告诉他们了。于是，我给他们群发的第一封信中谈的是：不管你持什么观点，不管你今后做什么，学会包容将让你一生都受用无穷。

我也想对所有的年轻读者说，假如只能拥有一种品质，请选择“宽容”。

有人可能以为“宽容”是对他人所作的一个恩惠，其实，当你学会了宽容，当宽容变成了你无法分割的品质的时候，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被你宽容过的人，而是你自己。

因为，所有对他人的宽容，归根结底是你对自己的一种宽容。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对他人毫无容忍与包容之心，一些极端的人，一些要死要活的人，如果你观察一下，会发现他们其实一直在折磨自己，他们本身就是不宽容的受害者。

在北京时，有一位很“刁钻”的年轻人想用一个问题难住我，他问，对于那些对我们毫无宽容之心的人，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答案依然是：宽容！因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不完美的，你永远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要求。即便我现在告诫年轻人，你一定要宽容、宽容再宽容啊。可现在和未来，还有很大一批人不会接受宽容，也不会对他人宽容。世界好像依然如故？

其实不然，当我们宽容了那些不懂得宽容的人时，我们自己才算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宽容。

宽容本身即是价值观的一部分，没有必要依附于其他的价值之上。她不是强者特有的“品格”，更不是当你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的理想之时，当你自认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的东西。而且，宽容确实是一种很有力的武器，但当你把她纯粹当成工具，当成“武器”去达到某种目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宽容。

我坦白，我活到四十岁，直到这两年才认识到宽容的重要性。如果说当初我“容忍”宽容成为我一部分的时候，本身就带着把她当成改善人际关系的“工具”的话，那么现在，渐渐地，我真正感受到她的强大和美丽，并真心拥抱她。宽容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而且是我最珍惜的那部分品质。

宽容不但是生活态度，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人生的价值观，而且，也是解开中国政治死结的钥匙。从这一点来说，宽容甚至比我写了几年的“民主、自由、法治”这些概念更加重要。成熟的民主就是与妥协、包容与宽容无法分开的。

宽容的品质改变人生。自从把宽容当成我最珍惜的品质来追求与呵护之后，我的人生也变得平和、丰富多彩与充满希望。有了宽容，再看博客后面的批评者，阅读那些攻击甚至侮辱的帖子，我唯一的担心竟然是，这些年轻人会不会花太多时间阅读我的博客，而放弃了多读点书，提高自己的机会？

有了包容与宽容，并不是说我们的立场会软弱，我们会毫无原则的妥协与退让，正好相反，我那些向邪恶势力开炮的博文，正好都是因为我懂得了宽容之后。有了包容之心，我的博文依然犀利，只是不会再伤害无辜；有了宽容之心，也许你依然有敌人，但你却不再有害怕；有了宽容之心，也许你依然有仇恨，但那却是基于爱……

有了宽容之心，我一如既往地推崇那些愿意为了理想而不惜一切、轰轰烈烈去拼搏、去牺牲生命的战士们；有了宽容之心，我这个战士，却更愿意为了理想而谦卑地活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杨恒均 2010-3-29

当批评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时髦

打从我记事起，“知识分子”就是同“犯罪团伙”差不多意思的。直到今天，讽刺、批评和攻击知识分子还依然是一种时髦。这几天，我做了一些梳理，有了一些认识与想法。首先，对比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得出了下面三个结论：

第一，过去一百多年，特别是过去六七十年里，中国流放、坐牢、杀头和自杀的知识分子比例竟然高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甚至包括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如果有人把整风、反右和文革中知识分子受难的比例算出来的话，估计要高出上个世纪中士兵的伤亡率。

第二，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个比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民族和

个体的自由与发展而遭受如此深的苦难，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第三，相比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一百年尤其是过去 70 年里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恶劣，几乎是无出其右的。
上面的结论当然不那么科学与学术，但这些基本的事实都是很容易对照出来的。在为国为民为自己的奋斗中，中国知识分子可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为什么始终抬不起头？或者总有人不许他们抬起头？
以前统治者要想折辱你，或者想转移一下“劳动人民”的视线，只要把你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不管是什么族群和团体（阶层），只要对现实不满了，或者自己的利益受损了，动不动就要拿知识分子撒气，什么被收买、犬儒、没有用、不敢站出来……仿佛这个国家是知识分子建立的，他们在管理和运转这个国家似的，你的苦难都是他们造成的——那么，知识分子作为整体遭受到比工人、农民、军人等大得多的苦难，又是谁造成的？
古今中外，一切极权专制和不民主的制度都是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天敌，中国不但没有例外，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血的事实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否认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中国知识分子境况之恶劣的一个突出特点却是：他们不但是统治者折磨的对象——这在很多国家出现过，包括前苏联等，却也是广大的愚民和暴徒们羞辱的出气筒——这一点在其他国家还真不多见。
当人们用“忧国忧民”来定义与要求“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划分与定义。在当今中国，这个划分本身就是有政治目的的。知识分子不是石头缝里跳出来的，他们都是从社会各个阶层里产生的，充其量是更勤力读书、喜欢钻研或者更会考试的一批人而已。在现在的西方国家，知识分子根本不成其为一个阶层，他们产生于社会各个阶层，又存在于各个阶层之中。当今西方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是由有知识的人挑大梁。没有人会把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社会问题归咎于知识分子头上。
从上面第一点，我们得到第二点：知识分子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也是人，有血有人，有家有室，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他们同农民、工人以及所有其他群体一样，应该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权。而自从 1942 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生存权受到最大威胁的群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只是用来要求和约束知识分子的座右铭。然而，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历史，我们却可以说，世界上还真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更配享受这句赞誉的。
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时间里，知识分子在受苦受难，更多的时候是为国家和民族在受难。相比知识分子阶层来说，大多数人要就是保持了沉默，要就是成了帮凶，这当然是因为被统治者愚弄的结果，但却不应该成为借口，更不应该至今还不思反省，把全部责任推给中国知识分子……
作为一名涉猎多种行列，唯独没有当过“知识分子”的我，将在这组短文里谈谈我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主要涉及这么几个问题与主题：
当我们质问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什么的时候，最好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和民族曾经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做过了什么。
当我们为自己的处境抱怨，从而把怨气发在知识分子身上，当批评知识分子成为政治正确，成为一种时髦，当知识被践踏，知识分子长期遭受统治者与愚民 折辱的时候，我们的“处境”难道不是自作自受……
杨恒均 《论知识分子》系列之一
2010-06-02

只给男性读者的寄语

在 2010 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想对男性读者说几句知心话，至于为啥只对男人说，看完你就知道了。回首 2009，一百六十多篇博文，我已经啰嗦得够多了。一篇又一篇硬邦邦的政治博文弄得一些老读者都抱怨得了“审美疲劳”，所以，今天我想谈一下感情，说一下爱情，但只对男性读者说。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民主到来之前，我们该如何生活》的博文，今天我想说的是，民主到来之前，我们该如何相爱。年轻的读者可能以为岁月催人老，或者我脑子进水了，竟然糊涂到连人家如何相爱也要指手划脚。

我还是从自己的写作经历入手“娓娓道来”。我一直想写的是文学作品，对感情生活和爱情故事情有独钟（见“致命系列三部曲”），并认为情感特别是爱情始终是人类文学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泉。相比较而言，我后来从事的涉及政治的博文写作，倒是一时之需。

从偏重感情、爱情到清一色的政治题材，我好像在两个世界里畅游，体会到感情世界和政治社会的区别，这一区别也在分别生活于这两个领域的男女身上烙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人类发展到今天，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就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吸取了一些教训，有了无数的覆辙可以借鉴，从而找到了一条迄今地球上大多数民族都能够接受的光明大道。照耀这条大道的就是普世价值的光辉。有鉴于此，我才敢每天都在博客里大言不惭、侃侃而谈，因为，以我的学识和经历，加上我坐在巨人的肩膀上，使得我对自己的主张比较有把握。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我说的绝大多数话都是无可厚非的，我大多的“预测”和理想已经是其他国家的历史，而这些历史也终将变成中国的现实。

可是，说到人的感情问题，有读者来信请我对他们的爱情发表评论，我就傻眼了。要知道，政治是人类集体的事，而感情却是非常个人的。在感情世界里，是否也有一种被世界上大多数男女都接受的爱情模式（好像政治领域的“民主制度”）或者“普世价值”？当然没有啊。我写博文不厌其烦，主要是让国家能够避免在政治的道路上“重蹈覆辙”，可在爱情的世界里，你能用自己的经验告诫年轻人：我当初如何如何就失败了，你不能这样啊。恰恰相反，人类个体每一个婚姻都是在“重蹈覆辙”，很多美好的爱情正是在“重蹈覆辙”的时候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可在政治道路上，没有几个民族能够经得起这种“重蹈覆辙”的折腾。

正是有了这一对比，让我再反过来暗中对照一些“干革命”和“搞政治”的男人时，我发现了更多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些“政治动物”长期执着地追求政治理念（包括长期从事政论相关的研究与写作后），他们的大脑逐渐形成了非此即彼、旗帜鲜明的思维方式，当他们面对不太关心政治、更多地沉湎于情感世界的女性的时候，他们一下子乱了方寸。

我就拿普世价值开刀，大家也知道，不管多么艰难，当今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人们肯定是自认为站在人类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上的，虽然妥协也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但政治的非此即彼，要么民主要么专制却是不容妥协的。那么，在非政治领域，在男男女女的爱情生活里，那些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作为一个普世价值的追求者，作为一个号召要把民主不但当成目标，也要当成生活方式的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普世价值引进

到男女爱情和家庭生活中，结果会如何？

你说有几个家庭是搞“民主”的？搞民主的家庭就比搞“一言堂”的家庭更和谐？还有，爱情能不能以理服人？可不可以动不动就“讲理”？有几对夫妻吵架时是在“讲理”？至于婚姻，谁都知道是“自由”的坟墓。当然这还不算更糟糕的，更糟糕的是：一些追求民主自由的“搞政治”的人士，在男女交往和家庭生活中，也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担当“启蒙”和“先锋”的角色，动不动就对把感情看得高于政治理念的女性训斥一通，或者责怪他们“为什么不知道牺牲”？难道不知道“我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这就大错特错了，各位男爷们，政治虽然不能让女人走开，可是大多的女性是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这和女人的天性有关，政治领域的“非此即彼”和爱情里的“爱上就无对错”是有点水火不容的。任何一个沉湎其一的，很容易忽视另外一个。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想用个人的感情生活主导政治，或者把政治原则弄进感情里，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看到太多从事与政治有关的男人们的感情、家庭和爱情生活出现问题，远远超过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男人。而当我听他们倾诉感情问题的时候，我仿佛在听政治汇报。这些政治动物们很难明白，感情的世界是讲爱的，而不是“讲理”的地方。你能够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甚至成为意见领袖，但到了爱情的世界，你不一定玩得转，甚至变成感情的“弱智”。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在感情上“弱智“，比不上女人们感情丰富，问题在于，自以为是的男人们很可能真以为“人都是政治的动物”（亚里斯多德），而忘记了当时古人说的“人”只是指男人（当时的女人根本就不参与政治），从而把女人们看得低“人”一等，要用政治那一套来统治女人的感情世界。

其实，当我说男人是政治的动物，女人是情感的尤物的时候，我不但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而且，正如我在《民主到来之前，我们该如何生活》的文章中强调的“生活高于民主”一样，我倾向于认为情感世界甚至是比政治领域更高的一个层面。至少对于我这个作者是这样认为的，人类的政治有终极，写来写去，就没啥可写，追求来追求去，最终将会达到一个比较平淡无奇的阶段。可是情感的世界却博大无边，永远会让我们恨得痛不欲生，爱得死去活来。

鉴于我的绝大多数读者是男性“政治动物”，而且其中一些多少受到我的一些政治观点的影响，那么，在 2010 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想再好为人师一次，希望在新的一年和未来很多年里，我们都能携手一起追求共同的政治理想，但在任何时候，在面对对政治不那么感兴趣的女性、我们爱的女人的时候，都不要用一副政治正确的唯我独尊的面孔和态度，更不要让政治的“理性”烧坏了我们的大脑，漠视女人们充满“感性”的感受。男士们不能一方面责怪女士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却对女人们的感情世界无动于衷。

路还有很长，时间永远不够用，但多给点时间你爱的女人，也多给点时间你的家庭，绝对是殊途同归、事半功倍。这是我送给所有男性读者的金玉良言，也是我送给为数不多的女性读者的最好的新年寄语。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政治还是情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因为爱，我们才去为

所爱的人追求，但我们千万不能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反而把爱给遗忘了。

杨恒均 2009/12/31

我们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 2012？

我把灾难片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有限的天灾人祸如大饥荒、坠机、战争、地震、火山、海啸、外星人入侵、妖魔鬼怪和传染病等，另外一种则是终极灾难之世界末日。好莱坞绝大多数的灾难片是属于前一种的，描写人类末日的灾难片几乎没有几部。

这两种灾难片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灾难的规模和对人类的伤害程度，而在于这个灾难是否会终结人类本身。按照这样的标准划分，《2012》属于好莱坞少有的描写世界末日的灾难片。而前一种灾难片就多不胜数了，例如《联航 93》、《日本沉没》、《泰坦尼克》以及《2012》导演先前执导的《独立日》与《后天》等。

前一种灾难片比较好拍，也比较好看，原因是人类有丰富的面对灾难的经验和教训，而且有一套完整的知识结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看完这种电影之后，观众会“想通”或者“看穿”一些问题。可是，末日灾难片则完全不同，特别是注定了的毫无希望的世界末日，其本身超过了我们人类的知识结构和理论“高度”，导演不管如何拍摄，走出电影时，观众心中的茫然和空白会比进去前还要多。

从严格意义上讲，《2012》还不算是我界定的世界末日灾难片，因为人类并没有彻底灭绝。当然，没有人会拍摄人类完全灭亡的灾难片，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观众喜欢刺激，喜欢娱乐啊，为什么不让他们彻底惊悚一把？

好莱坞那些导演之所以小心绕过这个禁区，是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的。这和我们人类的知识结构、对宇宙和自己的认知、价值理念和宗教信仰有关。我现在依据灾难的原因、规模和损害程度把好莱坞大片进一步分类，并在各类型中找出一个比较突出的“指导思想”。

小范围的获救机会比较大的灾难片，如地震、饥荒、战争、病毒流传等，好莱坞在处理这些灾难的时候，比较突出一条主线：制度和价值观。看多了这类灾难片，你不得不承认，好莱坞其实是推广美国价值的急先锋，作用远远超过中国的宣传部。

那么，那些小范围却毫无获救希望的灾难片呢？例如，空难，或者《泰坦尼克》这种很难幸免的小范围灾难，前面说的因素当然还在，然而，更重要的却是人心、人性、人文关怀等等了。例如，看《泰坦尼克》这部片子，你已经忘记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而更关心人类在这个时候的本性，包括亲情和爱情等。

现在让我们再把灾难升级一下，例如《后天》这种灾难片，整个美国北部地区都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急速降温，房子冻住了，人冻成了一条一条的冰棍。这个时候，好莱坞的导演们当然还是在制度、价值观和人性（尤其以家庭、爱情为主）上继续打转，但如果停留在此处，则是不够的。这时，人类精神层面的更高的财富，超过了制度、爱情和感情的玩意推出来了

——那就是形而上的哲学、终极关怀等等。人类在这种灾难中思考的是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应该如何生活，怎么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

现在让我们把灾难提到最高级别：人类末日。当人类注定要灭亡的末日到来的时候，好莱坞的导演们用什么价值、理论和信仰体系来抓紧观众的心？让我们走出电影院时，仍然能够积极地思考社会制度，紧握爱人的手，以及积极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信仰的关系？制度在这里毫无意义，就连我们现在争吵得你死我活的“普世价值观”也因为即将没有“世（界）”而变得不值一提，至于人性呢？至少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碰上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现象：人类都没有了，人性还有什么意义？你以为你是上帝吗？你真以为人性可以独立于人类而在所有动物、在宇宙间流传？

那么，面对这种不是毁灭个体或者族群，而是要终结人类的灾难，人类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显然没有。科学等学问都是让人类活得更好的学问，哲学是人类发明来解决人活着的时候用其他科学无法解决的有关自身问题的学问，是所谓高于其他学问的学问。而宗教则是对哲学无法解答的问题——死亡——做出了回应的人类更高的智慧。可是，虽然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末日审判和人类终结的教义，但迄今敢把“世界末日”搬到现实世界里的，充其量是一些躲在山上不下来，最后排成一圈集体自杀的邪教组织。

由此可见，《2012》年的导演是比较勇敢的。当然，他没有勇敢到让人类真正灭绝，而是弄出了三条船，把下一个纪元的人类“祖先”装了进去。谢天谢地，他用这种方法，才避免了没有把一个“世界末日”片子拍摄成宗教宣传片。可是，由于他是在灾难片上走得最远的，却因此而颠覆了我们人类的认知、理念和信仰——

这就是我和一些朋友看了这部电影，感觉到心里空空如也的主要原因。这部电影让我们知道，好莱坞的电影，不都是打打杀杀，所有的电影都是人类知识、价值观、理念和信仰的反映，所以，我们看了电影才觉得“有点意思”，甚至很有“意义”。

导演也是按照这个套路在拍摄《2012》，他不遗余力地玩好莱坞导演们在其他灾难大片中玩的那些故事情节和理念：普世价值支撑下的最后不肯自己保命的美国黑人总统，中国什么奇迹都可以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制度下的“中国制造”，肥胖的亿万富翁拿钱买两个儿子和自己的命，要求马上关掉舱门不让外面的人进来的代理美国总统发号施令的权贵集团的代表，以及那位充满了人性的黑人科学家，更不用说一个作家为了家人而历经艰险爬上了保命的诺亚方舟……

这部集海难、火山、地震、空难、海啸等等于一身的灾难片，同样把所有能够塞进来的“精神因素”都塞了进去：制度优越（美国的和中国的）、价值观、多元文化（中国与西藏）、人文关怀、人心、人性几乎一个不漏。

可是，我看完之后，却并没有产生看其他灾难片之后的那种感觉，反而严重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例如，他描写的配角（或者说故意弄成反面形象）大富翁和最后代表美国总统发号施令的“权贵”代表人物，并不让人反感；而他着笔那么多的两个人物，一个带着家人开后门偷偷爬上飞船的（结果差一点让人类灭绝）的作家，以及一位在飞船启动前十五分钟要求开舱门救人，大发一通人性不同于动物之类的高调的黑人科学家，并没有让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安排，总让人感觉到物是人非，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认为看电影，如果是看热闹，那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可如果要想看出“意义”，则你必须让自己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灾难片发生的大故事之中。我这样问一个问题：看《泰坦尼克》海难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陆地上；《后天》把北美洲人都冻成冰棍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电影院有空调的房间里；《日本沉没》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你在亚洲大陆；那些空难和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你一般都不在现场，也不会在那架飞机上，所以，你即便紧张万分，也能够心平气和的思考人生和世界。

可是，《2012》年世界末日到来，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被毁灭的时候，你在哪里？很遗憾，你在地球上，就在被毁灭的那些万物之中。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那是这部电影的失败；而如果你有了这个感觉，你将会意识到，这部电影是一个失败。

这种感觉使得一切都不再一样了，你不再是一个悠闲的坐在那里思考制度、价值观、人生、人性和哲学问题的旁观者，你是一个即将被灭绝的种族。这难道还不足以颠覆你所有的知识、理论体系和精神信仰的支柱？

记住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来，再让我们来看一下《2012》宣扬的那些本来应该让我们思考的精神主轴：你真为美国总统最后和人民死在一起就是美国精神的胜利？可你难道没有发现，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在三年前就知道地球要灭亡，可他们竟然对 60 亿的人类保密了三年？地球上现存的哪一个制度和价值观能够为这种行为辩护？

还有，好莱坞电影中永远不变的主题：个人主义（表现为个人英雄主义）在这部电影中达到了极致，一位作家用自己小聪明发现了真相，带着家人不顾一切找到了救命船，并用中国人特有的“开后门”的方式上到船上，结果给那艘船造成了危害，差一点同归于尽。导演在这里花费一大段时间描写这一家人如何一个不少地登上了保命船，最终关上舱门，把毁灭了的地球——以及大约 60 多亿人——关在了外面。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类灾难片的时候，发现在主人翁成功时，观众却并没有鼓掌或者长长松一口气，为什么？因为被这位以自己家人为主个人英雄关在外面的，应该就包括我们这些此时此刻就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以及电影院外面的 60 亿人口。和以前的灾难片不一样，他不是冒险拯救我们的英雄，只不过是我们中比较幸运的一个。

我这里当然不是要推翻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人心人性这些我们当今赖以生存的东西（也是我在争取的东西），我只是想说，当你把一个更加宏大——宏大得超出了我们的知识、想象和信仰的场景搬了进来的时候，你的知识、信念和精神支柱却不足以支持你的故事的场景。于是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地方。

这种不和谐在《21012》中比比皆是，我再举一个例子：电影把制造三艘救命方舟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人，因为“中国制造”已经在世界打响了名头。所以，当美国人看到中国人制造的方舟后，惊叹道，选对了地方，中国人什么奇迹都能够创造。

是吗？就拿“中国制造”来说，中国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大量的下岗工人，在农村已经不太好生存的更大量的农民工，以极其低廉的劳动力，默默工作，制造了“中国制造”，也创造了奇迹。

实事求是的说，如果真要征集那么多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工人日以继夜地工作三年造出如此大规模的太空船，除了中国工人，谁与争锋？

可是，这本来毫无疑问的事情放到了另外一个我们都感陌生的场景（世界末日），一切都不一样了。请问，中国农民工和低廉的劳动力为啥会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最终在世界打响了“中国制造”的牌子，是因为爱国？还是为了祖国的和平崛起？是为了挽救美国的经济危机？还是为了拯救世界？

狗屁，如果你到珠三角那些过得并不咋地的农民工中去问这个问题，估计他们会这样告诉你：老子工作是因为家里没有地种了，老子制造这些老子买不起的耐克鞋是因为老子需要钱买面包、娶媳妇和盖房子，老子受这些资本家欺负却“无怨无悔”是是因为老子要活下去、活下去……

不错，不管你怎么样包装，“中国制造”成名的背后，是那么多民众要活下去，要活得更好，所以能够创造奇迹。可是——当他们知道把他们集中起来制造三艘带着世界各地来的权贵、精英和各类畜生离开地球，他们把这三艘船完工之日，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时的时候，请问，“中国制造”能够完成吗？——从人性出发，你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完成，像秦始皇修建陵墓一样，用鞭子强迫那些工人完成“秦朝制造”，然后把他们活埋。

有人要说了，不，那些中国工人肯定被隐瞒了事实，不过，这并不妨碍普世价值，因为只能用这种方式拯救人类啊。不错，拯救人类，但记住，在两种人眼里，拯救人类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有信仰相信上帝主宰一切的人来说，诺亚方舟不应该载着这些被权势和金钱挑选出来的人。对于不相信来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自己和家人、族群的死亡大概与世界末日差不多。至于下个新纪元的人类祖先是各国总统和富翁、精英，还是从土地中慢慢长出来的小虫子、猴子，抑或是上帝重新用泥土上烧制，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这就是世界末日给我们留下的知识、理论和信仰空白，这就是《2012》让我看完后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也是聪明的好莱坞导演很少拿这类超过了人类能力的灾难搞娱乐的原因。

谢天谢地，《2012》只是一部商业电影，世界末日看起来不会来了，人类积累的优越的制度、人性的光辉、普遍珍惜与呵护的价值观、智慧结晶的哲学以及人文和宗教关怀还不会受到挑战，更不会随人类一起消失。

可是，如果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可人类赖以生存的那些优秀制度、价值观、人性的光辉和智慧的结晶就被挑战，又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或者这样说，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要在进入到 2012 年的时候，依然不去拥抱普世价值，依然固守落后的制度，压制人性，抵制人类先进的文化遗产，打压宗教，我们该如何描述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有时，不一定要等到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你才体验到末日的乱象……